



馬來西亞華文教育

中學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爭議專輯

張景雲 歷史教科書：
是歷史研究還是社會工程？

張榮強 談國民中學歷史教科書

何玉萬 擇善而固執：
談華文獨立中學初中歷史教科書的編撰

10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编辑委员会

发行人：叶新田
编务顾问：锺伟前
主编：潘永杰
助理编辑：林玉娟
封面设计：杜春茂
网址：<http://www.resource.djz.edu.my/>

编审委员会：王增文（巴生中华独立中学校长）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主任）
李亚遨（林连玉基金常务董事）
徐威雄（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兼任讲师）
莫顺生（前师范学院华文组主任）
潘永强（新纪元学院学术处讲师）

（按姓名笔划排序）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Editorial Board

Publisher: Yap Sin Tian
Advisor: Choong Woei Chuan
Editor-in-Chief: Phoon Wing Kit
Editorial Assistant: Lim Geok Kian
Cover Designer: Toh Choon Moh
Homepage: <http://www.resource.djz.edu.my/>

Editorial Committee: Ong Chang Boon
Chong Fah Hing
Lee Phung Koon
Ser Wue Hiong
Mok Soon Sang
Phoon Wing Keong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2010年1月

January 2010

目次

本期专辑：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争议

- 张景云 历史教科书：是历史研究还是社会工程？ 3
- 张荣强 谈国民中学历史教科书 5
- 何玉万 择善而固执 17
——谈华文独立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 潘永杰整理 “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争议”座谈会纪要 24

教材课程研究

- 王丽兰 从百家争鸣到合而为一 44
——检视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的演变
- 郑文龙 马来（西）亚国民小学华语课程设置与沿革 62
——1945-2003年教育政策演进

校史探微

- 锺伟前 考证与辨析 78
——1907年霹靂育才学校的开校与办理情形



书评和回应

- | | |
|------------------------|-----|
| 王国璋 黄庭康 | 98 |
| 《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 | |
| 黄庭康 回应王国璋博士 | 103 |

华教数据与大事记

- | | |
|---|-----|
| 2008-2009年各州华文独立中学学生总数、初中一学生人数
和教师人数 | 108 |
|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大事记（2008年7月至12月） | 109 |
| 编后语 | 114 |
| 稿约与撰稿体例 | 115 |

本期專輯：

中學歷史教育與

歷史教科書爭議



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争议专辑

编辑说明



2009年6月20日本刊主办了一场题为“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争议”座谈会，当天邀请本地资深文史工作者张景云先生、加影育华中学张荣强博士和董总课程局历史学科秘书何玉万女士担任座谈会引言人，同时出席座谈会参与讨论的还包括多位史学界和教育界的学者专家。

本期“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争议”专辑，就是当天座谈会的成果。本辑收录张景云〈历史教科书：是历史研究还是社会工程？〉、张荣强〈谈国民中学历史教科书〉和何玉万〈择善而固执：谈华文独立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等三篇专文皆是作者亲自根据座谈会上引言内容修订而成的文字稿。同时我们也将会上与会者的精彩发言与讨论，整理成〈“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争议”座谈会纪要〉一文，以飨读者。

历史教科书：是历史研究还是社会工程？

张景云*

历史这个名词，无论出自专业历史学家之笔或是非专家普通人的口，都是充满歧义而具争议性的名词，以至于今天在后现代主义论述颠覆了诸多学术思想传统之后，许多历史学家依然觉得需要对“何谓历史？”这个问题作开宗明义式的探讨和诠释。（“What is history?” → “What history is”）

历史这名词易引起混淆，故略加厘清以避免观念错乱而引起误解实有必要。简略而言，历史一词基本上指谓两件事。首先，历史是指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或谓过去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也就是历史的本体，让我们指派它一个代号：历史Ⅰ；其次，历史是对过去的研究与著述，哲学性的说法就是历史之认识，较新的名称是 historiography，这是历史Ⅱ。有些历史学者把后者（历史Ⅱ），简单称为历史，而把前者（历史Ⅰ）直接称为过去／往昔（the past），论述中提出past/history的关系。不少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者不接受这种二分法，认为历史学是人类对其本身进行认识的一项知识工作，最终成果是主体、客体合而为一，故history实无主宾之分。我们这里可以不必涉入幽微的历史哲学思辨，而是要谈历史的外延问题，所以只取简明的历史Ⅰ和历史Ⅱ的说法。

历史（Ⅰ和Ⅱ）和（历史）遗产（heritage）是两座不同的庙，它们各别供奉不同的神祇。这是我从前说过的话；不过遗产运动者不时闯进历史庙里偷换观念，因为历史Ⅰ像一座庞大而不设防的考古场，而历史Ⅱ又像高不可攀的象牙之塔。盗墓者说，我们也是在考古，在同样的历史Ⅰ这个知识源头上开掘。我们不能说，遗产运动跟历史Ⅰ毫无关系，因为前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完全放弃后者历史Ⅰ这个取之不尽的资源，遗产运动根本就是营建在历史Ⅰ这块富饶的土壤之上。但是遗产运动跟历史Ⅱ则在出发点暨旨趣方面都有极大而无可通融的歧异。

遗产大要可分为实体和非实体（抽象）两大类。实体遗产包括老屋古街、古坟场、博物馆的古文物、庙宇祠堂、纪念碑坊等等，而非实体遗产则包含一个族群的所有文化思想观念，如宗教信仰、道德观念与价值体系、传说、历史观、风俗习惯、科技体系等等。遗产运动不是只由民间自发推动，各国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小地方当局）都常涉及其中，且乐此不疲。

在政府所涉及的遗产运动事件之中，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应该是最引人注目与争议的一个项目，当然其它教科书如地理和公民／道德教育等科目也不应受到忽略。历史教科书在各国都有争议，自诩民主国家大龙头的美国有，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日本

有，无产阶级专政新民主共和国的中国有（被压制成地下火），新兴国家马来西亚自不能例外。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很多是从殖民地蜕变而来，新兴的权贵精英阶层以各种或暴力或温和手段夺取政治权力之后，通过政权分配社会经济资源，亟思长久延续和垄断政权，遂推行一系列社会工程措施（social engineering），以期通过各方面的思想改造（indoctrination）来塑造未来的国民性格，以达到国民团结和国家认同的假象。在圣经里，上帝以祂本身的形象塑造人类（in His own image），在新兴国家，政治精英特权阶层以他们本身并不很高尚的形象来塑造今天和未来的国家。

前殖民地政治精英夺得政权之后，分头争夺和操纵各项文化资源，如电台／电视台、报章、图书馆，设立语文出版机构，制订单元语文教育政策和学校体系，编撰历史教科书，把国家论述和执政党意识形态灌输进这林林总总的文化手段之中。在这种铺天盖地的社会工程底下，华教运动者跟着政治特权集团叫喊“让教育的归于教育”，毋乃是落入其华丽炫目的圈套。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出现偏差，是政治特权阶层全方位推行其狭隘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其反制之道也必然是政治性的（political in nature）；用中国今天的流行语说，“文化搭台政治唱戏”，奉陪之道当然是政治唱戏到底，谓之曰政治抗争（political resistance）。

故而若回到历史（I 和 II）与遗产运动之关系与对比，历史 II 是为过去／往昔而存在，历史学是为学术而学术，学术不仅不能有自利，抑且不能有它以外的目的，然而遗产运动则是今人利用过去／往昔，为今天和未来而存在。欧威尔（G. Orwell）在《1984》里对书中所描述的极权政体下为争夺未来的战争作了这样的概括：“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这是那里乌有之邦执政党的口号。

在这里可以引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的一段话，来说明身份认同政治与历史遗产运动的关系：“传说和虚构对身份认同政治是至为重要的。犹如罂粟花果是毒瘾的原料一样，历史是民族主义、族裔或原教旨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原料。（遗产）是这些意识形态中至为重要，或者可说是最至关重要的成份。”

*张景云 资深报人及文史工作者。

谈国民中学历史教科书

张荣强*

一、前言

常言有道：“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历史也是最终的裁决者。”这样的说法似乎给了历史负面的诠释，因为从历史的功能来看，学历史可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会热爱国家并以国为荣，对于国家的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此外，人民也能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并对自己的明天充满信心。学历史当然少不了历史课本，尤其是学校里的历史教科书显得更加的重要，它不但能塑造符合国家要求的国民，也深深地影响着下一代的历史观。

许多国家都使用历史作为工具，向全体国民灌输历史，从而增强人们的归属感、荣誉感和整体的凝聚力。这样，国家才能更团结、和谐及迅速发展。自前国会议员卢诚国在国会提出我国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不够完整及深入后，华社就不曾中断地讨论及关注国中历史教科书的偏差。然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否真的不完整或含有歪曲成分？它是否真的没有全面性向我国新生代展现我国历史的真实面貌？是否没有包含各种族对国家建设贡献的平衡理解，宽宏的世界观及依客观的历史轨迹去诠释历史呢？是否会造成在国中受教育的孩子对历史的认知不够全面？

如果以上的假设是事实，那么有哪些历史部份引起华社的争论？又是什么因素促成这种情况？是政治因素还是历史教科书作者对历史诠释的问题？为了探索这些问题，我想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国中历史教育的目的和功能，它的课程纲要和一些被认为引起争论的课文和其原因，进而做出讨论。

二、国中历史教育的目的和功能

前教育总监 Abdul Shukor 在历史课程纲要前言部分提到学习历史是为了塑造团结、合作、有爱国精神及以国为荣的国民，同时也塑造能促进世界互相谅解的国际观¹。而教育部课程发展局总监 Dr. Sharifah Maimunah 在课程纲要分析册子里也提到：“历史科是培养学生爱国精神的主要科目，认识及了解国家历史，可以加强学生的爱国精神及国家认同感。”²

¹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jarah Tingkatan*, Putrajaya: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2001, pp. v.

²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Huraian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jarah Tingkatan 1 dan 2*, Putrajaya: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2002, pp. iii.

在中一和中二历史科综合课程纲要手册里也谈到我国国中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和加强国人效忠国家，以及培养有尊严的马来西亚人；并通过知识和体验祖国历史及有关联的外国历史，让学生了解社会和国家的状况以及它和世界历史的关系，并促进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及团结。历史教育也能产生对历史的共同记忆以做为国民意识及国际间互相谅解的参考框架³。同样地，我国历史教育里的其中一项功能是为了塑造一个拥有马来西亚模型特色的社会⁴。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国中历史教育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历史教育，让国人能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栽培出符合国家要求和期望的新世代。因此，国中历史教育里非常强调传授爱国精神及增强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当然，为了配合全球化新世纪的降临，历史教育也介绍了一些适当的外国历史事迹以让我国人民能融入国际社会。了解这些历史教育的要求和目的对我们分析课程内容有很大的帮助。

三、国中历史教育课程纲要

1970年代及之前的历史课程内容多倾向于政治、历史人物及外来历史；从1978年开始，教育部开始以马来西亚的视角把本地历史编进历史课程里；从2003年起至今，当历史课程从新检讨时，内容即集中在马来西亚历史，当然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外国历史也被建议编进课程里⁵。教育部课程发展局把中学历史课程内容分成12个主题和45个篇章来讨论，高、初中各占6个主题。

（一）初中阶段

在初中阶段，教育部显然的是希望通过传授本国历史的知识和体验去培养国民效忠及以马来西亚国民为荣的精神。这个阶段，学生学习了包含了五百多年依时序的国家历史，课程内容主要是讨论社会及国家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事迹，其目的无非是使学生对国家历史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此外，这些延续性的历史事迹以依时序的方式讨论，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明白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了解它们改变及延续的因素，而某些和我国历史有关联的外国历史也穿插里头以让学生明白它们和我国历史之间的关系。

³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Huraian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jarah Tingkatan 1 dan 2, pp. 3-8.

⁴ Nor Zamani Abd Hamid, "Rumusan Seminar Sejarah: Pembinaan Perpaduan Nasional. (Nota Berbentuk Slaid)", Kuala Lumpur: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2007.

⁵ Nor Zamani Abd Hamid, "Rumusan Seminar Sejarah: Pembinaan Perpaduan Nasional. (Nota Berbentuk Slaid)".

在初中阶段，地区历史也被注重。“地区历史考察”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考察他们周围历史事迹的经验。这样的研究可提升学生有关寻找、搜集、分类及分析历史资料的技能和能力，从而促进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和敏感度。中一的地方考察是有关“自己及家庭的历史”，中二是有关“学校历史”及中三有关“住区或学校周围的历史”⁶。

（二）高中阶段

高中历史课程的编写方式是为了促使学生能以更广阔的视角去认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为了使历史教育的视角和观点更完善，课本里将讨论世界文明的进化过程和历史的发展，从中获得的知识及领悟将能帮助学生比较我国的文明和世界文明，从而理解我国的文明为世界文明的其中部分⁷。课程里介绍与我国历史有关的外国历史将使更全面了解人类文明的进化，明白我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及它在国际的定位。为了更清楚中学历史科的课程内容，我们有必要了解它的 12 个主题及每一篇章所要传达的内容。

如图表（一）所述，中一历史科课程内容先介绍早期的文明，然后主题集中在讨论马六甲王朝的创立、强盛、没落、其他州王朝事迹，马来王朝遗产及其成为现在政府的根基。中二课程主题在谈我国东西马各州因策略性的地理位置和富裕的天然资源吸引了英国、布洛克家族及英北婆罗公司前来殖民，这里也讨论本地社会对英殖民的反抗事迹及复兴国家意识的事件。中三主题围绕在人民如何争取祖国独立和马来西亚联邦的组成，讨论的还包括了日本统治我国的历史，马来联邦及马来联合邦的组成，紧急时期及马共的威胁，各族合作争取独立和马来西亚组成事件。中四内容先介绍人类早期文明，然后用了很长的篇章讨论回教文明及其发展，之后讨论欧洲的发展及英殖民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中五内容则先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和马来西亚国家主义的浮现与发展为民族和国家建设基础。然后，整个主题注重讨论人民如何建设及巩固独立的马来西亚民族和国家，当中亦讨论了国家的行政制度、人民的团结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我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⁶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Huraian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jarah Tingkatan 1 dan 2*, pp. 3-8.

⁷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Huraian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jarah Tingkatan 4*, Putrajaya: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2002, p. 1.

图表（一）国中历史科课程纲要主题及篇章题目

年级	主题	篇章题目
中一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早期的文明及马六甲王朝的强盛 2. 马六甲王朝成为现在政府的根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历史与我们 2. 马来西亚原始时代 3. 东南亚早期政府 4. 马六甲王朝的创立 5. 强盛的马六甲王朝 6. 马六甲王朝的没落 7. 柔佛延续马六甲王朝威望 8. 马来各州政府 9. 马来王朝的遗产 10. 沙巴 11. 砂拉越。
中二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3. 我国的繁荣及富裕吸引外来势力前来殖民 4. 本地社会对英殖民的反抗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策略性的地理位置激起英国的殖民 2. 富裕的天然资源激起英国的介入 3. 北部的马来州属及柔佛为英安全的防线 4. 砂拉越富裕的经济激起布洛克家族的殖民 5. 沙巴富裕的经济吸引了英北婆罗州公司 6. 英剥削经济 7. 争取民族主权的人民斗争 8. 复兴国家意识提升民族地位
中三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5. 人民斗争，争取祖国独立 6. 马来西亚联邦的组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日本统治我国 2. 马来联邦及马来联合邦 3. 紧急时期及马共的威胁 4. 各族合作争取独立 5. 1957年8月31日国家独立 6. 沙巴和砂拉越行政的变迁走向自组政府 7. 自主的马来西亚
中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7. 人类早期文明 8. 回教文明及其发展 9. 欧洲的发展及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人类早期文明的出现 2. 文明的进步 3. 东南亚早期文明 4. 麦加回教文明的诞生及其发展 5. 麦地那的回教政府 6. 回教政府的形成及贡献 7. 东南亚的回教 8. 西方进入前马来西亚回教的改革与影响 9. 欧洲的发展 10. 英政策及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中五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0. 第2次世界大战前国家主义的浮现与发展 11. 建设民族与国家至拥有自主权的马来西亚诞生 12. 马来西亚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东南亚国家主义的浮现与发展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来西亚国家主义 3. 民族与国家建设的意识 4. 建设马来西亚民族与国家 5. 建设独立的民族与国家 6. 巩固马来西亚民族与国家 7. 马来西亚的行政管理制度 8. 为了太平繁荣的团结与发展 9. 马来西亚与国际社会的合作

资料：教育局历史科课程纲要手册及中学各年级历史课本

四、引起华社争论的课文内容部分及其原因

在分析了一些历史学者的看法和报章上有关国中历史教科书里引起华社争论的课文内容的报道，我们发现这些内容引起争论的原因有：历史课文内容不够全面地介绍各族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华裔先贤功绩被淡化或没被重视；编撰者对历史事件诠释的问题；词句使用有欠中性；编撰者过于强调马来民族的英勇和牺牲及不够全面介绍他族的贡献；回教文明历史篇章太多以及历史课程内容范围不够多元化等。

（一）不够全面地介绍各族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

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忽略了介绍本国华人和印度人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例如在中一历史教科书里，我们发现马来民族、沙巴和砂拉越各土著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社会结构、宗教和经济活动等在本书的第9、10及11章里讨论⁸，然而华人和印人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社会结构、宗教、经济活动却被忽略了。这不禁使我们担心这样的历史内容是否能扮演好历史教育的功能呢？它能否像民间史学家李业霖在接受报章采访时所言的：“历史的功能中包括了提高对本土的认识，培养爱国思想，了解各民族的宗教、文化、习俗，促进各族谅解等。”⁹因为没有完整地介绍华印同胞的宗教、文化和习俗历史，我们担心它无法扮演好促进新生代了解各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习俗等功能，也无法促进各族互相谅解。

（二）华裔先贤功绩被淡化或没被重视

中二课本，第2篇章谈巴生战争时未提到叶亚来；在第5章153页，谈开发吉隆坡时在附加内容处有叶亚来的图片，图下方只是简短写着：“叶亚来是其中负责开发吉隆坡的人。”（原文：Yap Ah Loy antara orang yang bertanggungjawab membangunkan Kuala Lumpur.）¹⁰。在第5篇章谈经济活动，如开发锡矿业时并没有介绍华裔矿家如：徐炎泉、薛文仲、薛佛记、叶冠胜、陆佑、姚德胜等；在谈橡胶种植时没提到陈齐贤在马六甲种植40 英亩的橡胶¹¹。同样地，在第7篇章谈人民反殖民政府事件时，并没有提到石隆门华工造反对抗布洛克事件，只是在谈砂拉越经济部份略提此事。（原文：Pada tahun 1857, pelombong Cina telah memberontak kerana tidak berpuas hati dengan cukai yang dikenakan oleh kerajaan Brooke）。¹²显然的，这场石隆门华工事件未给予适当的介绍，亦未被定位为反殖民运动。

⁸ Ahmad Fawzi Mohd. Basri et al., *Sejarah Tingkatan 1 (Buku Teks)*,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002.

⁹ 刘敬文、刘国伟报导：〈不偏不倚还原大马历史〉，《东方日报》，A14版，2009年4月27日。

¹⁰ Masariah Mispari et al., *Sejarah Tingkatan 2 (Buku Teks)*,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003.

¹¹ 颜清煌：〈华文历史变革（1403-1941）〉，载于何启良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1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页3-76。

¹² Masariah Mispari et al., *Sejarah Tingkatan 2 (Buku Teks)*, p. 90.

在中三课本第1章谈抗日期间，除了马来人外，并没有介绍或深入的讨论华人和印度人在抗日所扮演的角色¹³。中五课本第58页虽提到“三星队伍”是由巫，华，印组成去抗日（原文：Menentang Penjajahan Jepun : Pasukan Bintang Tiga ditubuhkan dengan ahli terdiri 3 kaum penting iaitu Melayu, Cina dan India.）¹⁴，却没强调谁主导“三星队伍”及他们英勇的抗日事件和牺牲。显然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人抗日军的贡献受到忽略了。

（三）编撰者对历史事件诠释的问题

在中三课本第130页里，作者提到《拉萨报告书》允许各源流语文在独立后继续使用十年（原文：Laporan Razak 1956 membenarkan penggunaan bahasa pengantar vernacular selama sepuluh tahun selepas merdeka）。其实这不符合事实，在《拉萨报告书》里并没出现这样的条文，而且《拉萨报告书》被拟定时，独立谈判并未具体化。

中五课本第126页谈到马来苏丹接受以“出生地”为公民权条例的实行，条件是非马来人必须承认马来人在马来联邦宪法里的特别地位（原文：Raja-raja Melayu telah menerima kerakyatan jus soli dengan syarat orang bukan Melayu mengiktirafkan kedudukan istimewa orang Melayu dalam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我不清楚是否有过这样的议决或交换条件？但却知道在马来联邦实行时，已废除了之前马来联邦建议以“出生地”公民权条例的实行。此外，在中五课本第212页，编撰者在诠释国家原则第二项“忠于君国”时，加插了一句话：“君主是土著特权的保卫者”（原文：Raja sebagai symbol penyatuan rakyat dan pelindung hak istimewa peribumi）这似乎已超越了一位历史教科书编写者对国家原则“忠于君国”所需诠释的部份。

（四）词句使用有欠中性

中三和中五课本不断使用有“特殊”用意的词句：例如它不断使用移民、外地人和外来者（golongan imigran, golongan dagang, pendatang）称呼华人和印度人，这有别于其它年级的历史教科书里使用orang Cina, orang India 称呼我国的华人和印度人。作者这样的用词，是否有意提醒新生代有关华人和印度人的祖宗不是土生的，或想要强调华人和印度人的身份是有别于马来人和其它土著呢？

在中二课本，第36页说甲必丹郑景贵是华人黑社会领袖（原文：Kapitan Chung Ah Kwee merupakan ketua Kumpulan Hai San. Beliau adalah antara pemimpin kongsi gelap Cina yang hadir menyelesaikan pergaduhan di Larut）。这“华人黑社会领袖”的称呼对一位

¹³ Ramlah Adam et al., Sejarah Tingkatan 3 (Buku Teks),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004.

¹⁴ Ramlah Adam et al., Sejarah Tingkatan 5 (Buku Teks),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003.

获得甲必丹地位的华人领袖来说是带有贬义。或许用“华人社团领袖”称呼他会比较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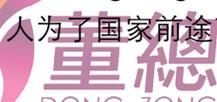
中三课本第130页，编撰者似乎有意强调国小的功效(原文：Eh, Encik Chan, nasib baik kamu masuk sekolah kebangsaan! Dapat kamu berkomunikasi dengan baik. Betullah kata Cik Leela. Tak sia-sia kerajaan membuka sekolah kebangsaan.)。这是否在强调只有进国民学校求学才能帮助我们与他族沟通，这无形中已贬低华小及淡小在教育国民的功效。

在中五课本里，我们会发现编撰者在形容我国左派人士时所用的词句也有欠中性。例如第49页提到“印尼人进来马来半岛促使这里接受印尼国家主义运动元素”（原文：Kemasukan orang Indonesia ke Tanah Melayu memudahkan penerima unsur kegiatan nasionalisme Indonesia di Tanah Melayu.）；第99-100页提到“有一小部份的外来者和马来激进份子支持马来联邦开放公民权政策，因为他们可保留原本（国）的公民的地位”（原文：Terdapat sebahagian kecil yang menyokong Malayan Union, antaranya termasuk orang dagang dan golongan Melayu Radikal... Kerakyatan Malayan Union yang terbuka juga disokong kerana mereka boleh mengekalkan kerakyatan asal masing-masing）；而在第59页，又提到说“泛马来由”是一小部份马来人的政治理想和口号（原文：Melayu Raya atau Indonesia Raya : Slogan dan cita-cita politik sebahagian kecil orang Melayu）。

这样的说法似乎是要告诉新生代说当年的马来（左派）激进份子 是印尼国民及外来移民者，他们认同马来联邦是因为想获得这里的公民权，又想保留祖籍国（印尼）的公民地位，况且他们只是占很小部份。然而，这些激进的左派份子（无论马来人或华人）是否都曾经因反殖民政府而斗争和牺牲呢？如果答案是正面的话，那么他们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曾扮演的角色就应被历史记载；反之，如果他们阻碍了我们的独立运动，历史书里也应讨论他们的过失，而不是对这些左派运动没有交代！当然，历史教科书都会把马来（西）亚的独立与建设归功于当时到伦敦谈判的联盟政府领袖，毕竟很多时候历史只能记录表面与最后的结果。对于深层、复杂、曲折的历史事迹，还有待大家进一步地探索。

（五）编撰者过于强调马来民族的英勇和牺牲而不够全面介绍他族的贡献

中三课本第100页提到（马来人接受）放宽公民权限制，显示了马来人为人民团结和幸福做出了牺牲（原文：Kelonggaran syarat kewargaraan menunjukkan pengorbanan orang Melayu terhadap kaum lain demi mewujudkan perpaduan dan kesejahteraan rakyat）。中五课本第120页称赞巫统改变原则，因为为了国家前途愿意与他族商讨（原文：Perkara ini(penubuhan CLC) merupakan perubahan terhadap dasar UMNO kerana kesanggupan berunding dengan kaum lain untuk kepentingan masa depan Negara.）。编撰者突出了马来人为了国家前途而牺牲的精神，另一方面，编撰者却淡化其他种族在这方面的立场和



贡献，例如在中五课本第121页提到“国家独立党”没得到华、印和它族的支持时，编撰者说这是因为华印族群没有感觉到（不认为）他们是马来领土里的民族，团结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原文：IMP gagal mendapat sambutan daripada kaum Cina, India dan kaum lain di Tanah Melayu. Ini kerana mereka tidak merasa bahawa mereka adalah sebagai satu bangsa Tanah Melayu. Rasa perpaduan terlalu asing bagi mereka.）。

此外，在中五课本第48页提到马共管理的14天里，很多马来人被杀，他们的屋子被烧（原文：PKM memerintah 14 hari : Banyak orang Melayu terbunuh dan rumah mereka dibakar oleh PKM）。编撰者只强调马共残害马来人，这样的介绍似乎不够全面，因为事实上也有许多其他民族被马共杀害。同样的，在中三课本第93页只谈到马来人在“地方自卫团”愿意并且英勇地对抗共产恐怖份子（原文：Kesanggupan dan keberanian orang Melayu (Home Guard)melawan pengganas komunis secara berhadapan amat mengagumkan Pesuruhanjaya Tinggi British pada masa itu）。编撰者只提“地方自卫团里的马来人”，抹杀了地方自卫团里其他种族成员的贡献。总的来说，编撰者如此地强调马来民族的英勇和牺牲固然可被谅解，但淡化他族曾扮演过的角色及不完整地介绍他族的贡献是不被史学所接受的。为了本身族群的利益，连社群与社群之间最基本的相互尊重都不被重视，怎能写出令全民接受的历史呢？¹⁵

（六）回教文明历史篇章太多

中四课本，10个篇章里，回教文明占了一半，即由第4章至第8章（共97页）。例如第4及5章谈回教源起；第6章谈回教皇朝；第7章谈回教传入东南亚及第8章谈回教的影响。这本书的编撰者认为全面化地讨论回教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让学生了解到回教文明在建设西方文明时所扮演的角色¹⁶。

加影育华中学历史科主任 Pn. Noraini 认为回教文明是普遍性、超族群性的，课文内容不是谈宗教，也不是谈马来文明，只是学生误解了他们在读回教，他们无法了解回教文明与现今国家社会是有着重要的关联。另一位历史老师Pn.Faridah Yasmin 也说读回教文明史不是读回教，而是回教文明在建设西方文明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学生应多了解回教的发源及创立回教国部份，这与马来西亚争取独立事件有许多共同点。然而，所有受访问的高中历史老师都认同回教文明部份太多了，需减少一些，可把第7章和第8章合而为一（访谈时间，23.5.09）。

¹⁵ 例如在中三课本第4章课文主题为“各族合作争取独立”，编撰者却在第119页引述了东姑阿都拉曼的话说“这片国土是马来人的，应该归还给马来人。”（原文：Negeri ini terima daripada Melayu,maka patutlah diserahkan balik kepada Melayu.）这样强调国土是马来人的摘录与课文主题谈各族合作去争取国家独立难免有矛盾之处。

¹⁶ Nik Hassan Shuhami Abdul Rahman et al., Sejarah Tingkatan 4 (Buku Teks),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002.

另一方面，中四历史课本虽有提到兴都教和佛教，但不够深入和完整；谈儒家、道教及基督教时更是过于简略。总的来说，中华和印度文明在与回教文明相比之下就显得过于简略，虽然我们认同回教文明在过去确实拥有一段辉煌的时期，也为人类文明尤其是建设西方文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当历史教科书对于其它宗教和文明的介绍有所欠缺或不够平衡，将使新生代失去真正认识所有宗教与文明的机会，以及被塑造出来的历史观也显得非常片面。

（七）历史课程内容不够多样化

在中学课程内容纲要里，谈政治史的部分实在太多了。例如中二，8个篇章里只有第6章谈经济，其他的课文都以政治为主题；中三课程内容全以政治为主，而经济、社会、文化等部份只是在某些课文内容里作简略的讨论；而中五课文9篇章里有7个篇章以政治史为主。我们的历史课程需概括更广及更多样化的课程内容，它应增加经济、社会、文化习俗等的内容。例如它应介绍早期的马来王朝在外交、贸易、文化等方面与中国、印度的关系（访谈Noraini, 23.5.2009），也应注重讨论华人、印度人移居大马事迹及在经济发展的贡献。此外，民间传承、民俗文化、历史古物、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它艺术等也需给予适当的介绍。

在国中历史教科书里，“马来西亚”的历史似乎就追溯到马六甲苏丹王朝，而今天的马来西亚，是“马六甲王朝”的延续。对于其它州属的一些早期势力，本地历史教科书显然避重就轻，不多着墨。华印同胞大规模到来是在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若与课程里所强调的马来人政治方面的历史作比较就显得短暂了。然而，有关华印同胞的历史事迹依然还多得很，毕竟历史不只是限制于政治部份而已，过去的经济、文化、社会、习俗、艺术等都应组成历史的重要部份。例如，有关我国“土生华人”社会的形成及他们的文化、语言、习俗等的历史是应给予介绍的。此外，我们独立后至今所发生的社会和国家事件似乎被忽略了，其实这些“近代”史内容更能引起新生代对历史的学习兴趣。讨论这些近代史更能让学生掌握有关国家和社会历史的知识，进而提升他们对历史的思维能力和探索兴趣。

另一方面，历史也不应有地理位置上的限制。其实，我们应考虑在编撰历史教科书时以文化为主导，这样我们所编撰的历史内容更符合马来西亚国情——多元社会和多元文化。如果以文化为主导，华印及其他同胞的历史就应跨出马来西亚国土地理位置的限制，延伸至他们祖籍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事迹。

在高中历史课程里，还是以本地史为主，那些与我国历史有关联的外国历史会被介绍，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明白我国历史¹⁷。然而，这般选择性地讨论外国历史是否会影

¹⁷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Huraian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jarah Tingkatan 4, p. 4.

响新生代对世界历史的全面认识？明显的许多重要的世界近代史并没被介绍，如：美国独立史、俄国革命史、中国及印度的近代史等。我们的新生代若无法了解全面的世界历史，将会影响他们在全球化时代里的竞争。

五、总结

当马华公会国中历史课检讨负责人卢诚国重提国中历史教科书多处引起争论时，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却表示无法认同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还强调历史是铁一般的事实，无法再创造。虽然这是见仁见智的观点，然而我国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历史教育对国家的团结和社会和谐有着很大的影响，灌输正确的历史观于下一代和人民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也是影响深远。

当我们分析中学历史教育课程时，我们发现回教文明与马来人的民族奋斗史的确占了大部分篇幅，这当然有其理由和说法。不过其他族群在建国历史中做出贡献的内容过于简略及不成比例的介绍却有待改善。我们认为历史教科书除了部份课程内容有待改善外，编者本身的主观思维是造成课文内容有所偏差的最重要的因素。例如；中三和中五的课本是由相同的学者编的，在内容拿捏方面就显示了他们“特有”的作风，课文里很多时候强调马来霸权主义（ketuanan Melayu）¹⁸及提醒下一代华印同胞是外来者。这是否意味着共同编历史教科书的学者们，本身便存在着文化和认知上的差异？或因政治因素影响他们，使他们无法不偏不倚地编写课本？我想这是不容易解答的疑问。

然而，我们是否已到了需重新梳理历史资料的时刻了？大家应依据不同种族的理解，共同对话、讨论和编纂马来西亚的历史教科书，这样对于社会融合、促进理解，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情。因此，我们建议让更多人参与重新梳理历史往事，由不同族群学者共同重新编写一本接近史实的教科书。此外，教育部能否放弃传统以地理位置或国界为编撰历史教科书的方式，而选用以我国多元文化为主导去编撰新的历史教科书，并通过国家文化遗产，结合课本来反映我国的历史原貌，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我国如何摆脱殖民时代、各族先贤共同争取独立、建立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国家的事迹。

*张荣强 檳城理科大学校外课程，主修历史，副修经济毕业，博特拉大学资讯工艺硕士及马来亚大学哲学博士。博士论文题目为“马来西亚华教运动：探讨董教总的斗争（1970 - 2002）”。现任教加影育华国中初中历史和数学科教师。email: yuenkeong@hotmail.com

¹⁸ 例如中三课文第45页谈“马来人反抗要消灭马来人霸权的马来联盟”（Orang Melayu telah menentang Malayan Union yang dianggap cuba menjajah Tanah Melayu dan menghapuskan ketuanan Melayu）。

参考文献:

Ahmad Fawzi Mohd.Basri et al., *Sejarah Tingkatan 1 (Buku Teks)*,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002.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jarah Tingkatan*, Putrajaya: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2001.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Huraian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jarah Tingkatan 1 dan 2*, Putrajaya: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2002.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Huraian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jarah Tingkatan 3*, Putrajaya: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2002.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Huraian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jarah Tingkatan 4*, Putrajaya: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2002.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Huraian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jarah Tingkatan 5*, Putrajaya: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2002.

Masariah Mispari et al., *Sejarah, Tingkatan 2 (Buku Teks)*,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003.

Nik Hassan Shuhami Abdul Rahman et al., *Sejarah, Tingkatan 4 (Buku Teks)*,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002

Nor Zamani Abd. Hamid, “ Rumusan Seminar Sejarah: Pembinaan Perpaduan Nasional.(Nota Berbentuk Slaid)”, Kuala Lumpur: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2007.

Pusat Perkembangan Kurikulum, *Panduan Pengaplikasian Kaedah Terpilih Dalam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Sejarah*, Kuala Lumpur: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2004.



Ramlah Adam et al., *Sejarah Tingkatan 5 (Buku Teks)*,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003.

Ramlah Adam et al., *Sejarah Tingkatan 3 (Buku Teks)*,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2004.

颜清滢: 〈华人历史变革 (1403-1941)〉 载于何启良等编《马来西亚华人史 新编》第1册, 吉隆坡: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1998, 页3- 76。

刘敬文、刘国伟报导: 〈不偏不倚还原大马历史〉, 《东方日报》, A14版, 2009年4月27日。

接受访问的加影育华中学历史老师: Pn. Noraini Mahat, Pn.Faridah Yassin, Pn. Cheong Mui Nyai, En. Mathivanan Muniandy 于23.5.2009。

择善而固执： 谈华文独立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何玉万*

一、前言

教科书是课堂教学中的主要知识传递工具，它根据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编定，系统地反映学科内容，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相关学科知识的基础，在众多教材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华文独立中学（以下简称独中）因坚持使用华语文为教学媒介语，而被排斥于国家教育体制之外，因此各科使用的教材必须自行编撰¹，加上办学方针的不一致，造成独中的学术水准和要求各自不同。

1973年12月，董教总全国华文独立中学发展工作委员会（简称独中工委）成立，发表《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确立了母语教育的基本原则，才改善了这混乱的局面。1975年主办的统一考试，为统一衡量华文独中的学术水准建立了一项机制。1976年起，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陆续出版了以华文编写的各学科教科书，独中才有了适应华文教育需要的各学科统一教科书，其中初中历史科教科书在1978年陆续出版。1991年，重编出版第二套初中历史教科书。到2009年，第三套初中历史教科书将陆续出版。

本文即针对第三套初中历史教科书在内容取舍和课文辅助系统的呈献两方面，整理目前独中历史教育的发展方向。

二、历史教育的重要性

历史的简单定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记录。对历史学者而言，这记录必须有各种证据（史料）的支持，同时要放在各个时代不同的背景中去比较、分析，再根据他的理解做出阐述，对历史的认识要求系统化、科学化。但对普罗大众而言，历史是人类过去的共同记忆，也是不同学者对事件和人物的解释或记录，阅读这些书籍使他们

1 在1960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存在的时候，其使用的各学科教科书是独中的教科书来源，后来随着新加坡华文中学改制后，华文编制的各科教科书也陆续绝版，这时各独中只能各施其法，包括由校内老师自行整理教学内容、以复印旧教科书等等方式，为学生准备教科书。

了解人类过去曾发生的事件，认识目前社会发展的由来，可以促进思考层次，进而提升人文素养。

就教育层面来看，历史学科的教学，主要让学习者认识人类社会的过去经验，这是历史知识的传达；学习者学会应用多方面证据或资料，比较或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看法，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此外，历史记载了众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互动，能让学生在学的过程中，逐步产生尊重人、珍惜人生及爱护自然环境的素养，对学生建立科学（实事求是）、民主（合作交流）和尊重法律制度的生活态度十分重要。这些都是基础历史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培养的技能 and 情感态度，故可以说，历史科是基础教育中的核心课程。

基于这几项重要的教育作用，因此，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在基础教育中的历史课程。以马来西亚而言，政府体制下的小学 and 国民（型）中学，都设有历史科，小学阶段附在地方研究课程，中学阶段则单独设科，属于核心课程，着重在马来西亚历史，其目的明显是想通过对国民共同记忆的学习，培养学生具备良好公民素养 and 爱国的目标。国家教育体制外的独中，即是基础教育的一环，也重视历史课程，初中历史属于必修科，高中分流后，文科必修历史，纯理科或纯商科则可选修历史 or 社会科。

三、初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制定

中学历史课程通过制定符合社会 and 教育需要的目标 and 内容大纲，来实践历史教育所承载的功能。国家体制下的历史课程，按国家教育哲学的纲领，制定完整的课程纲要（或课程标准）；独中方面，虽然在董总的旗帜下出版了两套初中历史教科书，却没有可解释中学历史教育功能的课程纲要，而高初中历史科的课程目标，更是在1992年才正式公布²。

进入21世纪时，顺应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独中在有限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支持下，也朝向教育专业化发展。独中工委会作为统一考试 and 统一课程的组织者，亦不落人后，其中在统一课程方面，就展开了各科课程标准的制订工作。而制定独中历史课程标准这项重任由董总属下负责独中工委会事务的课程局历史科学科委员会承担。

² 1992年，独中校长 and 教务主任，在董总课程局的安排下，在福隆港召开“面向21世纪的华文独立中学”会议，为21世纪的独中课程制定前进的方向，这里面就为各学科确定了教学目标，兹将初中历史科的目标罗列如下：（1）使学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学习兴趣；（2）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培养科学、民主 and 法治精神以及正确的世界观；（3）认识我国建国的过程，加强国家意识 and 爱国精神；（4）了解我国多元民族社会的形成 and 发展，促进亲善团结；（5）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为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奠定基础。

2003年起，经过问卷调查、工作营讨论和学科委员会的多次会议讨论，在2005年正式拟出初中历史课程标准³，比较系统的整理了初中历史的课程定位、目标和内容大纲，弥补了过去两套教科书在课程论述上的不足。

这份课程标准解释了独中历史教育的设置目的。首先即阐述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关于历史科“是什么”，课程标准指出：“作为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所研究和探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及规律，其中包含了对历史知识和概念的认识和理解。”而“为什么”在中学阶段设历史课程，即“除了建立学生对民族、国家的认识外，还让学生在获得了重要的历史概念之后，逐渐形成历史思维”。

从这两个答案来看，独中历史课程的开设，目的是让学生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和规律，以及逐渐形成历史思维。除了作为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还灌输学生人文思想，具备与社会接轨的能力。

课程目标“是指这门学科通过施教活动要引起的学生的最后变化结果，是这门学科的总目标。”⁴ 任何的教学内容和评鉴结果最后都对应于课程目标，这份课程标准保留了1992年制定的五项课程目标。课程目标之下，课程标准也明确了具体的教学目标，分为认知、情感和技能三个面向，包括知道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的主要发展特征和趋势，初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学会收集、整理资料等。

在内容大纲方面，主要强调“从马来西亚人的角度出发，以国家发展时序为中心，看世界历史的发展”，并参考过去两套教材的内容，定下以本国史和外国史合编的通史体裁，按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时段划分，安排三个年级各单元内容。

马来西亚的发展史，基本上可分为：石器时代至印度化时期与马六甲王国（18世纪以前）、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时期（19世纪），以及独立前后的发展（20世纪）。依这样的时序划分，我们可以粗略地说，马来西亚史18世纪之前为古代，19世纪为近代，20世纪为现代。课程标准即以18世纪作为初一内容的时间断代，并以此类推。

四、历史教科书的课文系统

历史教科书作为历史教育的主要知识载体，是实现课程标准目标和内容的重要工具，也是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本和学生的学本。故它不能只利于教师教学的方便，也应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

³ “课程标准”的用词是按中国2000年教育改革中制定的各学科课程标准用法，内容与过去的课程纲要或教学大纲相似，但课程标准具有更大的指标作用，是从课程发展的角度拟定，包括了课程简介、课程构思、课程目标、课时建议、内容大纲、教学评鉴等内容。

⁴ 引自白月桥，〈课程目标建构与历史教材编写〉，《中国历史课程网》（<http://hist.cersp.com/kcjs/kcyj/200605/2647.html>），2006年5月17日。

教科书的结构体系，即是教科书从封面到封底的排列顺序，作为课堂教学的知识传递工具，包括课文系统（主体内容）和课文辅助系统（补助说明），若设计得好，不仅有利于内容的呈现，还有利于构建适合学生年龄特征的学与教的模式，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历史教科书呈现的方式，也是编制者具体化课程标准内容大纲的实验过程。

新初中历史教科书在课程标准的指导下，以“根本性”（即必须掌握的历史知识和概念）、“基础性”（即可衔接各个阶段和区域的历史知识和概念）和“本质性”（即最能体现历史学科体系的历史知识和概念）为原则，决定教科书的主体内容的选择。

在本国史和外国史合编的体例下，新教科书的内容主要选取介绍影响我国政治发展的相关世界大事，以及我国在这些大事影响下产生的变化。如初一册，首先介绍历史与历史学习，作为学生系统进入历史学习的基础，接着介绍人类的演进和世界四大古文明，从中带出我国的印度化时期。从印度文明发展出来的佛教，是我国主要的宗教信仰之一，由此延伸出三大宗教的历史进程。配合伊斯兰教，进入马六甲王国和柔佛王国的发展及马来人的风俗传统介绍。看过马来半岛的发展，古代史进入世界其他地区的介绍，首先看中国从周朝到清初的主要政治发展脉络，并独立一个单元介绍中国文化的发展，以便学生能从中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接着看欧洲希罗文明到地理大发现这段历史，如何引领欧洲人走向开放，以及其主要的文化发展。

第二册是讲述我国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过程和发展，要了解英国人为何和如何殖民马来西亚，则必须首先了解欧洲国家强盛的经过，因此介绍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从工业革命发展出来的新帝国主义思想，使亚洲各国都沦为欧美的殖民地，除了日本和暹罗。这样学生不但具备了当代重要政治制度的基础知识，对我国如何成为英国殖民地能够初步形成概念，也对之后英国的殖民统治政策有所掌握。

第三册的现代史部分，我国经历了惨痛的二战、争取独立的振奋，以及独立至今的茁壮成长。在这里，两次大战和亚洲各国摆脱殖民统治各自发展，还有美苏冷战和当代科技发展改变人类生活，成为世界史主要的内容。这两册的世界史内容，是学生建立科学观、民主观和法制观念的主要渠道。

配合马来西亚的多元民族社会特色，以及独中的特殊背景，本套教科书在叙写本国史时，除尽量以客观持平的态度介绍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外，在不忽略介绍其他民族之余，相关部分都尽量加入华裔先贤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加强华裔后辈参与国家建设的信心。例如，谈到海峡殖民地中槟榔屿的经济发展时，介绍当时主要的华人甘蔗种植园主——许栲合父子；在雪兰莪内战时介绍叶亚来的事迹；介绍柔佛著名的港主如陈旭年、陈开顺等人；其他如锡矿家如胡子春、陈秀莲等人，橡胶种植大王陈齐贤等人，以及在争取独立期间活跃的政治家如陈祯禄等，都特别在辅助课文中提及

他们的生平事迹。此外，也系统地介绍华教发展史，以使独中学生珍惜和维护华文教育。

另一方面，《独中建议书》中多次强调独中承载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历史科自然不能缺席。中国历史特别是古代各朝代发展，历来在独中历史教科书占有巨大比重，但本着马来西亚公民的身份，中国政治发展史不应成为历史教科书的重点，反而应加强中华文化的介绍，故新教科书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及内容，特辟独立单元来介绍。与中国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的政治发展史，则大为缩减，不再巨细无遗的介绍各朝代兴亡经过，而以精选代表人物为主要内容，进而让学生了解当时的朝代特色和其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如汉朝不再介绍西汉和东汉的政治发展，只以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作为汉朝的代表，唐朝则只重点介绍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等等。

历史教科书的主体内容，一方面必须按历史学的要求组织，以体现学科系统与逻辑，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使用对象是初中学生，加上课程目标不是培养一名历史学家，和受限于一一定授课时数（每周两节计80分钟），故在撰文时，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知识的专业性，而选择具普遍认知的史实，同时还放弃某些细节描述，以符合课程标准所欲达致的目标。

五、新教科书课文辅助系统

目前教育界盛行认知心理学中的建构主义论，此派提出人类知识的建构，外在输入固然重要，知识内化则必须由学生自行转换，教育工作者的首要工作，就是协助学生顺畅的建构和内化这些知识。以教科书编撰者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是如何编排教科书。

以新编初中历史教科书而言，我们定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认为这套书应方便学生自习，文字使用尽量简单、浅白，使学生能自己读懂；同时多穿插图表，吸引学生阅读。这些要素，都充分体现在课文辅助系统中。

新编历史教科书的课文辅助系统，可分为三个部分：

- （一）基本概念和先行组织者：当代认知心理学强调事先给予学习者明确的学习目标，可帮助学生掌握学习内容；而进入正文前，若提供学生一些与学习内容相关的说明或概念（先行组织者），则可建立学生对接接下来内容的基本认识。新教科书在每个单元开始前，皆有“单元学习目标”，条列本单元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情感目标；“情境页”则以机器人小博士的漫画人物，或是以问题方式，或是上课方式，引领学生进入本单元的主题；以及“想说做”的问题设计，检验学生的先验知识，以便教师事先掌握学生已具备的各种知识，进而在教学时加强或修正这些知识。



- (二) 阐释、丰富教学内容的注解、历史图表：由于正文是主要的学习要求，内容必须针对主题说明，部分细节必须舍弃。新教科书特别设计了“历史放大镜”、“历史小词典”和“趣味馆”或“历史回顾”，作用为正文的补充说明或名词解释，补充有趣的解释性资料或人物介绍；此外也加插大量对正文理解有加强作用的历史图表。各单元正文进入前都整理了本单元的重要年代记事，与同一时代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大事并列，方便学生建立横向的时间联系；各单元正文结束后则以人、时、地、原因、过程和结果的历史六要素方式，罗列单元重点内容，方便学生复习本单元历史事件的重要概念。
- (三) 巩固教学内容的习题作业：习题是“根据教学目的，围绕着教材基本内容编制的，是为理解、巩固和应用知识”，还是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力与创新思维的有效途径⁵。新教科书在单元内各主题结束后，设计了“练习坊”，提问一些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学生可借此巩固对课文的掌握；每个单元也设计“自我评估”和“小测试”，学生可按单元的学习目标，自行检测以了解自己究竟学会了多少。而“活动廊”，则是提供给教师多元化作业活动的一项设计，学生可借由此活动，学会“做”历史。

良善的课文辅助系统设计，首先要能够激起学生阅读的兴趣，进一步则可以吸引他们主动深入探究。上述的课文辅助系统，其实参考了香港、中国等地最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用意在打破过去历史教科书过于专注提供学术知识的编写方法，是当前世界教科书编制的潮流。这种编制模式，在尊重学生为学习的主体的原则上，减少知识内容，增加教科书的趣味性；以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设计和资料补充，要求学生在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将学习的权力交回给学生，即达到教科书传达知识的工具作用了。

六、结语

中学历史教育不是培养历史学家，而是通过历史知识的传授，使学习者了解所处社会的由来，以及培养未来作为社会人应具备的基本品德修养和思维能力。教科书作为教学三要素之一，其结构体系的设计，是课程设计者实现其课程目标的重要途径。新版初中历史教科书，就是课程局历史科学科委员突破传统学术型教科书编制的尝试，或许教师在改变的过程中将面对使用困难，但若真的能使学生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则历史科学科委员会仍将择善而固执。

*何玉万 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毕业，董总课程局历史科学科秘书，
email: ywanho@hotmail.com.

⁵ 聂幼犁编：《历史课程与教学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123。

参考文献:

齐健、赵亚夫等，《历史教育价值观》，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赵亚夫等，《国外历史教育透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杜芳主编，《新理念历史教学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聂幼犁主编，《历史课程与教学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

张华，《课程与教学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邵瑞珍主编，《教育心理学》（修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皮连生主编，《学与教的心理学》（修订本），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

黄显华、霍秉坤，《寻找课程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马来西亚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面向21世纪华文独中课程规划工作营资料汇编》，吉隆坡：董总，1992年。

董总出版组编，《董总30年》，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7年。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06年。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历史》第一册，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08年。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历史》第二册（试教本），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07年。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历史》第三册（试教本），加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2008年。



“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争议” 座谈会纪要



日期：2009年6月20日

时间：9.00am-12.30pm

地点：董教总教育中心行政楼A401会议室

与会人士：张景云先生（资深文史工作者）
张荣强博士（加影育华中学历史科教师）
何玉万女士（董总课程局历史科学科秘书）
黄松奎校长（退休独中校长、董总课程局历史科学科委员）
詹缘端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张晓威博士（拉曼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廖文辉博士（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梁怀蔚师（日新独中教务处主任、董总课程局历史科学科委员）
庄似萍师（尊孔中学历史科教师、董总课程局历史科学科委员）
庄丽美师（坤成中学历史科教师、董总课程局历史科学科委员）
黄华佐师（巴生中华独中历史科教师）
莫顺生先生（前师范学院中文组主任、《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编委）
王增文校长（巴生中华独中校长、《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编委）
潘永强博士（新纪元学院学术处讲师、《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编委）
锺伟前先生（董总资讯局行政主任、《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编务顾问）

主持人：徐威雄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编委）

讨论提纲

一、中学历史教育的定位与目的

- 纯为历史智识的教授？
- 激发历史兴趣与人文关怀？
- 认识本土、塑造国民意识？
- 灌输爱国主义与“政治正确”？

二、如何对待政府学校历史教科书的争议

- 以马来政治、回教文明为中心的偏失？
- “马来西亚史”尚未达到全民共识？
- “马来西亚史”尚存在许多忌讳、敏感、分歧、误解、灰色地带等等？
- 政治干涉历史诠释，以迎合特定史观 / 立场 / 利益？

三、谁来主导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 由政府相关单位编撰，最后由政府审核？
- 由政府相关单位编撰，最后交学者专家审核？
- 由民间（出版社、学者）编撰，最后交政府审核？
- 由民间（出版社、学者）编撰，最后由学者专家审核？
- 唯一标准教本 v.s 不同论述的教本并存

四、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撰写原则

- 论述主体：马来文明为主轴、各民族的历史参与、马来西亚的形成？
- 诠释史观：单向正统史观、历史进化观、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多元文明的交流融汇、人民主体（如劳工阶层、知识阶层，群众反殖争取权利等）？
- 价值判断：种族性事件（如五一三等）、争议性议题（如左右之争，“社会契约”等）、不同族群不同的历史经验（如英殖时代、日据时代、马共等）？
- 撰写方法：时序上近详远略、地域上同心圆理论、叙述上隐恶扬善？

五、华文独立中学历史教育的定位

- 华族视野下的国史与南洋史？
- 华族在建国史上的地位、与国史如何平衡？
- 中国历史的定位与比例？
- 与政府学校教科书的比较：优劣或互补？

六、中学历史教育中的“马来西亚史”应该是什么？

- 一个历史，各自表述？
- 以官方或主流史观为依归？
- 各方皆膺服的大马历史仅是“一个高贵的梦”？

主持人：

今天的讨论主题是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我们有两个重点，首先是中学历史教学，讨论的范围包括目前中学历史教育的状况、性质和应该呈现怎样的内容；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历史教学要通过教科书，它的性质、编写过程、谁主导等等问题。现在我们就开放各位发言讨论。



庄似萍师：

做为独中历史课本的编纂者之一，在编纂的过程中，我们尝试尽量呈现更宏观的视野。因为相较于过去的课本，目前这套历史课本关于中国史的篇幅减少了，反而加入了更多的本土介绍。甚至有些独中历史老师反映，很多中国历史的材料都没有编写进去。不过，我们的立场是坚持加入更多的马来西亚内容，当然要挑剔的话，就是内容还有一些民族情绪，然而在总体上，仍然是站在一个马来西亚人的立场来反映史实。



詹缘端先生：

谈到历史教科书定位，在本地的情形是逃不了种族主义的，其实这样的观点已经不知道过时了多久。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就谈这个课题，认为定位问题应该要抛弃，选择以某一个族群为叙述观点的做法需要丢弃。如果从区域史或国别史来处理，最好谈的不是政治史的事情，比较好是从文化史角度谈。从文化史谈的时候，我们可以文化史的历史事实为叙述重心，同时这些历史事实又离不开政治史，所以它的好处就是不用让政治史支配整个编纂主轴。



不过，在我看来，在马来西亚这样的格局，很难突破这方面的限制。台湾就曾经尝试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而中国现在则采一纲多本原则，开始纳入地方史。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考虑，打破这种即使是强调历史知识时，也不是以政治史为中心，更别提什么国家领袖建设，这些事情粗略提及一些历史事实就可以了，何况也不是只能提东姑阿都拉曼，为什么不能将翁惹化也写进去。所以，重心还在于文化如何形成区域和国家的特色，事实上这样的想法并不是新的东西，估计已经在学术界谈论了近三四十年了。我们在横向没有太多学术吸收，老是谈要从那一个族群出发，其实在我看来，不管马来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都是文明，就是History of Civilization或者是文化史。那一个文明不是对等的，都是要放在国阵同一个天秤底下。所以，我们应该把历史目光和视野，看得比较阔一些，不要那么局限。

其次，刚才主讲人张景云先生发言时提到，历史遗产的问题，联合国在多年前已经有不少文献指出，除了物质文明，还有非物质文明，就是类似文化、思想、宗教和信仰等精神文明，这部份我们很侧重，但是物质文明的东西我们经常忽略。对于政治观念的争执，宗教的冲突，我们有一大堆，不过对于摆在我们眼前的物质，很具体的东西，拿出来谈可能更加有意思。其实很多历史文物只要一摆出来，就会发现它同时具有中国、马来和印度等文化色彩，譬如一尊中国佛像，有希腊式的鼻子、印度式的轮廓和中国式的衣着，为什么我们不从这样的角度来谈历史，而只会老是坚持这是中国的佛像，是北魏进入中原后的产物，这样谈来谈去老是大汉沙文主义。我想我们的角度是否可以放得更宽一些，不要让我们定位的问题常常纠缠在种族主义的政治氛围底下打架，走不出来。这算是个人的一些小怨言，谢谢！

张晓威博士：



大家好，我蛮赞同詹缘端学长的看法，就是历史教材编撰从文化史角度切入会不一样，摆脱过去强调政治史为主轴的编撰处理手法。针对这本新编的独中历史教材，虽然我只是在这里趁空档翻阅一遍，之前在独中担任历史教师时使用的是旧教材，不过我还是觉得这套教材，如果只就马来西亚史的编撰内容来看，事实上还蛮可取的。我看过这本教材导言的部份，也蛮注重文化观。

我们一直强调马来西亚是多元文化，事实上如果将马来西亚放大就是一个小东南亚，再从小东南亚到大东南亚，放到整个区域来看，就会是一个世界观。诚如刚才何玉万女士所说，独中历史教材的目的，包括建立学生的世界观，是我们历史教育很重要的面向。所以，这个历史教育的主轴要抓准，从世界观或世界文化的角度，这样才不会让历史教育牵连到政治斗争的漩涡。

董總
DONG ZONG

主持人：

各位针对历史教科书要从怎样的观点切入的问题，还有什么意见和补充。

锺伟前先生：

现在有很多学校开始在上历史课时，安排学生做历史报告，带学生出去参观一些历史古迹。因此在我看来，历史科不应该定位得太窄狭，譬如在中国的学校，他们很重视校史馆，这就是一种同心圆史观的表现，也就是说如果你对本校不认识，对本地方史不认识，好比说加影中学的学生，如果对加影这个地方都没有感情，都不认识，你就不能再谈雪兰莪，再谈整个马来西亚，远至中国，这是由近至远的认识过程。

同时，我认同詹缘端刚才所谈的内容，教科书编纂要从文明史角度来切入，文化是主轴，再由文化辐射其它领域。不过，政治、经济领域肯定是历史的重要下层基础，不能不谈，当然谈的角度不应该从政权史来看问题，而是从文明发展史角度，淡化以政治史为主轴。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经济发展史，政治和经济是互为表里，这两个领域是最基础的。举个例子来说，从马来西亚发展史来看，如果忽略锡矿业、橡胶业，就是无法说明马来半岛为什么会成为华人印度人大量聚集的英殖民地。所以我认为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轴要抓住，文化史要抓住，政治史要抓住，经济史要抓住，不能定于一尊。



我认同目前独中历史教材从以往以中国为中心，往本土化教材编纂发展的做法。然而，本土化教材，不限于教材内容上，还可以辅以地方文史馆、校史馆等。所以，我认为谈中学历史教育的定位和目标的时候，它应该从地方扩大至整个国家，直到世界。同时，教学活动方面可以更多样化，譬如在学校成立历史学会，让学生有机会成为校史馆的导览员，甚至可以跨出学校，整理地方的历史。这样的做法，有助于活络中学历史教育。

刚才谈学生上历史科很枯燥，这是因为老师透过填鸭式的灌进，学生只能听，完全没有机会动手找历史，对地方不认识，对学校没有感情。所以在我看来，未来中学历史教育，对宏观的历史认识固然重要，但对地方史、校史的部份也要重视，要加强培养学生对学校 and 地方的认识 and 情感。以上是我个人对这个课题的一些补充。

主持人：

刚才锺伟前先生谈到中学历史教育其中一项重要意义，就在于发挥认识本土的作用，所以在历史教科书以外，还要注重其它历史资源来强化历史教学。各位，在这课题还有其它意见要补充吗？

梁怀蔚师：

我想回应锺伟前先生刚才的谈话。基本上，我们历史科学科委员对锺伟前先生谈的历史教育理念是认同的。事实上，我们在编纂历史教科书的过程中，经常重复讨论一个课题，就是如何让老师们不会被教科书牵着走，让历史教育回归生活化教育，这是我们委员们的共识。然而，我们目前面对最棘手的问题，在于我们独中历史老师科的教育毕业背景差异极大，就像庄似萍老师刚才提到的，当我们今年新编的初中历史课本推出后，很多老师就打电话询问，为什么中国史部份不见了。他们很在意这一点，我服务的学校有历史科老师向我反映，为什么初中历史不谈中国史，这部份他最熟悉。因为独中历史教师大多数都是毕业于中国和台湾的大学，他们共同的背景就是对中国史很熟悉，对本地史却兴趣或缺或非常陌生。在对试教老师调查方面，新编初中历史课本最后的篇幅，都是介绍本国史，可是我们的老师却只用三节课，就把本国史教完，换成中国历史，他们可以用上十几二十节来教，而且还嫌时间不够。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卡在，我们有想要达到的中学历史教育目标，可是我们60所独中历史教师素质参差不齐。



我想也许我们要回到一个本源，就是我们学校的行政层对历史教育的看法是什么？据我接触到的学校行政层，他们大部份认为历史科可有可无，甚至有些学校是让华文教师去教历史科，而华文教师原有的工作如批改作业、作文等，就十分繁重了，要求这些老师，花费时间消化这些历史知识，将它变成爱国教育，变成让学生可以站在本国，放眼世界的历史史观，这些老师是无法做到。

所以，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把很多元素放在历史教科书，如刚才锺伟前先生所说，建校史馆，要认识本土，其实在我们课本的单元一，就有教导历史报告如何编纂的内容，要求学生写一篇我的历史或我的学校历史。但是老师会反映，我们每周才有二、三节课，我们如何有时间分配来做这些教学活动，还有老师直接说，我连学校的历史都不懂，要我们怎样带着学生去做。换句话说，我们原初设想的目标是让历史教育发挥其真正的意义，不过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们面对很多困难。所以，我们将来要做的部份，就是如何让历史教育发挥其真正意义，而不只是历史知识的传授。这是我的一些回应，谢谢！

廖文辉博士：

我本身在尊孔独中教过五年的历史，而刚好这一两年趁着教学视察的机会，也跑过几间学校，接触到一些学校历史老师，瞭解到他们的一些看法。我发现大部份独中历史老师，对历史教育的意义没有太多的理解和掌握，很多老师也不是本科毕业，甚至还有安排辅导老师去教历史，对这种情况我非常讶异。然后，大部份本科毕业的老

师对本国史没有什么兴趣，而且比较注重中国史。其实，我们目前的独中历史教材，编纂方向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反映到多元性和非局限在某族群的历史，所以我们有不错的教材，问题在于如果老师的素质没提升的话，再好的教材也没有用。



事实上，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协助独中历史教师将本国史或者东南亚史教好。我发现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目前关于本国史和东南亚史研究最好的历史著作，都是英文书写，虽然马来学界也有一些不错的著作，可是和英文著作比较起来还是有一段距离。现在独中历史教师大部份都是中国和台湾的大学毕业，他们很多会面对语言上的问题，很多时候只能掌握中文的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针对提升老师们的教学水平问题，我之前就曾经和何玉万谈过，何玉万也草拟过一份计划书，不过我想这方面的工作可能并不容易进行。我的想法是，既然独中教师材料掌握局限在中文，就先从这方面加强，所以我们可以先把中文方面涉及到本国史的著作和文章，尽量的搜罗，诸如过去《南洋文摘》、《南洋学报》等刊载过的一些不错的文章。我们可以把这些文章搜集，然后根据州别、专题和人物等建档分类，文章分类后就将它们上网，这样独中老师就可以直接下载享用这些教学资源。

其次，再将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一些经典英文著作，把它们搜集起来，譬如战前姚楠、张礼千已经翻译了一些当时很经典的英文作品，基本上这些资料我都有所掌握，关键在于如何将资料传达给独中老师。最后，我们可以组织独中老师集体翻译一些不错的关于本国史的英文著作，这方面涉及人力分配，独中老师配合的问题。基本上，这些都是眼前我们可以做，给独中老师更多的教学材料，这是独中老师最缺乏的，这也造成如刚才梁怀蔚老师所说的情况，独中历史老师可以用三节课，将本国史教完的问题，如果有这些材料提供给他们在教学上运用，情况可能可以改善。

主持人：

关于中学历史教育的部份，还有那位同道想补充。

莫顺生先生：



我认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原则应该是正确全面反映历史真相，撰写历史教科书的专家应客观地反映马来西亚各民族的历史真相。换句话说，历史教科书的作者必须对各族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有深入的了解，否则所撰写的内容将失实、主观或偏见。在马来西亚成立前的50年代，本地历史教科书一般上都能反映历史真相，这主要是教总主席林连玉争取和坚持的成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林连玉先生的著作《风雨十八年》见证

到。目前国中的历史课本都缺乏全面反映当年的历史精神面貌，甚至有些重要的历史真相还遭到湮灭。有关国家名称，马来联邦、马来亚联邦，过去上历史课，老师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如1874年邦咯条约（Pangkor Treaty of 1874），新加坡也被视为马来亚的一部份。这些错误的引述，是教科书方面没有清楚交待而造成的。因此，在编撰教科书方面应在国家或领土名称及其历史事件的发展有清楚交待。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编撰历史的作者只使用二手资料，没有寻求第一手资料，或利用不同的二手资料来源求证，导致以讹传讹，最后沦为失实的历史教科书。

王增文校长：

我曾在独中教授历史科十年以上，对独中历史教学的种种问题也感同身受。事实上独中的师生很自然地会偏向中国史，这可能是一种族群情意结。可是，这样的感情因素对我们独中生来说，并无法开拓他们的胸襟，毕竟他们要在这块土地上长久的生活，视野长期局限在一隅，并不会带来好处。今天的大环境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开始滋长，我们不妨顺应时势来加以改变。所以，刚才詹缘端谈到，从文明史切入的说法，我基本上认同。关于独中历史教材方面，我早年是教高中历史，没有接触过初中历史，过去的经验是在高中的部份，高一教中国史，高二教世界史，高三就教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史，虽然这样的安排各校情况不一，不过个人认为有其道理，想提出供大家参考。为什么高一要先教中国史，可能和这种情意结有关系，因为学生在面对高中历史时，有一定的压力，要啃完三大册的课本，并不容易。所以，先从中国史的部份，让他们领会一些历史的知识，然后到世界史，引导他们对世界的了解，有一定的世界观，最后再回头看本国和东南亚区域史。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安排是适中，不过却会让学生的视野走向一个角落，还有受到族群意识牵引的情况。



黄松奎校长：

我想谈谈中学历史课本的问题。其实，这几年我们都一直强调以文化史为中心，然而却面对不同的议论，一些人说那样不行，另一些人却说这样不行。不过，我们总觉得文化史毕竟是陶冶和培养我们学生品德素养、世界观、价值观等。我们要介绍的不只是华族的文化，也希望能够包含马来、印度同胞的文化。另外，文化的出现也免不了涉及经济、政治的影响，因为怎样时代的经济情况，就会产生怎样的政治、文化，就是从文化史延伸到各领域。我们希望这套教科书编出来后，各校使用以后，可以从一个点然后逐步的推广出去。我们在课本里，也有一部份的作业，要老师带学生从事当地的乡土教学，不管是本校的历史还是



董總
DONG ZONG

当地的历史，课程都有这样的安排和构思，就是从切身的环境为立足点出发，逐步发展扩大出去。

我们也很清楚，时代不同，教育思想、方法也会不同，所以历史课本的编写跟着时代的改变，是一定的。也有半数老师认为旧的课本较好，还有更资深的老师认为以前更久的课本是最好教的，也许他们并不了解一些情况。我想谈谈参与第一套课本编纂过程里的一些经验，那时代完全没有华文历史课本，有的用以前马来亚文化供应出版社的，甚至有用马来文版和英文版本的。1970年代因应统考开办，因为有些学校认为不参加统考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时课程组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希望编纂的这套历史课本，能够让各校不管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还是马来文英文各半，或者是纯中文，都能够接纳这套课本。所以，这套课本除了课文外，作业部份都是以三语俱现的方式呈现，这是希望即便是考政府考试文凭的学生，使用这套课本也能帮助他们应付考试，就是想透过这样的方式，逐渐凝聚各独中的向心力。

同时，随着年代的改变，也做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增加了本土的东西，另一方面减少了中国史的篇幅。到目前最新的第三版课本出来，我们委员间也有经过很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内容要如何增减，最后一致同意或者是绝大多数委员同意之下，决定中国史部份大刀阔斧删掉，尽量让本土的内容加进来，以及一些新的概念也编写进去。因为我们认为教材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我们教育孩子，就是以人为中心，就是教育他将来如何应对生活为核心。过去旧的方法是老师怎样教，学生就怎样学，老师教多少，学生就学多少，我们始终认为与其给学生鱼，不如教学生钓鱼的方法。所以，也编写教师手册，以便教师能根据手册的一些导引，能够更好地协助推动学生自学的兴趣。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教师手册内，提供一些参考材料，如果老师想要有更多相关方面的资料参考，我们的参考材料可以有所帮助。这也给老师提供一个范例，怎样教导学生自行寻找资料。事实上，编写教师手册的目的，就是要提供老师一些导引，如何正确的使用这套课本，让教学更有效果。虽然目前老师的反应不一，有人认为使用上很方便，有人却认为绑手绑脚。对此，我觉得编纂的委员们有自己的立场，我们希望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会以马来西亚为出发点，来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就如先前我所提到的，我们希望能够将各族文化编写进去，就是希望能够做到以马来西亚人来看马来西亚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

锺伟前先生：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今天讨论提纲中第一项是中学历史教育的定位和目标，当然这包括国中和独中，不过我想提醒的是，中学教育是属于中等教育或基础教育的范围。诚如刚才张景云先生所谈到的，做为学校教科书不管从正面还是负面来看，它都是有特定的作用及其所要赋予的任务，这是国际上普遍的现象，除非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可以松绑到让各校自编教材。所以，它必然要附带一定的任务。

因此，目前国中历史课本所引发的课题，其实必须回溯到1973年文青体育部，规定国家文化内容必须符合三个原则，所以至今天为止，不论在教科书、博物馆、电视台和语文出版局，都受这三个原则制约，就是第一、国家文化必须以马来文化为中心；第二、以回教为重心；第三、其它族群文化必须要不抵触上述两项条件下且优秀者，才被考虑纳入国家文化。而且这三个原则影响直到今天，仍然笼罩本地的文化教育界。我们独中因为在国家体系之外，所以有条件显示更多元的面貌。总而言之，谈中学历史教育定位的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赋予其历史教育一定目标、任务和作用，关键在于这些用意是否符合一个国家最终所要追求的公正、合理和面向未来的目标，以及对现有带来正面的意义。

主持人：

我大致总结大家针对第一项提纲的讨论，首先大家都肯定中学历史教育的意义和定位。同时，大家也同意中学历史教育应该从多元和文化史角度切入，也有人强调历史教育要从认识本土开始，然后逐步拓展形成学生的世界观。刚才黄松奎校长谈到，目前独中历史教科书的修订版也朝着这样的取向。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进入提纲的第二项，如果待会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想补充也欢迎发言。提纲第二项的讨论内容是，如何看待政府学校历史教科书的争议，我想大家对最近发生的一些历史教科书争议事件应该很熟悉，主办单位也整理了相关争议的大事纪表，供大家参考。至于为什么会发生相关历史教科书的争议，其实刚才的讨论也多少有所触及，譬如我在讨论提纲也列出以马来人史观为中心的编纂方针，必然会造成其它族群的争议。另外，对马来西亚史还未达到全民共识，这种情况背后是否反映本地不同族群间，拥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认知，所有的民族无法对马来西亚历史达成全民共识。所以，不管官方如何书写历史，民间总有不同的看法，各族间也有不一样的意见。再者，马来西亚史尚存许多忌讳、分歧、误解和灰色地带等。我想这问题全世界大部份都会碰到，马来西亚特殊的多元情境，可能让问题更复杂。另外，就是政治干涉历史诠释，迎合特定的立场和史观。针对以上的课题，我现在就开放给各位，发表意见和讨论。

锺伟前先生：

我建议这个讨论课题，可以和讨论提纲的第三项讨论项目一并谈，因为教科书争议与谁在编撰有密切关系，所以建议一块讨论。

主持人：

我赞同锺伟前先生的建议，为了配合时间上的控制，讨论提纲的第二和第三项内容就合并在一齐讨论。



董總

詹缘端先生：

虽然我没有具体的证据，不过我很好奇地问，马六甲王朝时代所讲的马来语，是否今天的Bahasa？因为那时候的碑文是以瓜哇文所写。所以，在我看来，所谓马来文明和回教文明，两者不必然划上等号，不过目前中学历史教科书，也没有弄清楚这个事实。今天我们谈历史教科书的争议，根本是政治问题引发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也经常有编纂历史并非由官方主导，即使唐代以后虽然有官修史学，但也不必然由官方主导，这一点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这里本科念历史的同道都会知道。所以，回到马来西亚，过去史料编纂也并非完全由官方主导，即使谈过去的语文，其原来使用的也不是我们今天的Bahasa，文西阿都拉之前，没有所谓Bahasa这一回事。所以，这些事实，如果要写文化史的时候，必须要把它标明出来，而非老谈政治。当然政治是一个主轴，但是政治不是一切，政治绝对不是一切。

我们在教科书谈海上丝路，三言两语带过，其实这里头有多大的东西可以证明，文化交流和影响我们这块土地和整个东南亚，甚至和世界互动的关系，意义多深远。很多具体的文物，可以说明很多事情，不是你嘴巴乱乱讲就算了。譬如争取独立，去英国谈判，当时谈判的文件应该拿出来，是重要的文物，谈了些什么，谁签了名，国家档案局应该公诸于世，你说谁比较伟大，是东姑阿都拉曼，还是陈东海。这些都该公开，白纸黑字，大家才一清二楚。

主持人：

刚才詹缘端抛出一个问题，即使马来文明，在诠释上也有待厘清，其如何出现、如何界定，譬如马六甲王朝时代的马来语是否是今天使用的Bahasa。我想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当然，对马来历史学界来说，马来文明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他们族群内部最重要的论述。不晓得各位还有什么高见要发表。

张荣强博士：



当我和学校一些历史科老师访谈时，也谈起这些问题，为什么我们政府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大部份都是谈论马来人的历史，他们都有自己一些看法。印裔和华裔的老师，都认同历史教科书谈太多马来人的东西，忽略了其它族群。不过，马来裔老师则表示，历史是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这块土地过去就属于Tanah Melayu，所以难免少了华、印裔的东西。

其次，在时间上，华、印裔也是在十九世纪以后才大量移民到这块土地上，因为我们的历史是要写回去过去发生的事情，譬如马来苏丹王朝，所以内容上就无法避免会让马来人的历史占大部份篇幅。在另一方面，当我反映教科书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马来裔老师经过思考后，也认同在

内容上的确有所不足，譬如缺乏在马六甲王朝时代，马六甲和中国的往来互动关系的历史，甚至认为华人迁移本地的历史介绍，可以多增加，以便让教科书的内容有所平衡。这些都是我进行访谈时，历史老师所给予的一些回馈意见。

詹缘端先生：

谈到历史教学，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学生的领受能力是怎么样，他们能接受的程度如何？当然，我们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不能是全由学生决定教育的内容，这肯定是无需争议的。不过，学生学习层次的能力，在教材编纂的过程，比较难以拿捏处理。举例来说，文字的使用，我看高中三册历史教材，在文字的程度上是同一个水平，高一至高三文字水平差不了太远。事实上，初中方面基本层次差别也不大。然而，初中升高中，则有一个文字水平的落差。我也在中学教过书，不论高中三册历史教材，如何安排教学顺序，学生都会面对语言文字阅读困难的问题，一般高一的学生在阅读课时会遇到一些困难。不过，高二以后，学生在阅读课本的文字掌握上还算可以应付。所以，在高一时会面对很大的语言落差，和初中程度的语言跨逾度很大。

我们要看待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做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包括老师的能力、材料不够，概念停滞在某一个阶段，要加以培训等问题。另一方面，是学生学习能力和接受度的问题，他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学生能力和水平的问题，和我们教科书的编法有很大的关系。

锺伟前先生：

以我历史本科毕业来看独中历史教科书，感觉内容太多了，太多重点没重点，太少表，太少图案，一图胜千言，很多时候用图表来呈现，对学生了解课文内容会更有效果。所以，我认为目前的教科书要瘦身，所谓瘦身不表示文字材料要少，但是图表要多。举个例子来说，最近我在翻阅本地一些战前的旧报纸，对文章提及的一些地名，根本不晓得是指今天的哪一个地方。如果在教科书附上各时期的地图，将每一个时代不同的地名标示出来，就非常有用，且培养一定的“历史感”。

另外，我想谈一谈最近发生的历史教科书争议事件，事实上我们华社太多是制式的反应，似乎每次事情发生，吵了一阵子后，事情最后还是没有解决，而且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后续跟进的做法。我们很少看到像刚才张荣强博士书面报告般很具体的谈一些问题，而报章、电台等媒体谈的都是一些大概念而已。恐怕不论是官方、政党和民间都应该组织起来，从事一些相关的调查工作，对涉及的师生进行实际的调查，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这些工作都是很关键的，可是我们都不重视，很少人去做。

最后，不管是国中和独中的教科书，都忽略了历史是有一个历史诠释的问题，大部份是定于一尊，没有留一些空白给学生。事实上，历史可爱之处就是它有诠释的空



间，不少有待存疑的地方。这样才能培养我们的学生求知和怀疑精神。所以，未来我们编撰教科书的过程中，不应该让它变成一种个人史观或某一族群的意识来贯彻。我很赞同詹缘端刚才所说的，为什么编纂教科书必须是国家单位或机构呢？我们国中和独中的历史教科书是一纲一本的，其实很多国家已经是一纲多本了，这些涉及到教育体制松绑的问题。

张景云先生：

如何写国史是一个充满问题的课题，除非国史不追溯到建国前，譬如我们马来亚不追溯回1957年以前，或马来西亚不追溯回1963年之前的话，这样还可以写。但是如果追溯到回去的话，就会碰到很多问题。事实上，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国界是人为硬硬地划分出来的。所以会留下很多棘手的历史问题有待解决。以马来西亚情况来说，马来统治是从苏门答腊来的，占碑（Jambi）的王子先逃到廖内，然后跑到马六甲建国。马来王国的传统在半岛上最早就是马六甲王朝，而且不论西海岸或东海岸的马来王国，基本都是从马六甲王朝开始慢慢形成的。所以，写国史的话我们不这样追溯，就没有办法谈论了。



另外，目前西方历史研究，较前沿的看法是，东南亚地区在人种上、在文化上都是很混杂的地方，所以研究上十分注重边缘、缝隙间的地带，两个主体间的中间地带，因为这些中间地带混杂着两个主体的特质。其次，他们重视在地的 autonomy history，因为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太注重西方的方法学，但是西方方法学的缺陷，就是无法将在地民族的材料纳入研究框架，譬如以马来半岛的情况来说，马来半岛每一个王朝都有本身的历史，马来王朝的历史从苏门答腊到马来半岛，很多的历史是抄来抄去，诸如将室利佛逝的历史抄到马六甲王朝，内容又充斥许许多多的神话和传说，如果真的用西方式研究方法研究，当然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缺憾，而这个缺憾必须弥补。

同样地，在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史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学术界科班出身的，在大学学院做研究的，他们不会注意民间学者的东西，但是在学院的学者又不从事田野调查的工作。比方说，我们要研究槟城华人社会，能不能够不看张少宽、陈剑虹的著作，这些民间学者可能没有经过正式的专业学术训练，所以他们写的作品大部份是随笔式的著作，并非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们有很多资料。

今天西方英语的历史学界较前沿的想法是，他们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资料，基本上已经被他们看完了。除非做的是非常微观的研究专题，不然大部份的文献都已经被翻过了。目前还有什么东西还没被发现呢？就是在地民族的 autonomy history。所以，我会认为谈马来西亚历史关于华人移民史方面，如初期移民时代的政治经济形

态，值得我们探究，也许这方面非常稀微，不值得放在教科书里谈，因为教科书多聚焦在重大历史事件的陈述，不过从历史求真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就谈到这里为止，谢谢。

主持人：

刚才张景云先生提到，东南亚史的复杂性在于不少国家的疆界是后来人为的结果，涉及这样的历史背景造成很多时候有些问题无法谈，因为过去历史上的古代王国，现在却被划分为两个国家。譬如婆罗洲的兰芳公司，其疆域处于今天沙巴、砂拉越和加里曼丹之间，所以究竟要不要纳入马来西亚史来谈，就是一个课题。

再来，就是锺伟前先生谈到另外一些重要的课题，就是每一次发生历史教科书争议事件后，我们华社就出现一次制约式或情绪式的反应。所以，我们民间应否要有一个正式的组织，从事一些相关的调查和资料收集的工作，甚至发出我们的声音。不然，这些事件不断重复发生，每当政府基于一些特定的政治情况，就会炒作一次。我们也不能只期待政党帮助纠正这些事件，因为马华公会他们在意的可能是马华公会在历史上的贡献。讨论到这里，各位同道还有谁想补充和发言。

廖文辉博士：

我想补充一些材料。在20世纪初期，一些英国学者和殖民地官员如何写马来亚史，我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接触过一本专门提供给当地殖民地官员训练时必须读的介绍马来亚历史的读物。在书中，第一部份介绍马来亚半岛有多少民族，第二部份则开始谈印度文明。我开始以为这样处理是一个特例，不过后来接触其它类似的著作，如瑞天咸、温斯德的著作时，才发现虽然他们是站在英殖民的立场来书写，不过大致上还能保持客观，而且一般会从本地多元族群的现象开始介绍，然后就谈印度文明，往下才进入马来半岛的历史。

然而，独立以后，这样的史学书写途径却被我们的政府丢弃了，以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时期，完全不提了，选择从马六甲王朝开始谈起。相对于早期，英国人先从介绍各族群切入，再谈印度文明对马来半岛的影响，然后才进入马来半岛的历史，这样的史学书写方式，值得我们大家参考，谢谢！

锺伟前先生：

我想补充刚才所谈到，为什么民间要做田野调查对这些争议的回应。事实上，早期研究南洋，如刘士木一批人，他们出版的《南洋研究》，对南洋研究做得很透彻。后来，张礼千、许云樵这些人也有一份《南洋学报》，不过以后新马分家，《南洋学报》在新加坡了。反而，在马来西亚民间，恐怕愈来愈缺乏这样的团体来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刚才张景云先生谈到檳城的张少宽、陈剑虹，还包括霹靂州的李永球、马

六甲的欧阳珊等。这些民间学人都是散落，单打独斗，没有很好的团体将它们组织起来。当然，我们华社有成立华社研究中心这样的研究单位，虽然华社研究中心做了不少工作，不过工作重心并非全放在历史的研究和整理上。所以，如果未来民间没有一个统筹单位的话，仍然会落入政治游戏的旋涡。如果我们能够资助民间来成立这样的组织，专门的学术团体来进行相关的田野调查，当这些争议发生后，并直接对外发布，那么整体的社会观感会不一样。

另外，刚才听了张景云先生谈到所谓历史缝隙的问题，其实包括颜清煌教授也说过，海峡殖民地的一些报告，很多时候都还是“我方的历史”，很多他者的观点是被消音的。所以，本地有不少历史是遭到湮没，因此我认为我们亟待重建“我方的历史”的状况。然而，因为官方带有特定的史观来处理历史，民间又缺乏活力从事相关的工作，所以并未好好处理这些事件。我们有各别的民间学者在单打独斗，但是缺乏一个团体来整合他们。如果民间有能力推动这样的组织，往后教科书争议问题，就不只是官方、政党说了算，而是能够透过这些承沿以往南洋研究传统的团体来发声。

潘永强博士：



我想回应刚才锺伟前先生的建议，有关民间的机构去从事一些历史研究的工作。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私立或民办大学设立历史系，其实很多这样的工作应该由历史系来承担的，而不能期待民间团体或一些机构来从事这样的工作。譬如像当年南洋大学设有史地系，而南大也培养了不少本土的历史学者，并累积了相当的历史调查成果。所以，目前我们有很多私立大学院校，却没有设历史系，无法让这些工作纳入正规的大学学术体系，导致很多工作无以为继，也妨害了历史教育体系、独中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这些工作没有一个承接的步骤。因此，如果未来我们有条件的话，应该要求私立或民办大学创办历史系，这可能是比较长远且有意义的工作。

黄松奎校长：

刚才张荣强博士有提到一些华裔学生对国中历史教科书的看法。我相信除了内容外，根据我接触到的一些国中生，他们也有向我反映，教科书提到的有关马来文化的认识，他们不太容易掌握，因为即使是文字看得懂，不过内容却无法充分掌握。因为不少华裔学生对马来文化是十分陌生的，尤其对一些刚从华小毕业，然后进入国中就读的学生来说，他们能够认识的马来文，的确确要去了解马来文化，并不容易。所以我以为政府这套教科书可能只适合马来学生。

另外，早年由英国学者所写的马来亚史，虽然他们有一些具有官方政治背景，

不过不少还是以学者良心来书写，在他们的作品还会提到很多东西。早期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为了要培养东方英殖民地官员，以便更好的管理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他们会先把当地的具体情况一一介绍给这些要赴东方的官员，让这些官员来到东方后，能够知己知彼。这方面的资料，皇家历史学会马来亚分会，海峡殖民地分会都有出版年鉴，这当中不管谈到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等本地各族群的文化，都有相关宝贵的材料，甚至政治上的斗争，种族上的摩擦，都相当忠实的报导出来，这些资料是我们可以继续挖掘的学术宝藏。

张景云先生：

马来半岛的马来政体原是从苏门答腊沿袭而来的，而马来半岛很多马来人是从苏门答腊、亚齐、爪哇、苏拉威西等地移民来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其文化包袱，形成其文化视野的历史因素。所以，很多马来半岛的马来人，就像美国清教徒移民总会回头看他们过去的宗教历史背景一样，如美国肯尼迪总统就会回到爱尔兰寻根，诸如此类的情况。同样地，马来半岛的马来人也会出现相似的情意结，譬如亚齐发生问题，家族来自亚齐的巫统前部长山西努就会特别关注；而印尼独立战争时期，山末阿都拉在新加坡帮助偷运军火到廖内交给独立军。当时马来半岛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印尼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只看到国界的话，就看不清楚两者间的千丝万缕的历史关系。

另外，刚才谈到华文的本土历史研究的情况，当然我想过去前人的努力我们不能抹煞，不过我们也要有眼光看到前人的局限。我发现张礼干、姚楠和许云樵等人的研究，事实上很多都是照抄而已，是一种坐在书斋里面的学究式研究。当然历史学者要坐在书斋里面工作，不过很多时候也要走到田野的。当然，今天我们有理由菲薄自己，因为大马华人所做的华人历史研究真得不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想急起直追的话，西方人的治学精神要赶紧学习。西方人做研究，不论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他们总是从学好语文着手。譬如美国人在研究苏拉威西时，苏来威西存在不少语言，有的美国学者就只是研究苏来威西岛上某一个民族的一部史诗。所以，这些学者做研究时，都会去当地考察，不会坐在书斋里头。当然我们做学问研究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比不上西方人的条件。不过，纯粹坐在书斋的研究，是不可能做出相关层次的成果。我虽然不知道许云樵写北大年史，他是否到过北大年？不过，我觉得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那种南洋史著作已经非常的落伍。

詹缘端先生：

刚才谈到国别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面对政治正确的最大问题。它们切割掉文化、过去各民族、宗教和语言交流的状态。事实上，马六甲王朝的版图，就横跨苏门答腊和泰国南部，如果我们不想切割掉这些东西，就必须要将文化圈的概念引进来。事实上，文化圈的概念已经谈了近五十年，为何我们不好好利用？



先不谈旧方法，一定要在地化，语文障碍，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西方人治学精神，像有学者为了研究印度，装成印度人，一路到麦加朝圣，最后还差得改宗回教，这样的精神，我们大概很难学，当然未来要鼓励，也需要一些经济条件。其实，我们做文化、历史的研究，经常受限于我们独立以后的经验，解脱不开。如果，我们是回到历史去看，会发现其实这些人跑来跑去。就说占碑王子，跑过很多地方，最后落脚马六甲建国。如果我们要追溯文化渊源，他的名字明明就是印度教的名字。

张晓威博士：

我们在做本地研究，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政治问题。就拿国史来说，建国的时间究竟是1957年还是1963年，现在还是有争论，包括虽然马来西亚是1963年成立，但是它基本上，如宪法、政体等都是沿袭1957年的马来亚。再谈远一些，就如刚才詹缘端学长所言，如果用现在的国家观来割切的话，就会不完整。明明从整个东南亚来看，就是一个东南亚的文化圈，早期有印度文明的影响，随后回教、中华和西方等文明也陆续发挥影响，形成一个跨文化的东南亚文化圈。所以，在处理本国历史时，会碰到这样的瓶颈。

何玉万女士：

刚才大家好像扯远了，谈到学术研究去了。回到我们中学历史教育来谈论，中学历史教育有局限性，它不像大学的历史系的教学，就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教学。中学历史是一门通识的课程，当中又分为高中和初中，在高中的部份，我们会假定学生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思考和分析的能力，所以教科书的内容会采深入介绍一些史实，会多一些分析的内容。如刚才锺伟前先生所谈的，针对这些分析性的内容，我们在历史诠释是否要有一个定论，还是可以有结论开放的可能，或仅提供一些历史材料，让学生比较、判断那一种历史诠释他认为较合理。

事实上，在国外的中学历史教育，开始使用这样的方法，就是材料史实的教学内容，考试也使用这样的方式来测验学生。也就是假设学生已经具备了通史和一些相关

历史发展脉络的知识后，再提供一些历史材料，让学生去比较、分析、归纳，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回到华文独中，我们还是比较局限在老师讲，学生吸收。所以，这套新编的独中历史教材，我们尝试导正这种毛病。我们想看到，老师讲解了一些基本史实，学生可以根据掌握到的历史材料，建构出自己的历史知识。我们是尝试从这样的教学角度来编写这套教材。同时，也希望透过教材内容的设计，激发学生的一些思考和批判思维。换句话说，就是要挑动出学生念书，不是单纯的听老师讲，然后背史实而已，而且要训练学生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结论，而事件会有这样的发展，要有一些批判的思考能力。所以，这是独中历史教材的教育观。

另外，针对史实的部份，高中和初中的差别，大概就是高中部份会较深入的介绍，但是通史的概念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在初中部份，就是简单扼要将人类过去发展的脉络介绍和呈现出来。在内容的取舍上，哪些内容编进教材，哪些内容省略掉，重点是什么，一一罗列下来后，再用学生比较能够理解的文字水平编写出来，目的就是让他们在三年的学习后，可以大致了解人类过去历史发展。针对人类过去历史发展，我们又将其浓缩为马来西亚的历史发展。在这当中包括本地各族群的发展，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贡献和建设，尽量地全面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了解我们国家今日发展建设的历史由来。

此外，想谈一谈我对目前所从事的中学历史教育工作的一些个人经验心得，就是历史教育除了提供学生了解国家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的根源外，它还可以帮助学生思考我在这块土地扮演的角色以及未来可以做些什么。最后，回到国中的历史教科书，它必须根据国家政策来展开其编纂的工作，刚才锺伟前先生提到1973年国家文化政策，该政策规定必须以马来文化为国家主导文化，所以国中的历史教科书编纂都必须符合国家文化政策来进行撰写。因此，马来西亚史被看成是马来人的历史，这是变成政治主导教科书内容，成了无可避免的现象。换言之，政府推行什么政策，就会借由这些政策来诠释历史。诚如讨论提纲所指，各方皆服膺的大马历史，仅是高贵的梦吗？我觉得如果政府还是继续走向单元教育政策，这真的是一个高贵的梦。

主持人：

各位，因为场地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在十二点三十分前结束，以便清出场地方便下个活动的单位使用。我想我们还剩下几分钟，各位还有什么意见想发表。

张晓威博士：

谈到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撰写和原则，我想提一些意见。刚才翻阅了独中的历史课本，发现新版课本的第一刷是1990年开始出版迄今，事实上这十年已经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些已经遭到推翻的说法，就不应该出现在教科书内容里，应该定时更正。另外，想提出和大家讨论，我们在研究马来西亚时，譬如一些华裔先贤的名字，如叶亚来，这是英国人官方档案给他的称呼，但是事实上从他的牌位和墓志来看，他的原名应该是叶德来。所以，我们的教科书可不可以应该还原他的真名，称他为叶德来。又比如，郑景贵，在英国官方档案是被称为阿贵，不过这本独中教科书仍然沿用其原名，如何取舍，是否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张荣强博士：

我想建议从事中学历史教育的老师，不管在国中或独中执教者，不妨多利用历史考察的田野报告这个教学环节，鼓励学生从事田野调查工作，借此培养相关历史人材。

主持人：

在会议结束前，我做个总结。据我所知，本地民间团体举办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圆桌座谈会，今天恐怕可能是首次。2006年清华大学历史系也曾经办过类似讨论历史教科书的会议，主题也是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编撰座谈会，召集了当地重要的30多位学者参与，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也出席致词。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总结大家讨论的内容，就是大家基本同意本地历史教科书内容存在不少问题和争议。同时，针对编撰的方法，有人主张以文化史的角度来取代目前偏重政治史的取向，也有人强调要以整体的马来西亚人角度，而非某个单一的种族，而是多元视角出发。另外，有与会者认为本地史学研究方法太落伍，也有人建议民间应该组织起来，推动相关田野调查的工作，定时针对相关争议提出民间的声音等。最后，我非常感谢各位与会者，引言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编委们以及两位帮助摄录的资讯局同事，谢谢大家。

*潘永杰 董总资讯局研究员

从百家争鸣到合而为一： 检视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历史教育与历史教科书的演变

王丽兰*

一、前言

历史作为界定一个国家身份的工具，也会转变为编造历史的工具。于是历史的记述就会从沉思化为武器。¹

历史学家霍尔巴(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提到，历史其实就是主观地代表了某一些人的记忆。这些记忆是某一些特定的族群，特别是有权力的族群，例如社会的中坚份子、贵族的记忆。同时，历史更是属于有能力书写历史的人，或者掌握权力的人。过去确实曾经存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无法回到过去，重建过去；但，我们却有力量解释过去。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对于过去的认知，无法脱离当代的思维。而如今，历史教育更是沦为政治的工具，协助当权者达到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传诵。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是民族主义兴盛的年代，许多殖民地纷纷对抗外来殖民者，努力追求“国家”的独立。然而许多国家，诸如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原本并不存在“国家”(state)的概念。而为了建立国家(State)、国族(nation)，当权者必须创造出具有象征性的符号，来建构集体的国家意识。为了建立“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历史教育成为型塑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集体认同的方法之一。马来西亚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建立国族的概念？这个知识产制和认同建构的过程如何发生？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在不同时期如何面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更进一步思考，这个国家的历史包含了哪些内容和元素，这些内容如何呈现这个多元民族国家的面貌？这是本篇文章想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全球化的时代早已来临，国家的边界因网际网络以及劳工的流动而变得模糊。马来西亚独立至今53年，刚过了半个世纪；而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自1963年的统合，也已成立了47年，这个年轻的国家自独立以来面临了不少的建构与认同挣扎与危机，展望未来的50年，希冀从历史教育中，提供未来一些想象与实践的可能。

¹ 阿瑟·史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马晓宏译：《美国的分裂》，台北市：正中，1994年，页30。

二、历史教育与学校功能

周梁楷、张元的《方法论：历史意识与历史教科书的分析编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收录了各国的历史教科书的相关研究，探讨了英美日韩德等的历史教科书的相关议题。事实上，利用历史教育以及其它的社会科教育来形塑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是许多国家曾经以及目前使用的方法，亦可说是建构国家意识最直接与方便的方法。早在70年代开始，英国学者即对该国历史教育中过份着重重要事实的传授，以及偏向记忆力考评方式的传统做了检讨，重新思索了历史学的知识性质、历史应该传授甚么、历史对个人与社会有何意义等问题²。以英国的做法而言，是回归到历史知识的性质，并且在教科书编写的过程中，鼓励学生从问题出发，并导向一个寻找证据和资料的过程，最后得出结论，写下自己的看法。换句话说，英国的历史教育倾向开放式和探索式的教学，因此在教学法上也不是以背诵史实为主要途径。故此，教科书并非是只记载单方面的史实，更多时候是把具有争议性的历史事件多加描述，让学生自行探索来寻求答案。

而德国历史教育学家Joern Ruesen则明确指出，在教科书研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政治支配系统对学校的正当性，藉由社会化的过程，使孩童变成社会的一份子，使其符合政治生活的形式³。因此，每一个教科书的分析结果，都看得到政治牵连的影响。然而，Joern Ruesen强调教科书中的历史和学院式的历史学是不尽相同的。尽管我们了解历史必须说明真相、历史研究必须表现出对过去真实的要求，但是因为这些不可避免的政治势力的介入，使得学校中历史的教与学，基本上要符合国家教育的目标，而这目标并非在每一方面等同于科学研究的学院历史学的目标⁴。因此，这里的重点不仅是检视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同时该国的教育目标和课程目标也是研究的重点。职是之故，检视教科书的内容和历史教育的目的成为一个重要的交叉研究，检视并避免过度和不正当的政治势力对历史知识和教育的侵犯。然而，必须了解到，政治势力背后是意识形态的操弄，社会教育的最终极目标，往往是和这些意识形态做抗衡与拉扯。

其它亚洲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近年来的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编撰的争议，同时也反映了历史学与历史教育学两者之间的差异。这样的教科书争议尤以公民教育、民主教育和历史教育为主要的探讨对象，这些研究大多检视教科书内容的意

² 林慈叔、刘静贞，〈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及其理念试析〉，周梁楷、张元主编：《方法论：历史意识与历史教科书的分析编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竹：清大历史所，1998年，页313。

³ Joern Ruesen, 陈中芷译：〈历史意识作为历史教科书研究之事项〉，周梁楷、张元主编，页19。

⁴ Joern Ruesen, 陈中芷译：〈历史意识作为历史教科书研究之事项〉，页21。

意识形态的传递以及传布。马来西亚是一个标榜多元民族的国家，如何透过教育进行国民团结和国族建构亦是一个相当值得探讨的地方。而关于马来西亚的教育与国族建构的著作，其中在1970年代的 Chai Hon Chan 的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Plural Societies: The West Malaysian Experience* 和 John Charles Bock 的博士论文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A Study of Institutional Effect in Thirty-four Secondary Schools* 为独立初期的马来西亚做了系统性的整理和研究。

Chai的著作在1977年出版，正好是马来亚从英国手中取得独立满二十年，这研究正好可以反映独立初期的国族建构如何在教育的领域中努力。Chai从一个多元社会的观点出发，试图透过教育政策、学校体制的重整与修改、当时社会经济情况做一个全观式的了解。Chai检视了国族建构中的国语政策以及联邦宪法中马来人特权的保障，以及自独立以来的教育政策的演变，是一个逐渐修正国内族群关系和马来人受教权的过程。同时，Chai把焦点放在民族融合和国族建构的议题上去探讨，发现种种教育政策的实施和教育体制和体系的改革，可以确定当时马来西亚教育部视教育为两个主要的功用，其一作为一个重要的建构国家认同的工具，其二加速马来族群在社会和经济上的流动之重要途径。然而，Chai认为要达到第一个目标需要强调政治身分上的“马来西亚人”的认同；然而，要达到第二个目标，则又必须分化国内的族群为“土著”和“非土著”，并强调两者的差异⁵。然而，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分化族群，并且透过不断的强调“土著”的优越与特殊性，来说服国内其它族群接受“唯土著为尊”的各种政策，以便成全马来族群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向上流动。可见，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的教育便背负着一个两难、尴尬的使命——透过教育，即要塑造国人共同的认同，又要提升某些特定的族群的社会流动；尽管五十年过去，国家的教育议题仍然围绕着这两个议题在打转。

而另一本一样是针对教育与国族建构的研究，由John Charles Bock⁶在1966-1967年在马来西亚34所中学进行问卷调查，以观察不同学校、学制、教学媒介语、学生的民族比例、地理位置等因素与族群融合和互动以及国族建构的影响。Bock选取了17所英语学校、6所马来学校、6所华人居多的学校(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学生都是华人)以及5间华文学校为调查对象。Bock透过制定几个变项，例如政治倾向、国家认同、集体认同、政治参与度等作为测量的依据，并以四种不同类型的学校作为研究对象，以便了解社会经济与学校类型的交互作用，对于国族的建构与族群的互动造成甚么影响。这项在1960年代末的研究，针对不同类型的学校所进行的国族认同调查，反映了那时候在独立后十年间的学校状况。

⁵ Chai, Hon-Chan,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West Malaysian Experience*,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7, p.58.

⁶ John Charles Bock,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A Study of Institutional Effect in Thirty-four Secondary School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1.

Chai 和 Bock 两人的研究有一个类似的结论，认为把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订为教育的目标，是主要影响和决定国族建构的成功与否。Bock的观察是，学校体制本应是促进各族学生的互动和了解，但是其中以民族身份作为许多政策的制定准则，引发民族间的竞争和不安，无助于国族的建构，且是与强调国民团结一致的国民精神有违的。无论如何，这是在1970年代为止的研究成果，至于目前已经独立超过五十年的国家，教育在国族建构的过程又陆续扮演了甚么样的角色，建构国家形象和历史意识的历史教育，又是如何在这五十年配合教育政策与理念在勾勒出“马来西亚人”的形象，这些都是本研究陆续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马来西亚在国民教育体制下已经统一了学校制度，即废除了当时的英校和华校，改制成国民中学。一些华校不愿意接受改制而转型为华文独立中学。然而，国民中学目前的学生亦来自不同民族，其中以华巫印为主，和Bock当时所进行的英校的学生民族比例接近。而问题是，当时的研究结果显示英校的结构并没有增加族群之间的了解和融合，而现今的国民中学的现况又是如何呢？可惜的是，我国严重缺乏这领域的系统性研究，就笔者搜集资料的结果，在1980年以后就没有系统性的、大规模及类似的研究成果。而本文章欲努力的方向，可说是做为一个基地台，先检视国民中学学生所使用的历史课本，以及为他们所制定的历史教育，来了解国族建构和认同的内容。笔者试图透过文献探讨和内容分析的方法，来了解历史教育在马来西亚国族建构的过程扮演甚么角色。

三、历史教育的教学目标与目的

消灭一个民族的第一步就是抹去它的记忆，毁掉它的书籍，它的文化，它的历史。⁷

历史教育作为一个建构历史记忆、培养国民团结、融合与爱国精神的机制，其功能就在于透过历史教育的目标的制定、课程内容的规划和教学过程来建立集体认同。

我们教历史是因为在很多先进国家给年轻人的教育中，是一个重要的部份。因此，我以及其它的教育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历史应该做为每一个人的基础教育。⁸

东南亚历史学者王赓武以他于1960年代在马来西亚教历史的经验，认为历史教育应被视为基础教育，显现历史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角色。马来西亚的历史教育在1980年

⁷ Milan Kundera,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Penguin Edition, 1981, p.3.

⁸ Wang Gung Wu,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Southeast Asian Context" in Zainal Abidin Abdul Wahid(ed.), *History Teaching: Its Problem in Malaya*, Kuala Lumpur: Histo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Malaya, 1964, p.1.

的教育改革中，制定了历史教育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加强学生学习历史的技能⁹。此外，历史教育的理念也关注在整体历史过程的内在结构，其中特别强调三点：在历史过程中寻找模式和典范、了解历史进程、了解历史过程的终极目标¹⁰。透过历史教育的教学过程，学生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得历史知识，而是透过对过去的了解，具备为未来的发展做诠释的能力。而在马来西亚这多元民族的国家，历史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团结国民、塑造一个公正和和平的国家。因此，历史教育必须灌输学生国民价值、忠于国家、且以身为马来西亚人为傲以及爱国爱民的思想和精神，同时训练学生以具备批判能力，和勇于追求真相的精神。

由马来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Abd. Rahim Abd. Rashid所出版的《KBSM历史教学的模式与途径》(*Model dan Pendekatan Pengajaran Sejarah KBSM*)一书中明白指出四个部分做为历史教学的指南，内容分成四个部分即“历史课程”、“教师规划”、“历史教与学”和“测验与评量”。马来西亚教育局在1980年开始进行课程方面的改革，称为“中学课程统整”(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KBSM)，这样的改革是为了能够和国家教育理念更加贴近，培养有知识、有道德、负责任、有能力自我完成、贡献社会的公民，正如国家教育理念(Falsafah Pendidikan Negara)所言：

马来西亚的教育是一个发展个人的潜能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为了要培养在智商、情绪、体能都均衡发展的人们，并且服从信仰和上苍。这个过程也是为了培养有智能、有良好品德、负责任、有自我完成能力、和对国家做出贡献的马来西亚国民。¹¹

本着这样的教育理念，历史教育被认为是培养公民道德和国民精神的主要科目，课程目标是要培养马来西亚公民忠于国家和以国为傲的精神，即培养一个集体的“我族”的概念。因此，历史课程内容的选取，都要符合提升公民的精神，例如提高公民对于这片土地的觉醒、反省、尊敬、珍惜等情感。KBSM历史教育的七大理念是¹²：

- (一) 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了解社会与国家的发展。
- (二) 了解和珍惜马来西亚的社会和文化并在日常生活中培养。
- (三) 珍惜为独立而奋斗的伟人的功劳和努力。
- (四) 在了解社会和国家的情况和现实中，拥有历史的觉醒。
- (五) 客观地分析、归纳和评估国家的历史事实。

⁹ Haji Omar bin Mohd. Hashim, “Falsafah Pendidikan Sejarah”, in *Sejarah Dalam Pendidikan, 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Wilayah Persekutuan*. 1992, p.4.

¹⁰ Haji Omar bin Mohd. Hashim, “Falsafah Pendidikan Sejarah”, in *Sejarah Dalam Pendidikan*, p.5.

¹¹ Abd, Rahim Abd. Rashid, *Model dan Pendekatan Pengajaran Sejarah KBSM*,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7, p.3.

¹² Abd, Rahim Abd. Rashid, *Model dan Pendekatan Pengajaran Sejarah KBSM*, p.3.

(六) 透过历史经验中的典范，提高思考和成熟度。

(七) 愿意参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

历史课程的内容做为承载国民思想和爱国意识的工具，在内容部份特别注重马来西亚的历史以及国民精神的培养这两点。在国家历史的部份，又分成三个层次，其一为“我族观点”的国家起源史观，从十五世纪的马六甲王朝开始一直到现代国家的成立、制度的制定等。马六甲王朝被当作是国家历史的开端，原因是早在当时就已经存在“马来政府”，其社会制度与文化更是延续到现在，因此这时期被当作是“马来西亚的起源”，一个国家的起源的观点。其二，为微观的史学观点，以地方历史事件做为分叙述对象，在内容中描述与国家历史发展相关的人物、机构、物品、事件、仪式和文化。其三为与本国相关的外国史，例如欧洲工业革命、航海时代、殖民历史、二次大战时期日本的入侵等。纵观这三个层面，皆是从我族观点出发来讲述历史，因此教科书所建构的史观是从十五世纪开始，以及之后本土的一些事迹，以及与本国相关的外国史，或称“外交史”。

马来西亚中学五个年级的课程中，历史都是必修的科目。主要区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初中(Sekolah Menengah Rendah)的三年，即初中一至初中三(Tingkatan 1-3)；和高中(Sekolah Menengah Tinggi)的两年，即中四至中五(Tingkatan 4-5)。初中历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以及教学理念是让初中生对国家历史有一个较全观式的体悟，了解历史与自身关联，以及了解国家和社会所发生的事情，以便了解社会以及国家的发展，以及各种社会变化的因素。同时也加入和国家有关的外国史，以便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¹³。而高中的历史课程教育目标是希望学生有一个较宽广的视野去了解国家的社会发展。其中在课程大纲里强调要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特别是在多元民族的国家，学生应透过课本了解国家的发展，用理性的思考来看待国家¹⁴。

四、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分析

在学校里的历史教学的活动中，历史教科书是最重要的媒介。当然还有其它的因素影响一个学生的历史意识，例如家庭的传统习俗与文化、电视等，但是透过学校的指导下的历史教科书还是主要的。¹⁵

¹³ 参阅Kementerian Pendidikan,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P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Kuala Lumpur: PPK, 2000, p.8.

¹⁴ Kementerian Pendidikan,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P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p.9.

¹⁵ Joern Ruesen, 陈中芷译：〈历史意识作为历史教科书研究之事项〉，页1。

德国历史教科书研究者Joern Ruesen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及，透过研究历史教科书进而了解历史意识，必须关注教科书是否符合历史教学的目的和规定¹⁶。此外也提醒研究者教科书研究是严谨的学术议题，尽管当中政治的和社会的为了权力的斗争，是必然存在的。因此，透过分析教科书的内容，即可了解学术、教育与政治如何在行文中显露出自己的身份。而研究者必须了解，当中的斗争背后的目的，以及所形成的论述，甚至到其所造成的影响。以下就笔者所搜集到的历史教科书做一个初探式的比较，其中涉及到的时代久远，故一些系列教科书因而未列入此篇文章中。

(一) 百家争鸣：从马来亚独立(1957年)到KBSM制度的推行(1980年)

一个国家从预备独立到真正从殖民母国手中取得独立实权，可谓一个冗长的过程。在国家教育方面，更是亦步亦趋。马来西亚在独立初期，即从1957到1966年之间，以小学历史教育的课程大纲为例，其和新加坡小学的课程大纲是一样，当时所使用的教材亦是沿用独立之前的教材¹⁷。直到1967年，马来西亚教育部的课程发展局推出中学历史课程大纲，才大致确定了中学的历史课程的主题与内容。初中的课程大纲主要适用于13岁到15岁，从初中一到初中三的学生。初中一的课程大纲中，分成三个部份，即第一部份，早期亚洲历史(东南亚、印度、中国)；第二部份，早期欧洲历史(希腊和罗马)；第三部份，世界重要宗教(兴都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初中二的课程大纲中则注重在两个部份，即第一部份是亚洲历史，内容包括马六甲王朝、印度的Moghul王朝、中国的元朝和明朝。而第二部份是欧洲历史，内容包括封建制度、文艺复兴、以及科学的发展等。至于初中三，内容也是着重在两个部份，一是工业和社会革命；二是亚洲历史，包括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历史¹⁸。这样的课程大纲安排着眼于世界历史，希冀以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观看人类文明的演进，从而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寻找到自身的定位。然而，这样的大纲却被认为是过于注重外国史而轻忽本国史，甚至被本土学者冠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大纲¹⁹。

从1960年代的课本内容中便可辨识出课程大纲在不同版本中所呈现的面貌。以本研究所收集到的三个版本的初中历史课本中其中之一版本来观察，便了解当时的历史教育是甚么面貌。以1964年W. Williams所撰的*Malaysia in World History for Secondary School*系列教科书为例，历史教科书在1960年代的内容是涵盖了世界历史和本国历史的，尽管当时的世界历史亦是指欧洲和中国与印度。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历史的部

¹⁶ Joern Ruesen, 陈中芷译：〈历史意识作为历史教科书研究之事项〉，页19。

¹⁷ Norrizan binti Seman, *Perkembangan Pendidikan Sejarah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1874-2002)*, Unpublished Thesis, Faculti Sastera dan Sains Sosial, Universiti Malaya.2003, p.62.

¹⁸ Kementerian Pendidikan, *Sukatan Pelajaran Menengah-Sejarah*, Kuala Lumpur: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1966.

¹⁹ Norrizan binti Seman, *Perkembangan Pendidikan Sejarah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1874-2002)*, p.71.

分，印度和中国历史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由当时檳城马来亚教师学院的历史课讲师 W. Williams在1964年所撰写的初中一的*Malaysia in World History for Secondary Schools: Malaysia and The Ancient World Book One* 的内容大纲包含三个部份(见表1)，一是西方文明；二是东方世界；三是马来亚和东南亚。而初中二的*Malaysia in World History for Secondary Schools: Malaysia in a Changing World Book Two* 的内容大纲包含三个部份，其主题的分布与安排和初中一差不多，唯内容为初中一课程大纲的延伸。而初中三的*Malaysia in World History for Secondary Schools: Malaysia and the Modern World Book Three*的内容则是早期文明、古代王朝和世界宗教历史。从三个年级的各个章节主题来看，1960年代的历史教育，在题材上确实较注重世界历史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和东方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发展。从60年代的课本内容的安排显示历史课本并没有特别以马来西亚或本土历史为主，而是根据世界历史中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特别将焦点放在西方以及东方文明古国的政治发展，例如中国的汉、唐、宋朝，印度的王朝等等。按章节题目分类成本地主题和非本地主题的结果比例表如下：

年级	本地主题章节数	比例	非本地主题章节数	比例
初中一	7	30%	16	70%
初中二	6	35%	11	65%
初中三	4	27%	11	73%

表1: W. Williams, *Malaysia in World History for Secondary Schools*(1964)之系列教科书章节主题分布表。作者自绘。

在高中的课程大纲方面，分成四个主题，即 Tanah Melayu 历史 (1940~1945)、英国殖民时期 (1740~1945)、Tanah Melayu 住民的历史(印度、中国、伊斯兰教、兴都教的发展、希腊罗马人的贡献)、以及殖民与解放的发展(荷兰和殖民母国以及其殖民地)。当时课程局所制定的上课时数是一星期120分钟²⁰。然而，在高中的课程，因为考试制度的设计，学生可在三个历史考卷中选择其中两个来应试，这三个试卷的主题为东亚和东南亚历史(1824~1954)、世界历史(1497以前)和伊斯兰教历史。在这个阶段并没有指定的教科书，学生自行选择参考书²¹。在当时较常被使用的参考书，以西方学者所撰写的为主，例如：K.G. Tregonning(1964)所写的*History of Modern Malaya*, J.M. Gullick(1964)所写的*Malaysia and its Neighbours*, R. Emerson(1964)所写的*Malaysia*, D.G.E. Hall(1964)所写的*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R. Turner所写的*The Great Cultural Tradition*, B. Lewis所写的*The Arabs in History*以及H.A.L. Fisher所写的*History of Europe*²²。

²⁰ Norrizan binti Seman, *Perkembangan Pendidikan Sejarah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1874-2002)*, p.72.

²¹ Norrizan binti Seman, *Perkembangan Pendidikan Sejarah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1874-2002)*, p.73.

²² Norrizan binti Seman, *Perkembangan Pendidikan Sejarah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1874-2002)*, p.74.

从60年代的课本可以了解到其在教科书中所谈论关于“国家的形象”和“国家的历史”是相当缺乏的。研究马来西亚自英殖民时期的1876年至2002年的历史教育的Norrizan binti Seman就认为在60年代的历史教育是充满了西方的观点的。在课本内容中不仅强调英殖民政府的贡献，更是鲜少提到本土的伟人或是有贡献的人。当时好几位在中学和大学教书的老师，就针对在马来西亚教历史的困难集结了一本论文集，探讨历史教师在教学现场所面对的问题，其中他们认为教材的不适用，缺乏本土思维的教材对学生来说确实相当困难。王赓武更是强调马来西亚的历史教育应更注重其身处在东南亚的地域性特质，因为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历程中，地域性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²³。

在197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中，最大的调整在于马来西亚和世界历史的比例有明显的改变。在1960年代许多历史教科书还是以英文来书写，而马来文版本的教科书经常也是由英文教科书直接翻译成马来文，因此被本土历史教育学者认为教科书中不仅本土的历史内容被忽略，也无法配合国家发展的需要。故在1974年和1978年陆续制定了课程大纲，提供予教科书作者参考。

1970年初中教科书也有不同的版本，然大多为马来文的版本。本研究以其中一个版本为例，由Zainal Abidin b. Abdul Wahid, Khoo Kay Kim 和 Muhd. Yusof bin Ibrahim 等人合作撰写之初中历史教科书《历史课程》(*Kursus Sejarah*)。这三本有关本地与非本地的主题大致上是分布得相当平均，初中一的重点以介绍马来西亚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发展为主，从东南亚古王朝开始，以东南亚历史为主要的切入点(见表2)；而初中二将大部份章节用来介绍马来西亚和西方势力的拉锯战，以及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雏形；初中三的内容重点是国家的成立，即马来西亚的建国过程，包括党团的成立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系列中没有任何一个年级中的内容有包含到马六甲王朝。由此可见马六甲王朝被视为是马来人在马来土地(Tanah Melayu)上掌握主导权力的证据以及象征，在1970年代的初中课本上是尚未被塑造或建构出来的。

年级	本地主题章节数	比例	非本地主题章节数	比例
初中一	8	67%	4	33%
初中二	9	69%	4	31%
初中三	10	77%	3	23%

表2: Zainal Abidin b. Abdul Wahid, Khoo Kay Kim & Muhd. Yusof bin Ibrahim, *Kursus Sejarah* (1977-79) 之系列教科书章节主题分析表。作者自绘。

²³ Wang Gung Wu,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a Southeast Asian Context”, in Zainal Abidin Abdul Wahid(ed.), *History Teaching: It's Problem in Malaya*, 1964, p.7-10.

在高中方面，1975年由G.E. Saunders 和N.Rajendra合写的《世界历史第4册：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1400-1970)》(*Tawarikh Dunia Buku 4:Malaysia, Singapura dan Brunei 1400-1970*)。而另外由在丹絨马林(Tanjung Malim)的Maktab Perguruan Sultan Idris教书的Haji Harun Bakar所撰写的中四历史教科书《马来西亚中学历史：中四适用》(*Tawarikh Sekolah Menengah Malaysia: untuk Tingkatan 4*)，是根据国家语文及出版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在1974年所制定的课程大纲而撰写的。这两本教科书的内容都是和马来西亚相关的历史。《世界历史第4册：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1400-1970)》从马来亚的早期历史开始，紧接着是马六甲王朝一直到马来西亚在1963年的成立。而《马来西亚中学历史：中四适用》则以马六甲王朝拉开序幕，同样是在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中结束。当中的内容主要针对英殖民政府在马来西亚半岛和东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以及战后的影响。这两本教科书着重在马来西亚政治史的演变，从十五世纪开始到二十世纪，贯穿王朝的兴衰、殖民政权的入侵与撤退到新兴国家的建立。在同时期的初中教科书中相关马六甲王朝的历史、殖民时期政权以及国家的建立过程都在高中阶段予以加强。

由于在这时期的历史教科书版本众多，故无法在文章一一尽录。然而，我们也得以从众多不同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发现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长达三十年时间，马来西亚的教科书是“一纲多本”，即由国家语文及出版局制定教科书内容大纲，由各家出版社和作者进行内容的撰写。尽管有大纲，但是各家的教科书在内容的比例和撰写上略有不同，因此，可谓百家争鸣的时期，在同一个大方向上，有不同角度和方法的诠释与书写。

(二) 合而为“一”：KBSM制度(1989年)至2009年

1979年由时任教育部长的马哈迪组织“检讨教育政策内阁委员会”，提出“内阁检讨教育政策实施委员会报告书”(Laporan Jawatankuasa Kabinet Mengkaji Pelaksanaan Dasar Pelajaran)，报告书中强调从前过于强调以学科为本位的课程设计造成学生的负担，而建议中小学课程应该分成两大部份，第一部份包括学校课程大纲与所有学习的学科内容；第二部份则包括课外活动。报告书中亦检讨和评估了马来西亚社会现况，主张学校课程规划的目的在于认知、技能、价值、知识、文化以及成为国家社会一员的教育计划。报告书中亦强调，在国家的脉络下，课程规划的目的主要培养能表达国家情感的人民，实现以国家原则(Rukunegara)为方向的统一目标²⁴。

伴随1979年马来西亚“内阁检讨教育政策实施委员会报告书”而来的是KBSR和KBSM的改革。这个意为“小/中学综合课程”主要是以教育理念为实施要点，从1980年开始实施至今。其主要目的为培养效忠国家和以国家为傲的精神。有鉴于历史教育是建构国族的重要工具，KBSM规定历史为中一至中五的必修课，并且把五年的课程拆

²⁴ Mahathir bin Mohamad, *Laporan Jawatankuasa Kabinet Mengkaji Pelaksanaan Dasar Pelajaran, Kuala Lumpur: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79, p.66.*

解成两个部份，初中(中一至中三)和高中(中四至中五)。在初中的阶段，主要是提供对国家历史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在初中的部份以各个主题来叙述马来西亚五百年的历史²⁵。为了培养爱国精神以及加强学生的国家意识，在初中的课程规范中，加入了“本地历史”的元素，鼓励学生学习和了解本土的历史，从自身出发。而在高中的部份，则加入世界文明历史，以便让学生了解马来西亚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基于此，在人类文明历史的内容中，分成马来西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两大类。KBSM在1989年开始在初中一实行、1990年在初中二实行，以此类推。KBSM主要将知识、价值、技能、态度、潜能和智力发展结合，因此，课程内容以及老师在教室内的教法，是决定学生学习效果的关键。

以下以马来西亚教育部以及国家语文及出版社在1996年联合出版的《历史》(Sejarah)系列教科书，作为主要的观察对象。自KBSM课程推行以来，课程内容方向上的改变，是相当明显的。以初中一内容主题的分布来看，以马六甲王朝以及马来州属的历史为主轴，为中学生带来中等教育的历史知识与学习(见表3)。从下列的主题分布表中可以发现，马六甲王朝作为中学第一本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其是以“马六甲王朝”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开端。在第二章“马来亚史前史”的部份，以三个次主题为主，即“人类最早的居住地在哪？”、“人类生活方式如何进展？”、“马来群岛的早期港口”来交代马来亚史前史的部份，以一章的篇幅来说明十四世纪以前的马来群岛/半岛的历史。实际上，在马六甲王朝以前，有若干东南亚古王朝的领地包含现在马来西亚的土地范围，然而，这样的历史不被选择放进具开宗明义启示的初中一历史课本中，反以强调马六甲王朝的开端以及发展为主。其欲以马六甲王朝的兴盛作为在这土地上的正当性理由由此开始建构和塑造，而马六甲王朝的政治、文化也被当作建构“马来西亚”的形象和符号的代表。

1996年初中一历史教科书		
主题	章数	百分比
历史知识	1	8%
马来亚史前史	1	8%
马六甲王朝	5	42%
马来州属	3	25%
东马	2	17%
总数	12	100%

表3: 1996年初中一历史教科书主题分布表，作者自绘。

²⁵ Wan Mohd. Zahid bin Mohd. Noordin, “Pendidikan Sejarah di Sekolah Rendah dan Menengah (KBSR/KBSM): Objektif dan Pencapaian”, in *Sejarah Dalam Pendidikan*, 1992, p.28.

初中二的教科书分成三个主要的部份，即“殖民政权的入侵”、“外来政权掌握本土资源”以及“对抗外来殖民政权”（见表4）。此初中二的内容延续初中一内容所营造的辉煌马六甲王朝历史，以及其在贸易、文化和宗教上的成功，以致引来外来政权的觊觎，最终落入外人的手里。而初中二内容介绍英殖民如何从葡萄牙手中“争夺”海峡殖民地、其它马来州属以及东马地区。内容以一章介绍英殖民政权在马来亚掌握资源的实例，例如发展橡胶业、锡矿业、铁路等。而“外来的劳力”例如印度劳工和华人劳工，巧妙地安排在这一章名为“(外来政权)掌握我们的资源”(Penguasaan Terhadap Hasil Bumi Kita)的章节中。而另外两章的“对抗外来政权”的内容主要描述当地马来人如何透过杂志、报纸、社团等具体行动来对抗英殖民的控制。从初中一到初中二的教科书内容，可以看到其以“丰富的资源—被外人抢夺—努力对抗以取回”这样的论述逻辑来形构一个国家的形象，作为培养和教育下一代要爱国、保护国家以免受外人侵害的基础论述。

1996年初中二历史教科书		
主题	章数	百分比
英殖民介入马来半岛	3	38%
英殖民介入东马	2	25%
英殖民掌握资源	1	12%
对抗外来政权	2	25%
总数	8	100%

表4: 1996年初中二历史教科书主题分布表，作者自绘。

在初中三的教科书中，也大致分成四个部份，即“日本及马共的威胁”、“建构国家的过程”、“马来西亚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史”、“马来西亚与国际”（见表5）。从主题内容的比重来看，初中三的内容重点在于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政治发展史。从二次大战后日本的撤退，英殖民重回马来亚和东马地区，但是此时因二次大战后的民族主义风潮的影响下，英国政府也在酝酿殖民地的自治。此一过程从1948年一直到1957年，在政治、宪法、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不断调整，才有独立的实践。根据课程大纲中所明示的教学目的，此一过程必为国民所了解，才能培养爱国之心。

1996年初中三历史教科书		
主题	章数	百分比
日本和马共的威胁	3	23%
国家的建立	7	54%

近代政治社会发展	2	15%
马来西亚与国际社会	1	8%
总数	13	100%

表5: 1996年初中三历史教科书主题分布表, 作者自绘。

至于中四的教科书内容, 因学制的关系, 和中五属于高中阶段, 因此在主题上也有明显的分别, 从初中的教科书中强调国家的历史, 转而是到世界历史的部份(见表6)。内容可大致分为四个部份, 即“古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世界的发展”、“国际社会的合作”。伊斯兰文明作为独立的一章, 以“伊斯兰改变人类文明”为主题, 叙述伊斯兰教的起源、教义到其在东南亚的发展。在西方历史的部份, 介绍西方社会经历的黑暗时期、文艺复兴、政治思潮的发展、以及殖民主义的发迹。在最后一章以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反抗殖民主义收尾, 再次强调外来政权的不友善以及本土思维的重要性。

1996年中四历史教科书		
主题	章数	百分比
人类古文明	1	16.6%
伊斯兰文明	1	16.6%
西方社会历史发展	3	50%
国际社会的合作	1	16.6%
总数	6	100%

表6: 1996年中四历史教科书主题分布表, 作者自绘。

1996年版本的中五历史教科书, 从主题内容的分布与安排上, 容易被归纳成为是中学历史的总和(见表7)。主要因为其主题重复前四年的内容, 唯以一种归纳和总结的形式来为历史事件作价值判断。内容分成四个部份, 即“东南亚古文明”、“外来政权的入侵”、“马六甲王朝的延续”以及“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以“马六甲王朝的延续”为例, 内容中强调现今许多马来传统文化和礼仪皆从马六甲王朝时代开始, 因此在“传统需要被记取”的宣导下, 历史教科书也扮演建构与型塑“国家文化”的角色。

1996年中五历史教科书		
主题	章数	百分比
东南亚古文明	1	14%

马六甲王朝的延续	1	14%
外来政权的入侵	1	14%
马来西亚政治社会的发展	4	58%
总数	7	100%

表7: 1996年中五历史教科书主题分布表, 作者自绘。

综观1996年的历史教科书, 可发现在五个年级之中的内容已经大部分从外国历史或以西方中心论的观点, 转变为具本土意识和本土历史为主的内容。从所有章节中, 和本土相关的主题数和非本土相关的主题数量已经是有很大的差异(见表8)。由此可发现马来西亚的历史教育以本土历史为主, 外国历史为辅的策略, 藉由多描述本土历史, 来培养学生爱国爱民的意识, 同时建构学生对于国家过去的集体记忆, 来达成国家认同。

年级	本地主题章节数	比例	非本地主题章节数	比例
中一	12	100%	0	0%
中二	8	100%	0	0%
中三	13	100%	0	0%
中四	0	0%	6	100%
中五	6	86%	1	14%
总数	39	85%	7	15%

表8: 1996年中一至中五历史教科书本土与非本土主题分布表, 作者自绘。

自1980年的课程改革之后, 历史教育的课程内容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仅在教科书的章节上做一些微调。而从1980年至今, 也大约三十年, 这将近三十年来的历史教科书的内容, 在大方向上即是1996年版本中所呈现的模样。对于自独立以来, 历史教科书内容的演变, 笔者大致上已分成两个时期来描述, 然而这样观察和统计教科书内容章节的数量, 为一个较粗糙和基本的运算结果。从这个基本的演算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 大致上不离这些年来国家领导层所贯彻的爱国意识的推动与灌输。然而, 我们所未知的更多, 例如这些章节内容中小标题的呈现方式、书写技巧、内容的撰写风格等。

有鉴于2003年和1996年的版本在章节分布与安排上差异不大, 研究者进一步观察2003年的教科书的版本内更细微的内容分布, 以不同民族历史为分析对象, 即有关国

内民族(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原住民(orang asli)以及东马原住民族)相关的历史记述和记载,以一小标题下段落为分析单位,统计出2003年版本中各族历史的记载情况。结果发现(表9),纯粹以族群历史记载在教科书中的,以马来族最高,共计100个段落,占73%,其次是原住民族,共计19段落,占14%;顺位第三的为华族,共计12个段落,占9%;最后是印度族,共计才五个段落,占4%。

内容	年级					总数	百分比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马来人相关历史	31	28	8	17	16	100	73%
华人相关历史	1	7	2	2	0	12	9%
印度人相关历史	0	4	0	1	0	5	4%
原住民族相关历史	17	2	0	0	0	19	14%
总数						136	100%

表9: 2003年中一至中五历史教科书各民族历史分布表, 作者自绘。

从以上统计五个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中各族的历史记载的段落来看,历史教科书在五十年间的转变是相当大的。本文章从1960年代开始所做的内容分布上的统计,可以明显看到内容趋向本土化的方向在前进,这样的演变实际上和国家教育理念是一致的。至于本土化的内容是甚么面貌,又是一个吊诡的问题。从2003年版本的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族群历史分布的版图来看,这个本土化,却是等同于马来族的。1980年代课程改革以后,教育目标期待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以及认同感,然而在历史教育这个攸关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媒材方面,却是做了一个这样“本土化观点”的选择。这个合而为“一”的“一”并非是指“一个马来西亚”,而是“一个族群”,某个族群。历史教育本土化的过程,是马来西亚在后殖民时代一个重要的观点的转变。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来讲,亦是一个建构国族与塑造国家认同关键性的过程。历史教科书内容应该呈现甚么面貌、如何诠释、如何书写、书写甚么等,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课程内容书写的议题,它涉及的层面和议题,正如文章前半部所强调的,是一个富政治性意涵的议题。而我们从事教科书内容分析,正是要检视当中隐含的政治意识形态。

五、结论

本文仅以检视马来西亚的历史教育,以及自1960年以来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提供历史教育的目的与目标,以及教科书内容的编排与分布的面貌。主要目的在于为我国历史教育做一个历时性的研究,以进一步论述其在国族建构过程所扮演的角色。本文以内容分析的方式,概略性的分析自1960年代开始到200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发现其在内容中的转变是惊人的。第一,教科书内容从篇幅较多的外国史的部份,转变成以

本国史为主，其目的为配合历史教育为培养国民精神的主要工具。第二，以叙述内容来观察，发现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的外国史，很大部份是中国史和印度史，主因乃是为了促进国内三大族群在背景上、文化上的互相了解；然而在KBSM推行以来，这些历史都排除在课程内容之外，取而代之的是马来西亚建国过程或马六甲王朝时期的历史，以加强国内族群对于主体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与认同，更强调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即以马来社会为主导的国家。第三，从1980年代以后的教科书内容至今变化不大，内容大致确定为85%的本国史(本土历史)以及15%的外国史(世界历史)。第四，在85%的本国史内，从民族历史的角度切入分析统计，发现在有关民族历史的记述中，有73%是马来人的历史、14%是原住民的历史、9%是华人历史以及4%是印度人历史。

从马来西亚历史教科书五十多年来的变化，可以观察到其从百家争鸣的状态到198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社会开始取得稳定发展的同时，教科书内容也趋向合而为一的趋势。然而，这个合而为一的“一”是否是真实呈现了马来西亚的面貌，或是否为其它少数民族所接纳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其中历史教育的目标是“客观地分析、归纳和评估国家的历史事实”，并且“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了解社会与国家的发展”，那么如此忽视国内少数民族/族群的历史教科书，如何培养各族学生对国家的认同、如何能达成预设的教学目标？我们不仅急迫需要公开透明的历史教育教学评鉴的成果报告，更缺乏历史教育与国族建构之关系的研究，还迫切需要更多学者、教师、家长和社会的关注。马来西亚历史教育已经经历了五十多年，在未来的五十年应该如何走下去？面临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国家边界因人口和劳工的流动以及网际网络的流通，而需重新定义的同时，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能够凸显国家主义以及国家特色，已经是目前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的挑战，马来西亚更是到了正面迎战这问题的时候。

*王丽兰 国立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与历史学系双主修毕业，现为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硕士生，研究兴趣在马来西亚社会教育，民族关系，公民教育，公民社会发展等。Email: leelan2003@hotmail.com

董宗
DONG ZONG

教材课程研究

参考文献:

阿瑟·史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 马晓宏译, 《美国的分裂》, 台北市: 正中, 1994。

周梁楷、张元主编, 《方法论: 历史意识与历史教科书的分析编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新竹: 清大历史所, 1998。

Abd. Rahim Abd. Rashid, *Model dan Pendekatan Pengajaran Sejarah KBSM*,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7.

Bock, John Charles,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A Study of Institutional Effect in Thirty-four Secondary School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1.

Chai, Hon-Chan,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West Malaysian Experience*,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7.

Federation of Malaya, *Official Year Book*, 1961.

James, Ongkili,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1946-1974*.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Kementerian Pendidikan, *Sukatan Pelajaran Menengah-Sejarah*, Kuala Lumpur: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1966.

Kementerian Pendidikan, *Sukatan Pelajaran, Kurikulum P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Kuala Lumpur: PPK. 2000.

Kundera, Milan,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Penguin Edition, 1981.

Mahathir bin Mohamad, *Laporan Jawatankuasa Kabinet Mengkaji Dasar Pelajaran*, Kuala Lumpur: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79.

Muhammad Yunus Hamidi, *Sejarah Pergerakan Politik Semenanjung*, Kuala Lumpur, 1961.

Norrizan binti Seman, *Perkembangan Pendidikan Sejarah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1874-2002)*, Unpublished Thesis, Faculti Sastera dan Sains Sosial, Universiti Malaya. 2003.

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Sejarah Dalam Pendidikan*, Persatuan Sejarah Malaysia, Cawangan Wilayah Persekutuan. 1992.

Zainal Abidin Abdul Wahid(ed.), *History Teaching: Its Problem in Malaya*, Kuala Lumpur: Histo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Malaya, 1964.



马来(西)亚国民小学华语课程的设置与沿革: 1945-2003年的教育政策演进¹

郑文龙*

一、前言

国民小学华语课程,从1960年代初期开办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了,至今未见专著论述。在本地,华小、独中的华文教育及国中的华语教学向来较受到朝野关注,而国小华语教学则较少受到垂注,研究也不多。前人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华文小学、华文独立中学及国民中学的华语文教学课题,整体而言,这些论述或多或少述及国民学校(国小、国中)的华语教学,但国小华语课程往往并非论述重点,而是作为小学华语课程论述的一部分。

目前,马来西亚小学非华裔学生学习华语的热潮已渐趋明显,但在华文论述方面,仍未见到关于国民小学华语教学的研究专著;因此,本人决定考察国民小学华语课程及教材的沿革演进,做一初步的探讨。

1990年代中期以来,有越来越多非华裔学生在华小及国小学习华语,预示本地的华语教学已逐步跨出“华裔母语教学”的范畴,意义重大。《亚洲周刊》2003年1月报道,因应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全球正掀起一股华语学习热潮,标志着华语正逐渐跃升为全球仅次于英文的新强势语言。在马来西亚,随着越来越多非华裔学生在华小及国小学习华语,本地小学华语教学面临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有待探讨。

总而言之,作为马来西亚小学华语课程的其中一环,国民小学华语课程的沿革演进,理应加以关注并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从教育政策的层面,探究二战后至今官方教育报告书及教育法令对非华文小学华语课程的设置规定,考察国民小学华语课程设置的法理依据及其法规嬗变。

¹ 本文乃是笔者中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应用语言学系硕士学位论文《马来西亚国民小学华语课程及教材的沿革研究》第二章的修改稿。另外,本文以教育政策的演进为分析主轴,论述了二战后至今(1945年-2008年)的国小华语课程及教材沿革,故1996年以后的讨论,主要聚焦在1996年教育法令及其后2003年的条规异动,且简略谈及2003年的“附加语文班”课程;事实上就国小华语课程设置而言,1996年-2008年(短短12年间)的课程变动之大、频繁,是1945年-1995年(漫漫50年)所无法比拟的。同时关于1996-2008年的国小华语课程的设置的讨论,已在原硕士学位论文第三章处理,非本文论述重点,特此说明。

二、二战后至独立前的教育政策演进（1945-1957年）

在二战前的1930年代后期，马来半岛已有了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及英文四种语文源流的教育制度。1945年9月中旬英殖民政府重新占据马来半岛后，各地的四种语文源流学校才纷纷复办。经过二战洗礼，局势丕变，马来亚各族人民开始提出自治诉求。于是，英殖民政府与马来亚各民族开始就政治权利与教育政策展开角力，是为国民学校及其母语班的诞生背景。

从1946年到1957年马来亚独立之前的11年中，英殖民地政府数度相继委任几个教育委员会，研究及建议改革新马（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的教育制度，以便各语文源流学校采用一个共同的课程纲要，塑造一个团结多元民族的联合邦²。拟具报告书，订制教育政策，其中一个动机就是整合各社群，并且达至本土的认同³。独立前，英殖民地政府试图独尊英语；独立后，联合邦政府接手继承，改为独尊马来语，欲使国民学校成为各民族学生的首选学校。

（一）国民学校的华语课程设置规定

1. 1946年《吉斯曼教育建议书》与马来亚联邦

由于英国政府决定于战后让马来亚独立，于是，英殖民地政府于1946年先后提出《吉斯曼教育建议书》及“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计划，试图在教育上确立英语教育的主导地位，在政治上维护英国在本地区的利益。

在马来亚联邦白皮书公布之前，殖民地政府的提学司（Director of Education）吉斯曼（H.R.Cheeseman）提呈了一份新的教育建议书，“强调各族母语教育的重要性，但也同时认为应注重英文教育的实用价值。”“建议书提出实行免费小学教育，建立英语和以母语为教学语言的马来语、华语及淡米尔语四种小学，同时规定英语为所有学校的必修课⁵。”

由于马来亚联邦计划使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受到威胁，并准备开放公民权予所有居住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各族人民申请，结果，马来领袖拿督翁（Dato' Onn b.Jaafar）于1946年5月筹组马来政党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UMNO），汇集马来民族的力量，强烈反对马来亚联邦计划的公民权条款以及《吉斯曼教育建议书》的四种源流教育政策。

²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1400-1999》，吉隆坡：教总，2000年，页39-44。

³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吉隆坡：教总，2001年，页87。

⁴ 转引自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1999年，页63。

⁵ 庄兆声：《马来西亚基础教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页23。

1946年12月，马来亚联邦咨询委员会(Malayan Union Advisory Council)接纳了《吉斯曼教育建议书》，然而，巫统抵制并于1947年2月1日致函反对在新的政体(new Constitution)尚在协商时探讨教育政策，并认为马来亚未来的教育政策必须符合新政体（即：后来的马来亚联合邦）的条款、目标及理想。而且，巫统也无法接受“将英、巫、华、印四种语文学校列于同等地位的教育系统”⁶。结果，“马来亚联邦”计划与《吉斯曼教育建议书》最终皆被搁置且以失败告终。

基于政治考量，英国人决议收回1946年的计划书，并与巫统（UMNO）协商，最后制定1948年的“马来亚联合邦协议书”（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可见，从创建国家之初，马来亚的政治就带有强烈的种族取向，语言教育与种族政治（族群政治）挂钩；而教育服膺于政治，政治嬗变，语言教育也随着嬗变。独立之前的国民学校及其母语班就是“政（政治）教（教育）合一”的产物。

2. 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

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新宪制协议书确立了马来人成为本区的主体民族，马来人的特权被保留，马来语与英语同被列为官方语言⁷。此后，以“马来语或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学校，成为国民学校（National School）；而其他“非马来语/英语”媒介语的学校，就成为所谓的方言学校(Vernacular School)。《1952年教育法令》释义部分的“联合邦官方语言”就是以此协议书的定义为准。所以，马来亚联合邦协议书的“官方语言”定义是往后国民学校与方言学校的分水岭。

此后，独立前的英殖民政府与独立后的联盟政府，就是以教学媒介语为基准来划分小学阶段的学校制度，欲以教学媒介语的统一来达至国家认同。独立前，是以“官方语言”（英语、马来语）为基准；独立后，则是以“国语”（马来语）为基准。

3. 1950年《荷格报告书》

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政府于1949年9月重新检讨及制订教育政策，并于1950年5月呈呈《荷格报告书》（Holgate Report）。报告书建议一种双语的政策，让学生掌握自己的母语及另一种“共同语文”，也就是英语。报告书也建议，尽早将小学方言学校（Vernacular School）⁸改为英校。在过渡时期，英文小学可多设马来文一科，

⁶ 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7-48.

⁷ Tan Liok E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p47.

⁸ 方言教育是指相对于英文、马来文教育的其他教育而言，而方言学校是指以各族母语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亦即华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因此，方言学校意指“相对于官方语文之外的各族母语教育”，主要是指华、印语文学校。

而马来文小学也可增设英文一科；在学生的母语教学上，“这两类学校如果有家长要求的话，它们也应提供华文及淡米尔文的学习的方便。”⁹这是教育报告书中最早提及“非华文小学”华语教学的论述，是往后国民学校华、印裔母语班的先声。

报告书有意凸现英巫语文教育的地位，而终极目标是英文。所以，它建议政府采取恰当的步骤，使英文成为所有学校唯一的教学媒介语，以达致最终的教育目标¹⁰。这是往后单元化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之原型。

由此看来，《荷格报告书》是最早提出非华文小学华语教学及“一种语言、一种源流的最终目标”概念的教育报告书。不过，华语班并没有规定至少15位学生家长要求才开班的人数限制；而最终目标，则是独尊英语，有别于独立后国民学校的“马来文至上”教育政策。这份报告书最终被立法议会否决而不能付诸实施。

4. 1951年《巴恩报告书》

1951年《巴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逾越“调查马来学校”的研究范围，越权提出国民学校(National School)¹¹之建议。报告书建议成立国民学校制度来达成社会整合的目标，并希望以英语或马来语为教学用语的国民学校取代现存的方言学校。这是马来西亚“国民学校”的滥觞。不过，《巴恩报告书》只提及英、巫双语教育，不谈《荷格报告书》的华、印语教学。亦即，国民学校只应教授英语及马来语这两种官方语言，不提开办华语及淡米尔语课程¹²。

报告书认为，小学教育的宗旨是塑造一个共同的马来亚国民意识(Malayan nationality)，而这需建立于一个跨族群的基础上(inter-racial basis)。不过，在多元

⁹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页82-83。

¹⁰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1400-1999》，吉隆坡：教总，2000年，页45。

¹¹ 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中英文版将1951年《巴恩报告书》提出的国民学校 / National School 写成国民型学校 / National-type School。《巴恩报告书》第四章《小学教育》及第十二章《摘要》部分仅提出国民学校(National School)，未提及国民型学校(National-type School)；报告书用“separate vernacular school”代表既存的各族方言学校(即：华文、淡米尔文学校)，而用“single-type of school”代表拟议中的国民学校(即：National School)。柯氏显然将“single-type of school”(国民学校)当成“national-type school”(国民型学校)。陈松生整理之《1995年教育法令资料手册》，在论及《1952年教育法令》时也将国民学校写成国民型学校，见董总50年特刊编委会：《董总50年特刊》，吉隆坡：董总，2004年，页373。就教育法令而言，国民型学校(National-type School，指国民型小学)迟至《1961年教育法令》才出现，特此说明。见中文版：柯嘉逊：《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吉隆坡：董教总教育中心，2002年，页5；英文版：Kua Kia Soong, *A Protean Saga: The Chinese Schools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1985, pp.7-8 & pp.59-60; 1990年英文版也有类似问题。

¹²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 (俗称Barnes Report), Federation of Malaya, Government Press, 1951.

种族、多种语言源流教育并存的马来亚，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国民意识，是以“视马来亚为其永久家园及效忠对象的（族群）人口”为基准。巴恩委员会认为，“凡欲以马来亚为其永久家园，并效忠于马来亚的家长，当乐于送其子弟就读国民小学，接受英巫双语教育；凡不愿其子弟接受国民教育者，则是不愿对马来亚效忠之表示。凡愿意放弃其本身方言教育，而为统一社会利益着想者，当被热烈欢迎。”¹³如此，“语言教育”问题成了“政治效忠”课题，委员会提倡英语、马来语教学，独尊国民学校，欲“以英、巫双语教学的国民学校取代各族方言学校”；亦即，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都应废除，以示效忠马来亚。

巴恩委员会在国民教育的“最终目标”方面，“原则上建议各族群的方言学校终须关闭而由一种共同的单一类型小学所取代。这个终极目标是渐进达成的，方言学校可伴随国民学校的发展而继续存在若干年。不过，委员会吁请将小学教育的公共资源配置优先给予国民学校。”¹⁴可见，殖民地政府有意按部就班地废除华、印语方言学校，最终代之以单一类型的国民学校。鉴于当时华、印族人口及华小、淡小的数目仍相当可观，若骤然消灭华、印族方言学校，不但会遭到诸多抗拒，也需要庞大的教育资源来筹设国民学校及培训师资，因此，当局决定逐步地实现国民学校的最终目标，并优先拨款发展国民学校，方言学校所获得的教育拨款相对少得多。

报告书建议将这种包容各种族在内的“跨族群” (inter-racial) 小学教育称为国民学校。其要点如下：

(1) 为6岁至12岁的学童提供6年的免费小学教育。

(2) 国民学校只应教导两种语言，它们必须是国家的官方语言，即：马来语及英语。学校课程最终将培育掌握双语（马来语及英语）的学生，其中优秀者将直接进入以英语为媒介语的中学(English-medium post-primary school, 即英文中学)。国民小学实行英语和马来语双语教学，而“马来语将使用于学校的社交场合及大部分的课程教学上。”虽然报告书没有言明“马来语必须是主要的教学用语”，但马来语在学校教育中的显要地位已跃然纸上¹⁵。

报告书第四章第19条款言明，“国民学校将获得最好的师资、校舍及设备，使之成为马来亚最优越的小学教育。国民学校教育是免费的，并从1年级起教授英文，以利于学生升上（英文）中学。”显然，国民学校的双语（英、巫语）教育，也是为

¹³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 Chapter IV: 2 & 18.

¹⁴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 Chapter XII: 4.

¹⁵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 p20-22.

了吸引非巫裔学生就读，以成为全民的首选学校。这是往后国民小学欲成为全民“首选学校”的先声。在独立之前，本地只有华文中学、英文中学及英文大专院校，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的教育制度只停留在小学阶段。因此，往后所述的国民学校（National School），主要是指“国民小学”。

5. 1952年《霍根报告书》

1951年9月，联合邦授意议会成立一个以律政司霍根(M.J.Hogan)为主席的教育政策遴选委员会¹⁶，检讨教育政策，以便制订马来亚联合邦教育法令。教育政策遴选委员会根据之前的《巴恩报告书》、《方吴报告书》及《中央报告书》，草拟一份教育法令，以供政府执行。

1952年10月8日，政府正式发表《教育政策遴选委员会报告书》¹⁷，是为《霍根报告书》。报告书附带提出“1952年教育法令”草案，报告本身可当作教育法令草案的提案理由书。

以下是报告书及法令（草案）对于国民学校及其华、印语课的简要论述：

(1) 国民学校

设立无民族界限的“国民学校”，供给以6年为期的免费强迫性初等教育，以马来亚乡土观念灌输给各籍之学童。国民学校分两种，一种以巫文为教学媒介，而于第1年起授英文；另一种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而于第3年起授巫文。

(2) 华、印语课

国民学校应以官方语文（英、巫）教授儿童，同时也须提供华、印文的学习方便。唯此举有两个附带条件，即华、印语的学习必系基于学生家长之愿望，同时每班级中必须至少有15名学生。经家长监护人呈请，学校将予儿童以学习华印语文的“合理设备”。

至于每日教授华、印文的时间，法令中未作硬性规定，不过，报告书主张在最初2年内，国民学校内每日只能拨出1节（约半小时）教授华、印文，课文内容应予简单化，侧重于华、印儿童特别关注之事物。报告书认为在初小阶段，每日正常上课时间之后，可依照上述办法加授半小时华、印文¹⁸。

¹⁶ Special Committee Appointed on the 20th Day of September, 1951 to Recommend Legislation to Cover All Aspect of Education Policy For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¹⁷ No.70 of 1952, Federation of Malaya,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Appointed on the 20th Day of September, 1951 to Recommend Legislation to Cover All Aspects of Education Policy For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俗称《霍根报告书》。

¹⁸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页167-168和页189-190。

综上所述，国民小学里的华、印族学生要报读母语课，首先须由家长或监护人提出申请，而且要有15人以上才能开班；若校方准予提供学习华、印语文的便利，开班后每天可学习一节（约30分钟）华、印语课，不过却是安排在正课时间之后另行开班加授。

这是官方教育报告书中最早提出国小华、印语课的开班规定及条件之论述，亦即，必须要有“至少十五位学生家长提出申请”，才给予学习华、印语的教学便利。

6. 《1952年教育法令》

1952年11月21日，英殖民政府根据《霍根报告书》制定了《1952年教育法令》，实质上接纳了1951年《巴恩报告书》的建议，欲以英文、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学校取代华文与淡米尔文学校。

法令第9及第21条详述了国民学校及华、印语课的条款：

国民学校 (National School) 分两种，一种是以马来文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一种是以英文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在这两种国民小学里，须有至少15名学生家长提出要求，而且这些学生的语文程度相等，才给予教授华、印语¹⁹。亦即，只要相关学生的“语文程度相等”，校方应提供合理的设施以教导华、印语，涵盖小学各个年级。

这是国民学校母语班的滥觞。值得注意的是，马来亚是在通过《1952年教育法令》时，首次提出“母语班” (Pupils' Own Language, 简称POL) 这个词语。然而，母语班这个词语却没出现在《1952年教育法令》本身的任何条文中。它隐含在设立“国民学校”的第21条条文中²⁰。此后，历年的教育法令（至《1996年教育法令》为止）也都没有列明“母语班”这个词语，而是隐含在法令条款中。

“母语班”指的是“学生自己的语文课”。不过，英殖民地政府只给华族和印族提供母语（华语和淡米尔语）教育，其他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则被《1952年教育法令》边缘化²¹。

此条款所拟定的国民学校华裔母语课乃是往后国民小学华语课程的滥觞，影响深远。

¹⁹ No.63 of 1952, Federation of Malaya,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1952, Section 9 & 21.

²⁰ 杨培根，〈〈宪法〉与马来西亚母语教育的法律条文〉，见柯嘉逊编：《马来西亚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2003年，页40。

²¹ 在马来西亚教育法令中，其他土著族群语言(indigenous languages)的设置条规，迟至《1996年教育法令》才明文作出规定，但与华语、淡米尔语分开罗列，条规亦有些许不同，详情请参阅后文《1996年教育法令》部分。

(二) 标准小学的华语课程设置规定

1. 1956年《拉萨报告书》

1955年大选胜利后，联盟（Alliance）政府任命拿督阿都拉萨(Dato' Abdul Razak)担任教育部长，并于9月委任15位成员组织“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来制订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

委员会于1956年5月发表《拉萨报告书》(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1956)，建议各源流小学和中学采取共同内容的课程。在初等教育阶段，小学按教学用语分为标准小学与标准型小学，标准小学(Standard Primary School)以马来亚国语(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标准型小学(Standard-type Primary School)则以华语、淡米尔语或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在语文教学方面，所有学校必须教授马来文，英文为小学必修科。在所有小学，如有15名学生家长要求教授华文或淡米尔文，校方应为他们开办母语班²²。

委员会在报告书第12条中超越其权限而加入与《巴恩报告书》相似的内容，提出本国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是把各族儿童纳入一个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民教育体系，而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不能过于仓促而必须逐步推行。亦即，“一种语文、一种源流”单元化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循序渐进地推行，不可操之过急。

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教育法令》、1956年《拉萨报告书》及后来的《1957年教育法令》皆是用“Kuo Yu(国语)”来指称“Chinese language”。这显然是沿用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国语”称谓，以国语(National language)指称华语。可见，国民政府的国语(Kuo Yu: 华语)与独立后马来西亚政府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 马来语)，虽然“所指称的语言”不同，但其立论根据却是一样的：即华语、马来语是“统一族群的语言”²³，其他的族群语言则是不具有正统地位的“方言”。从《1961年教育法令》开始，才采用“Mandarin”来指称“Chinese language”。

2. 《1957年教育法令》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马来半岛)透过联盟政府从英国殖民地政府手中取得独立。在独立之前的1957年7月，1956年《拉萨报告书》被通过成为《1957年教育法令》(The Education Ordinance 1957)。

²² Report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1956, Chapter V: Primary Education, No.54 & 63.

²³ “统一族群的语言”之概念，参见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页50。

法令将小学分为标准小学 (Standard Primary School) 及标准型小学 (Standard-type Primary School) 两类。标准小学是指以国语 (马来语) 为教学媒介语的小学, 英语为必修科。若有15名学生家长提出要求, 则应提供学习华语及淡米尔语的便利。标准型小学是指以华语、淡米尔语或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小学。国语与英语若非教学媒介语, 则须是必修科。在华语、淡米尔语非教学媒介语的标准型英文小学, 若有15位学生家长提出要求, 则应提供学习华语及淡米尔语的便利²⁴。

上述教育政策的论述, 主要限于马来亚联合邦 (马来半岛) 的情况, 不包括沙巴、砂拉越。在独立之前, 马来亚联合邦已有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制。按《1957年教育法令》, 小学分为马来文媒介的标准小学, 以及标准型英文、华文、淡米尔文小学, 共两种类型, 四种语言源流。

三、 独立后至今的教育政策演进 (1957-2008年)

1957年8月31日, 联盟政府从英国殖民地政府手中取得马来亚独立, 其首要任务是团结各族人民, 塑造一个和平、繁荣及进步的国家。为了达到这个建国目标, 政府认为必须落实《1956年拉萨报告书》的建议, 通过教育制度的改革, 使马来语成为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

(一) 国民小学的华语课程设置规定

1. 1960年《拉曼达立报告书》

1960年2月, 联盟政府成立一个以新任教育部长拉曼达立 (Abdul Rahman Talib) 为首的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 检讨1956年《拉萨报告书》所提出的国家教育政策, 以及其实施成效。同年8月, 《拉曼达立报告书》²⁵发表, 建议所有标准小学和标准型小学改称为国民小学和国民型小学, “以符合马来文的国语地位”²⁶。在教学科目方面, 马来语和英文应该是所有中、小学的必修科目, 而其他语言的教学应该视其需要而开设²⁷。在学校类型的设置上, 确立了往后国民小学与国民型小学两种学校类型。

2. 《1961年教育法令》

1961年10月, 政府依据《拉曼达立报告书》的建议制定了《1961年教育法令》(Education Act 1961), 逐步落实以国语 (马来语) 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民教育制度。

²⁴ No.2 of 1957, Federation of Malaya,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1957, Section 2: Interpretation.

²⁵ Report of the Education Review Committee 1960, Federation of Malaya, Government Press, 1960.

²⁶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1400-1999》, 页78-79。

²⁷ 叶玉贤:《语言政策与教育: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比较》, 台北市: 前卫出版社, 2002年, 页26。

《1961年教育法令》将小学分为国民小学（National Primary School）及国民型小学（National-type Primary School）。国民小学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英文为必修科；若有15名学生家长提出要求，而这么做是合理及可行的话，则须提供教导华语、淡米尔语的便利。国民型小学则以华语、淡米尔语或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国语为必修科；若英语不是主要的教学媒介语，则须为必修科。在国民型英文小学中，若有15名学生家长提出要求，而这么做是合理及可行的话，则须提供教导华语或淡米尔语的便利²⁸。

在国小华语课的开班要求上，《1961年教育法令》比《1952年教育法令》更严苛一些。《1952年教育法令》规定，若有至少15名学生家长提出要求，且这些学生的语文程度相等，则校方应提供合理的设施以教导华、印语，涵盖小学各个年级。而《1961年教育法令》除了规定“15名学生家长提出要求”外，不提“语文程度相等”，另加上“如果这样做是合理及可行的话”，应提供教授华、印语的便利。亦即，必须要校方认为“合理及可行的话”，才开办母语班。

另一方面，《1961年教育法令》也删除了“涵盖小学各个年级”，此后的教育法令也不再提及华、印语的教授年限。独立后，1960年代开设的国民小学华语课，是从三年级教授至六年级，沿袭至2003年才改从1年级开始教授至六年级，涵盖小学六年。

此外，此法令绪言第二段认为“有必要顾及依据家长意愿而为其子女提供教育的一般原则，只要这么做是符合教育政策，能够提供有效的教导，和避免不合理的公共开销。”可见，只能为开办华、印语课提供有限的公款。绪言第三段进一步阐明本邦教育政策的目标在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教育制度”。由此看来，国家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达致“一种语文、一种源流”的单元化国民教育体系。可见，《1961年教育法令》对“依据家长意愿而为其子女提供华、印语课”的诚意令人怀疑。

总而言之，到了《1961年教育法令》，马来亚的教育政策大抵抵定，此后的35年间，政府不再颁布新的教育法令。1960年代初期国民小学（简称国小）华语课程的设置与实施，就始于《1961年教育法令》。此后，一直到《1996年教育法令》，国民小学的名称及其相关设置条款才有了新的变化。

（二）国民学校的华语课程设置规定

1. 1979年《内阁教育报告书》

1974年9月，政府成立了一个以教育部长马哈迪为主席的“内阁检讨教育政策实施委员会”。经过五年的研究和检讨，该委员会发表了1979年《内阁教育报告书》

²⁸ No.43 of 1961, Federation of Malaya, Education Act 1961, Part I: Interpretation, p222-223.

(俗称《马哈迪报告书》)²⁹。在小学教育方面，报告书建议对小学课程进行改制，拟定一个注重读、写、算的小学新课程纲要。从1983年起，教育部根据该报告书的建议，正式在全国各语言源流小学全面实施“小学新课程”（简称KBSR，俗称3M制度）。

报告书言明，国民小学并不开设华语、淡米尔语课；若要开设，则必须符合至少15位家长提出要求的条件。所以，在小学新课程（KBSR）实施后，国小学生的华裔母语课（POL）仍然没有纳入学校的正课（正规课程）³⁰。

2. 《1996年教育法令》

1995年大选后，政府提出《1995年教育法案》。法案于1996年在宪报上公布，成为《1996年教育法令》(Education Act 1996)，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

《1996年教育法令》将“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英语为必修科的政府小学（government school）或政府津贴小学（government-aided school）称为“国民学校”（National School）；若有至少15名学生的家长提出要求，则须提供教授华语或淡米尔语的便利；若有至少15名学生的家长提出要求，而如果那样做是合理及可行的话，则须提供教授其他“土著族群语言”（indigenous languages）的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英殖民地时期的1951年《巴恩报告书》也采用“国民学校”来指称政府小学或政府津贴小学，不过，国民小学实行英语和马来语双语教学，而《1961年教育法令》则用“国民小学”（National Primary School）来指称“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全津贴政府小学（fully-assisted primary school）。

鉴于国民型英文小学已于1970年代中期改成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成为改制英文小学³¹，《1996年教育法令》的国民型学校（National-type School，指华、淡小）已不包括国民型英文小学，故其条款中不再提及“母语班”性质的华、印语教学事项。自此，改制英文小学（SRK）统称为国民小学（SK），英小之名正式走入历史。

²⁹ Report of the Cabinet Review Committee on Education, 1979. 马来文称为“Laporan Jawatankuasa Kabinet Mengaji Pelaksanaan Dasar Pelajaran”，意译“内阁检讨教育政策实施委员会报告书”，本文简称为1979年《内阁教育报告书》。

³⁰ 叶玉贤：《语言政策与教育：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比较》，页37及65页。

³¹ 在行政上，这些改制的英文小学，马来文称之为Sekolah Rendah Kebangsaan（意译“国民小学”，简称SRK），以区别于原本即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Sekolah Kebangsaan（意译“国民学校”，简称SK）。在教育法令中，《1961年教育法令》将“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小学”称为“National Primary School”（意译“国民小学”）或者“Sekolah Kebangsaan”（意译“国民学校”）。

根据法令条款，国民学校（指国小）华语课程仅需至少15名学生的家长提出要求就可开班，删除了“如果那样做是合理及可行的话”。这可能是从1996年开始，国小试验性开办“附加语文班”性质的华语课，开放供各族学生选修，尤其是占国小主体的马来族学生。亦即，这（至少）15名学生家长，已不必然是华裔家长。不过，“母语班”华语课仍然存在，并未废除。

1995年12月18日教育部长纳吉在国会提呈《教育法令草案》二读时宣布“华文和淡米尔文将扩展至国民学校，以让更多学生学习这两个语文……华文和淡米尔文不再安排在课外教导，而是纳入正课时间表内。”³²

1996年至今（2008年），未有新的教育法令出台。从2003年开始在部分国小实行的“附加语文班”《交际华语》课程，进一步取消“至少15名学生家长提出要求”才可开设国小华语课的规定。2002年4月8日的华文报章报导“当这项计划全面推行后，它将会取代现有的母语班；不过，在这个‘附加语文班’还未全面推行的时候，‘母语班’还是会继续推行。”³³可见，教育部有意以附加语文班来逐步取代现有的母语班。而这种改革，显然是为了强化国小成为全民的“首选学校”，似乎并没有乖离单元化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教育法令中第一次提到其他土著族群语言，如卡达山杜顺语、伊班语，及其他原住民语言。不过，同是国小非马来族群的语言，其他土著族群语言却与华语、淡米尔语分开罗列，条规有所不同；土著族群语言的开班要求比华、印语严苛一些，实际上是沿袭《1961年教育法令》对开设华、印语的规定，如果校方认为“合理及可行的话”，才开办其他土著族群语言班。

以伊班语为例，根据砂拉越州教育部在1987年5月13日发出的35/JP/1585/1987号公文，伊班文被纳入小学新课程纲要（KBSR），与法文、阿拉伯文及日本文并列为语文选修科，并不享有如华文及淡米尔文般的母语科（POL）地位。从早年以来，伊班语就在婆罗洲乡区起着族际共通语与官式语言的重要作用。在19世纪时，伊班语曾是学校里的教学媒介语。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后，伊班语的地位却沦落至与“外国语言”一样，并没有获得华语、淡米尔语般的“母语”待遇³⁴。

总而言之，国小华语课一开始即是以华裔学生的母语班（Pupil's Own Language）的形式出现。但是，从《1952年教育法令》到《1996年教育法令》，法令条文始终没有正式提出“母语班（POL）”的字眼与定义。在实际的行政操作上，教育部及国

³² 莫顺生：《马来西亚教育史1400-1999》，页221。

³³ 〈教（育）部将逐步取消母语班，明年实行附加语文班〉，马来西亚《光明日报》，2002年4月8日。

³⁴ 柯嘉逊编，《马来西亚少数民族母语教育》，页6-7及页119。

民小学确是以“母语班”来指称教育法令所界定的华语课，不过，独立早期沿用英文“Pupil's Own Language（学生自己的语言）”，后期则用马来文“Bahasa Ibunda（母语）”；因华语并非官方语言，官方文件中并没有此课程的华语称谓。本地华人一般把“学生自己的语言”理解为“学生的母语”，所以称为“母语班”。

四、结语

马来（西）亚国民小学华语课程的设置是教育政策的产物，服膺于教育法令或教育部行政通令的相关规定，它的沿革演进与马来（西）亚独立建国的历史息息相关。国民小学华语课程的设置与沿革，一方面是顺应时代与政治的需求，一方面是顺应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社会的需要。二战后，因应马来亚要求独立、建国的时代诉求，英殖民政府与马来亚各民族开始就政治统合（Political Intergration）与教育政策展开角力，而语言政策就成了“政（政治）教（教育）合一”的国家课题。国民小学及其华语课程，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独立建国的过程中，政府欲透过“以学校教学用语的统一来促进国家认同”的教育政策来达致政治统合的目标，即以“一种语文、一种文化”的单元化政策作为统合各社群，达致国家认同的手段。在学校教育上，马来西亚“以教学用语的种类来型塑学校教育制度”的做法，显然是着重于语言教育的政治统合作用，欲以学校教学用语的统一来促进国家认同，实现国家单元化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

在语言政策的实施上，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逐步发展一个“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制度”。马来语作为国语（1957年马来亚独立）及唯一的官方语言（1967年《国语法令》），是“统一族群的语言”。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校制度上，政府将“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称为“国民小学”，不称为“马来文小学”，显见政府欲吸引各族学生就读国民小学，并把国小建设成为全民的“首选学校”，而不仅是巫裔和土著学生为主的小学。马来语作为国小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但非唯一的教学媒介语，其他语文亦可作为教学媒介语；英语作为单一科目的必修课，而华、印语则是作为单一科目的华、印裔母语选修课（1996年以前）。

可见，单元化教育政策虽独尊马来语作为国小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但华、印语仍可作为国小华、印裔学生的母语选修课来学习。独立前后的教育法令皆列明国民小学华、印裔母语课的开设条款，不过，法令条文的隐晦、含糊，增加了国小华语课程开设的“不确定性”。

国民小学华语课程一开始是以母语教学的形式设立。“母语班”（POL）教育的概念始于《1952年教育法令》，但母语班这个词语却没出现在《1952年教育法令》及历年的教育法令条文中。国民小学华语课程的实施始于《1961年教育法令》。不过，《1961年教育法令》比《1952年教育法令》更严苛一些。而且，《1961年教育法令》第21（2）条款授权教育部长可以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将国民型华文、淡米尔文、英文小学改为国民小学；其最终目标是要逐步发展一个“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家教育制度”。可见，这是以渐进、隐晦的方式来逐步落实“以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英语为必修科、其他语文（包括华、印语）仅作为单一科目的选修科”之单元化教育制度。在此情况下，国小华、印裔母语课，获得“有条件”开设的便利。

最后，将上述教育法令中关于国小、（前）英小华语课程的设置要点胪列如下：

1	《1952年教育法令》	
	国民学校分两种： (1) 以马来文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 (2) 以英文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	若有至少15名学生家长提出要求，而且这些学生的语文程度相等，则校方应提供合理的设施以教导华、印语，涵盖小学各个年级。
2	《1957年教育法令》	
	① 标准小学： 以国语（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小学，英语为必修科。 ② 标准型英文小学： 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小学，国语须是必修科。	若有至少15名学生家长提出要求，则应提供学习华语及淡米尔语的便利。
3	《1961年教育法令》	
	① 国民小学： 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英文为必修科。 ② 国民型英文小学： 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国语为必修科。	若有至少15名学生家长提出要求，而这么做是合理及可行的话，则须提供教导华语、淡米尔语的便利。
4	《1996年教育法令》	
	国民学校： 以国语（马来语）为主要的教学媒介语，英语为必修科。	若有至少15名学生家长提出要求，则须提供教授华语或淡米尔语的便利； 另，若有至少15名学生家长提出要求，而如果那样做是合理及可行的话，则须提供教授其他“土著族群语言”的便利。

综而观之，在历年的教育法令中，“国小”的设立及其“母语班”的设置，不同法令有不同的称谓及设置条件。在国小称谓方面，《1952年教育法令》称为“国民学校”、《1957年教育法令》改称“标准小学”、《1961年教育法令》改为“国民小学”，《1996年教育法令》又改为“国民学校”，名称迭变；在国小华语课程方面，尽管华语课程一开始是以母语教学形式设立，但“母语班”的称谓未曾出现在历年来的教育法令中，且其设置条件也不尽相同，条文隐晦。

可见，在“隐晦的条文、更迭的名目、渐进的方式”下，国小华、印裔母语课，获得“有条件”开设的便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国小华语课程的设置，似乎忽略了国小学生及其语文水平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亦即，国小学生包含了各族学生，他们的华语水平不尽相同，而华裔及非华裔学生学习华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起点、特点也有所不同；就算是华裔学生，其华语水平也有第一语言、第二语言之分，不可一概而论。

广泛而言，不论是母语班性质（1961-1995年）的华语课，还是附加语文班性质（1996-2008年）的华语课，皆是属于华语第二语言课，这显然没有考虑到国小学生的实际语文水平及其接受能力，值得关注，有待探讨！

*郑文龙 中国暨南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曾在新加坡从事华语第二语言教学工作，于多所回教堂教授华语。现于南马从事教育工作，并关注本地学子的第二语言教学。

考证与辨析： 1907年霹雳育才学校的开校与办理情形¹

锺伟前*

一、前言

我的母校霹雳育才华文独立中学，在2008年8月30日举办了一项场面盛大的100周年纪念庆典。这是值得庆贺的，这不光意味着在大马华文教育历史发展历程里，育才在国内数得上极少数能坚持至今，且能晋进百年字号的华文学校；她创立时即冠予“吡叻公立育才两等小学校”名义，即以大霹雳坝罗埠（今之大怡保地区）首间华社共同创立之华文公立学校的身姿出现。除此之外，若把范围再放大一点来看，以现有的全国60所华文独立中学而言，她和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并驾齐驱，同是1907年一齐正式开校，甚至比尊孔学校的开办的时间更早（有关这一点将在下文略为论及），两校分别在中、北马共同迈开其百余年之诲人不倦、育人不歇的教育征程。

母校之所以在2008年庆祝创校百年校庆，而非2006年（按正式的历法计算，母校是于1907年正式开学，其创办之议实始于2006，这与尊孔独中认定1907年创校，却又在2006年办理百年校庆相似，乃出于美丽的误会），究其实乃因母校董事会对学校的创办及开校时间的资料掌握不足，方有如此这般的无心之失。

本文的撰写，乃出于对母校感怀与作为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原先已对母校的开办历史模糊亦有所存疑，故在平日就已悉心留意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期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充份地收集更多的材料的情况下，对此问题作出较全面的探索。现因为《育才百年特刊》卷三即将付梓，因与主编麦翔先生提起这事，由此乃萌起事惟求全多废止，乃不得已，希望通过目前手头所掌握之有关资料，对育才学校的创立年份混淆情况，试图作出厘清与确立。

育才学校创办年份的确立，关系着的不仅是对育才母校自身过往“妾身未明”尴尬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它的创立若是落在1907年，这显示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她将和吉隆坡尊孔华文独立中学一道，是我国最早创立且至今仍发光发热的两所齐头并进的华文中学；第二层意义，作为首间全埠共同推动成立的公立华文学校，霹雳怡保的华族文教发展史也将提早一年，从1907年开始立下重要的里程碑。

¹ 本文乃应《百年育才》校史编纂委员会卷二主编麦翔之邀，嘱余对育才的校史为文，故草此篇，并将刊载在《百年育才卷三·百年大典》特刊。

二、《育才百年》特刊的论证与看法

《育才百年卷二·百年长征》特刊里〈育才百年史〉，以及〈育才的足迹（1908---2008）〉两文中，已对育才的创立年月，进行了反复的辩证及推敲。上述二文所推论的理据，约而言之，有以下数项：

- (一) 1905年出版之《东方杂志》二卷四期94页：“南洋各岛华商多迷信，而大北叻埠（即今之霹雳大怡保地区）尤甚，每岁耗费不下万元，胡子春慨然悯之，乃爰集同志演说，谓媚神无补时艰，不如将此钜款兴学培才。稠人广座，大声疾呼，一时欧君慕姬、余君彦臣、茂君静斋及同志数十人，俱鼓掌称善，遂议定移款设立学堂，以教育旅居之青年子弟云。”（按，“育才百年史”引这段文字时将“余君彦臣”四字漏掉）
- (二) 1906年12月14日Times of Malaya（《马来亚时报》）：“头家姚德胜（Yau Tet Shin）以6万元获取怡保务边路两旁30英亩的土地，未来将在该地发展350间的店铺，这当中包括一间戏院，其中四个铺位将分配于建议中的华文学校，该学校自建校舍落成之前，这四个铺位将以两年免费借于该学校办学之用。”
- (三) 1907年10月5日Times of Malaya报道：“今天，怡保除了唯一的14年前创办的英华学校（按此为英校）外，还有一间由胡子春创办的华文学校。”
- (四) 1956年育才第11期校刊，由蔡任平校长所撰写的序：“本校自1907年创办至现在．．．．．”
- (五) 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在视察侨校后上呈清庭报告云：“就学务而言，则檳榔屿向有平章会馆为华商公地，光绪三十年，设中华学校，即借作校舍，新建者，计明年可以完工。学科虽未尽完备，而局面尚宏。本年四月，添设师范传习所一区。坝罗（即今怡保）有女学校一所，为闽商胡国廉（胡子春，名国廉）倡办”。²
- (六) 1908年5月20日《叻报》报道：“吧罗育才学堂开办年余，虽已颇著成效，但常年经费既未筹得的款，且另建校舍亦万不容缓。故于日前假座於新改良商局，集议所以善后之策。是日赴议者数十人，胡君子春主席或献议仿照彩票之法，以一半为彩银，余则助办学之用，众踴其议，遂可决。援前吉隆坡成例作成公禀，由各华商联名呈请于本处各当道云。”（按，“育才百年史”引这段文字时有一些字眼有出入，如坝罗“吧罗”、存“的”、团“商”等）

² 学部官报第九期刊录《商部咨檳榔屿绅商创设中华学校请查核注册案并声明刊铃选记文》，页236及238，转引自陈育崧：《椰阴馆文存》卷二，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页241-242。

(七) 《育才百年卷二·百年长征》特刊页88〈育才的足迹(1908---2008)〉, 其注释3中: “一直以来的纪录, 育才创办于1908年1月。翻阅学术资料, 发现创办年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1906年, 二是1907年。另一说法是1909年。未经进一步考证前, 暂以1908年为准。详见本刊第二卷〈育才百年史〉一文。”

依据上述七项主要的资料及反覆论证, 最后, 《育才百年卷二·百年长征》特刊〈育才的足迹(1908---2008)〉一文页89中, 对育才学校的创办作出如下的描述:

育才初创于1908年1月, 属公立, 只办高小, 取名“育才学堂”, 专为收容由中国南来, 已有初小程度之学生, 其实初小新生也是招收的对象。

.....

三、对《育才百年》特刊所引各项理据之分析

从《育才百年特刊》所标引上述的七项理据中, 可以进一步的作出以下具体的分析:

第一项理据, 其实已清楚的标明, 至少早已在1905年5月之前(因《东方杂志》二卷四期于光绪卅一年四月廿五日出版, 换算成现在的公历即为1905年5月28日出版), 已由胡子春等人倡议要成立一所学堂, 这所学堂就目前看来, 毋庸置疑地几乎可以肯定即是后来成立的育才学校, 这时期正表明育才学校正处于倡议阶段。

第二项理据, 姚德胜在怡保务边路两旁发展的350间的店铺中, 在育才学堂觅得适当地点建成之前, 将预留其中的四个铺位, 以两年免费借于建议中的华文学校办学之用, 这时期正表明育才成立的时机已成熟, “建议”这两个字眼清楚透露了育才学校迟迟未能开办, 其中重要的一项因素, 只因尚欠缺办学场所。

第三项理据, Times of Malaya所表明的1907年当时怡保除英华学校外, 尚有一间胡子春创办的华文学校, 这里头必须要小心的解读。如果将第五项理据, 即1906年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报告所指。在1906年在坝罗即有女学校一所, 亦为胡子春倡办。然而, 综观Times of Malaya全文语意及“华文学校”的用词, 当系指公立的育才学校方为合理, 若是女子学校, Times of Malaya必定会明确地指出是女学堂。这里只是觉得纳闷的是, 为何Times of Malaya没有提及坝罗这所女学, 或者Times of Malaya只论公立, 而这所私人办理的女子学校不提也。

第四项及第六项理据, 其实已将育才学校的创设时间说得很清楚, 也很明确。更可惜的是, 蔡任平校长所说育才学校在1907年开办应有所本方, 只是没有将实据列

出，致有如此不能断定状况。我们再来看1908年5月20日《叻报》的报导，原本这已是一项铁证：“吧罗育才学堂开办年余，虽已颇著成效，但常年经费既未筹得的款，且另建校舍亦万不容缓一”。明确的告知育才学校已在前一年，即1907年开办了，至今虽取得一些成效，但仍面对资金短缺，以及校舍尚未有着落之情境。对于这两项理据，《育才百年》特刊编委会可能基于：一，此乃蔡校长个人的多年的追写（1956年），并没有提供实据；二，一份远在新加坡出版的报纸——《叻报》，引用的是檳城出版的《檳城新报》中“吡叻访函”报导，其转轍间真实性如何似可存疑，何况这仅只是一项孤证也。因此，只存此二说，不敢遽然采用，宁采取第七项理据所言者，即“一直以来的纪录，育才创办于1908年1月。”

由此看来，有关育才学校的创办年份，由前述《育才百年卷二·百年长征》特刊里〈育才百年史〉，以及〈育才的足迹（1908—2008）〉两文中所努力搜寻得几项珍贵资料，以及据此苦心反复论证，皆甚令人感佩。而其最终依然遵循1908年1月为育才学校创办者，与其说是一项美丽的误会，不若说在还未有充分的确凿的证据前，宁从旧说，也可算是一种稳妥负责的态度，这也符合史界所标榜的，只能依据充份可信证据，方能立论断说的精神。

四、吡叻育才公立两等小学校的开学与办理情形

（一）1907年3月24日行开学礼

现在，我已搜获更多确凿无疑的史实，足以充分证明育才的创办日期是1907年，而非1908年。

首先，且看1907年3月26日，《檳城新报》载有“吡叻通讯一则”报导：

昨十一日，巴罗埠之吡叻公立两等小学校行开学礼，先由学董教员率诸生谒（孔）³圣三跪九叩首，次诸生谒学董、教员俱三揖，次学董与教员三揖，继而诸生相对各一揖，随合拍一影而散。学校门首则高揭黄龙旗，孔圣像前则供以鲜花檀香，是日中西来宾颇众，见其秩序肃雍皆以为华侨文明进步之徵云。

1907年3月26日，是光绪卅三年（即旧历丁未年）二月十三日，文中所指昨十一日，即为光绪卅三年二月十一日，换算成公历，即是1907年3月24日。这篇报导已清楚地告知我们，育才公立两等小学校在3月24日这一天，学校门口高悬代表清国旗之黄龙旗，“中西来宾颇众”之下，在学校董理教员及学生向大成先师孔子行三跪九叩首

³ 按，凡引用资料因辨别不清，或模糊、或以上下文意析之加入者，皆加（）符号。

礼，及互相行礼如仪之后合影的方式，完成“秩序肃雍”的庄严开校礼。通过这则新闻，可以说毫无异议的宣示了育才学校就在1907年3月24日这一天热烈、肃穆与“於缉熙敬止”地开办了。

（二）开办初期经费的筹措与校舍经营

现在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育才公立两等小学是依靠怎样的基础，方得以在3月24日顺利的开校，她如何筹措经费、校舍准备、教员聘任，以及开校后学校的维持等等。必须要先解决这几项问题，才能促使育才公立两等小学得以成功开办，且维持下去。

要弄清这些问题，就得看看下述的几项材料：

1907年3月12日，《檳城新报》一则“吡叻通讯”报导：

吡叻访员来函云，巴罗公立两等小学校系胡子春等发起，胡君捐银五千元之倡，巴罗姚君德胜复将自置铺店一连三、四间借作校地暂行开办，已经修整工竣，其教员一区姓、一邹姓，皆由省城聘来者。区教员岁底已到埠，邹君亦于昨日抵步，大约开学之期当在来月初旬矣！但现在开办经费祇凭胡君所捐五千元充用，所以未开捐者，第因发起人岁事匆忙，今又值七洲府振武社同人大会，故尔迟迟耳。查吡叻富商如梁君碧如、余君东旋、郑君大平等皆热心公益者，想一经开捐则钜款指日可集，惟望办事人实心经理，必有可观。盖吡叻之有公立学堂，此其起点矣！

在这段新闻报导里头，首先，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是由胡子春出五千元为之倡，姚德胜慨然借出三、四间店铺，再经一番修整，并从省城（因育才学校主要是由霹雳闽粤人士开办，且怡保地区以粤人为主，故此所谓省城当为中国广州即羊城也）聘得区（1906年杪到怡保）、邹（1907年3月抵达）二教员。这说明，这时办学经费、教室、教师等基本条件均已准备停当，等待开学而已。最重要者，是报导的最后点出育才学校的创立，是“吡叻之有公立学堂，此其起点矣”。

有关姚德胜借出的店铺究是三间或四间，若参照前面已引1906年12月14日Times of Malaya，即“头家姚德胜（Yau Tet Shin）以6万元获取怡保务边路两旁30英亩的土地，未来将在该地发展350间的店铺，这当中包括一间戏院，以及四个铺位分配于建议中的华文学校，该学校自建校舍落成前，这四个铺位将以两年免费借于该学校办学之用”，由此看来姚德胜借出的应是四间店铺，有关这点，下文会另有资料再次佐证之。

而开办经费除胡子春所捐五千元外，未再推动筹款，原因有两个，一，发起人岁事匆忙；二，今值七州府振武社同人大会，故被推迟进行。这两件一语带过的事情，其内情如何？据手头所掌握的资料显示，带头发起人胡子春早於1906年10月11日由檳附轮赴港后，再入中国面见两广总督岑春煊、省亲并办理投资事业，一直到1907年7月4日，方从香港附德轮返檳，直至1907年7月15日方抵檳城，所以足证发起人岁事匆忙之说果不虚也。而所谓值七州府振武社同人大会又是何事？原来在1907年3月8日至9日一连两日，在怡保召开一项七州府振武戒烟大集会。这在当年可说是一项前所未有、万众瞩目的重大的事件，霹雳振武戒烟社作为主办方，其成员囊括了霹霹州许多头脸人物，他们正忙于接待来自三州府（新加坡、马六甲及檳城）及除霹霹外四州府（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振武戒烟社员齐集怡保开会，所以无暇进行育才学校经费的筹募。

而记者所提到的吡叻富商三人，梁碧如时任檳榔嶼领事、余东旋乃金宝大矿家、郑大平是郑景贵儿子及挂沙人，且为海峡殖民地最后一任甲必丹，在育才学校的开办前期（至少在该年的六月前）时，没有给予资助是可以确定的，下文将有资料证之。

如果对这两则新闻仍然觉不放心，我们可再看1907年8月22日，《檳城新报》又刊载了一则题为“富商热心学务”报导：

坝罗埠之吡叻公立育才两等小学校，自春初开办至今，尚未开始募捐经费，而校事则有着着进步之概，虽于前两月总领事孙公到吧罗时诸商公讌之，孙公於席间提论此事，并捐廉助款以为提倡，诸商踵起继共捐有万余元。而诸学董之意，以此校既名吡叻公立，且为全埠办学之起点，宜合吡叻士商以维持之，是日到者仅数十人，应另日派委员往境内各埠募捐，冀集钜款以成宏大久远之规模。迨后，以事繁未暇及此。故当日所已认捐之项尚未开收，而校中经费仅藉姚君峻修借用校舍四间、胡君子春捐银五千元办理而已。闻日前胡君子春晤姚君俊修时提论经费事。乃姚君慨然愿将彼现在新建坝罗河旁之屋内拨出十二间，畀该校收租充作常经费云云。果尔则诚可为该校贺，而姚君牺牲钜款以办公益，盖不让叶澄衷专美于前也。姚君诚伟人哉，吾知吡叻富商必有闻风继起者矣。

必须指出，这则报导，却同时为1907年8月28日，《中兴日报》以同样的标题“富商热心学务”，以有意地在一些地方改写及省略一些内容的方式给予刊载：

坝罗埠之比叻公立育才两等小学校，自春初开办至今，尚未开始募捐经费，而校事则有着着进步之报，后诸商踵起继共捐有万余元。诸学董之意，以此校既名比叻公立，且为全埠办学之起点，宜合比叻士商以维持之，爰定派妥



员往境内各埠募捐，冀集钜款以成宏大久远之规模。迨后，以事繁未暇及此。故当日所已认捐之项尚未开收，而校中经费仅藉姚君峻修借用校舍四间、胡君子春捐银五千元办理而已，闻日前胡君子春晤姚君俊修时提论经费事。乃姚君慨然愿将彼现在新建坝罗河旁之屋内拨出十二间，异该校收租充作常年经费云云。果尔则诚可为该校贺，而姚君牺牲钜款以办公益，盖不让叶澄衷专美于前也。

我们从这两条新闻报导中，再次的确认育才两等小学确实“自春初开办至今”，且“校事则有着着进步之概”。而且，这里要特别注意之处，乃是明白告知这所两等小学，名字是“育才”。有关“育才”校名，是基于什么理由取名，以及什么情况下所冠于斯名，是尚待考证者。目前资料显示，“育才”校名最早见于记载者，当为《檳城新报》5月28日的新闻报导，下文将论及。

而对于学校的经费，则有进一步的进展——报道中提及的几件事值得注意，即：

第一件事：“前两月总领事孙公到吧罗时诸商公讌之，孙公於席间提论此事，并捐廉助款以为提倡，诸商踵起继共捐有万余元。”

这一整段却被《中兴日报》特意删除，盖因《中兴日报》创刊于1907年8月20日，是同盟会在南洋的重要机关报，对清廷驻新总领事，如此积极协助兴学育才之事，对清廷的形象确实是极有利，反过来说则对革命事业不利，因此删掉此段当是情理之中。而在文气上，若没有两相对照，是难以察觉，编辑在处理时，在文意与逻辑上确实也极照顾到，可见其时中兴日报编辑者之功力。

至于孙士鼎何以会在“前两月”到“吧罗与诸商公讌”？，当时公讌的境况如何？这对育才学校在创办初期的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有关孙士鼎的事迹，本人另有专文论述，这里不欲着墨太多。此仅略为介绍之，孙士鼎（字铭仲）在出任不足两年的新加坡总领事任上（1906年1月13日，正式接任新加坡兼海门等代理总领事。同年11月3日，方任命为新加坡兼海门等总领事，直至1907年10月21日，任满解职，侨民欢送，离任回国），对新马华社作出了非同凡响的贡献与成就，当他莅临坝罗时，已因在解除华旅裸体纹身、改善禁疫所条件，以维护民族尊严与国体；在领署中首设戒烟所，推动各埠设立振武戒烟社，一振萎风以惠黑籍等等事迹为新马华旅尊崇不已。更有一层，因1906年2月刘士骥受邀抵南洋视学，数月后归国稟请两广总督岑春煊“爪哇全埠，设立总学会；新加坡檳榔屿等埠，各设学务公所”，岑督以“所拟名目，与学部新章不符”，改总学会及学务公所为劝学所。新加坡委总领事孙士鼎为总董；檳榔屿则委胡氏为总董”。所以，孙氏以领事兼为新加坡学校事务的总董身份，而胡子春为檳榔屿学校事务总董，这时却又身在中国。

了解这一层，再来看看下面两则新闻：

第一则，1907年5月28日，《檳城新报》的“吡叻通讯”报导：

孙总领事铭仲日前为吉隆坡尊孔学堂开校，特税驾吉隆，昨午本埠胡君竹园得接领事来函谓，已定十六日行旌莅坝罗埠。现已预备欢迎矣。初胡君以吡叻公立两等小学虽经借地开办，而必须另行建筑校舍，乃该校所有开办常常年等（经）费，现祇由胡君子春独力垫出，故拟函请领事来吡叻视学，藉以鼓励人心，然後开捐，庶几捐者踊跃，且为吡叻学界建立久远之规模也。今幸领事惠然肯来，将来成绩必大有可观焉。顷复接金宝埠电话谓，领事已行抵金宝，现寓于余君东旋之洋楼，准来日附火车来坝罗云。

第二则，1907年5月30日，《檳城新报》的“吡叻通讯”报导：

总领事孙铭仲于十六早附金宝埠火车，先到拿哈车站，上埠即由永丰号诸君招待，继莅乐育两等小学校巡视一切，午後來坝罗，下午三时到吡叻公立两等小学校。先由该校教员率领学生列队奉迓，相见彼此三鞠躬，随于校外合摄一影以为留纪念，适本埠之华民护卫司亦与焉。学生排队步伐整齐，与观者皆称羨不置，盖其开校仅两月零也。午後五时，胡君竹园恭 蒞总领事于新改良商局，并邀埠中士商赴席者约四十人，席间胡君竹园起言，孙公莅任以来惠商兴学诸善政，并述吡叻公立两等小学开办得姚君竣修借屋送地，及愿捐巨款等事，孙公随起答曰，仆服官斯土，提倡公益正应尽之义务，诸君过誉，吾何敢当。至於吡叻公立两等小学校得胡姚诸君裁成，仆今日目睹其盛，欣慰之至。但借地开办可暂不可常，则他时建筑校舍暨常经费等事，需款浩繁，是宜亟筹的款，庶免中止之虞，方为正办。然仆不日行将解任矣，此後聚晤未卜何期，仆今日之来固以此，且欲闻诸君商确此校久远之谋也。诸君想亦稔知学校之关系于人之大且重矣，我国旧日不讲求兴学，或学非所用，始有今日贫（困）之象，试横览五洲、纵观舌古，曾有不学之国能致富强者否。诸君苟欲为国家计，为子孙计，必力助此校乃可，盖此校既名吡叻公立，且属创始，是即系异日之蒿矢，不可不组织一完（强）之规模，想诸君热心公益，成竹在胸，当不劳余言之喋匕也。于是郑螺生、区刚、李孝章、崔朴池四君皆曰，孙公今夕所甘为我华侨设想，用心良苦，吾人正宜踊跃捐助，期以慰孙公之望，亦即所以自谋也，言毕，全座赞成。戴君春荣、号喜云首认捐三千元，曾君肇卿、吉承隆号各捐五百元，胡竹园、胡子和、区刚、曾耀南、郭应章诸君各二百元，梁作霖、胡周宏、唐礼屏、何照轩四君各一百元，李润峰、胡玉如、李孝章、陆文辉、余友多、李铭卿、余彦臣七君各五十元，区秀卿、胡五怀、崔朴



池三君各二十元。合胡君子春五千元、区君慕颐一千元，约共一万二千之谱，另总领事捐年终大考奖赏银二百元。查是日梁碧如、郑大平昆仲、余东旋、姚德胜、黄务美诸巨商皆未到。

“孙总领事铭仲日前为吉隆坡尊孔学堂开校，特税驾吉隆”这一段文字，清楚说明了尊孔学校是于1907年5月左右开校，而育才学校则已早在同年两个月前的3月24日开校，比尊孔更早。所以为何在此文一开始，便有育才学校甚至比尊孔学校的开办的时间更早的论断（有关尊孔学校的开办，余暇时将另文撰之）。而前面所说，7月2日这则报导，可说是目前所仅见最早记录育才校名的报导。

原来，是胡竹园（与胡子春关系匪浅，即是族人、生意合夥人，也是华团及公益事业同伴）鉴于育才学校“虽经借地开办，而必须另行建筑校舍，乃该校所有开办常常年等（经）费，现祇由胡君子春独力垫出”，如此独木难撑，且非久长计，因此想借重孙士鼎新加坡学校事务总董与人气，为育才学校筹措办学经费拉抬，方有“拟函请领事来吡叻视学，籍以鼓励人心，然後开捐，庶几捐者踊跃，且为吡叻学界建立久远之规模也”之事。

如上报道所云，孙士鼎于1907年5月27日（丁未四月十六日）早上，由金宝乘火车抵拿乞埠，由胡子春开设的商号永丰行接待，而后“莅乐育两等小学校巡视一切”。（乐育两等小学亦是由胡子春、胡竹园等人创办，其开办时间很可能与育才学校的开办同时或稍后一点，因为胡子春在1907年7月15日方从中国返抵檳城，此校是先开学，等到胡子春回来后在1907年8月4日（丁未四月十六日）方办理开校大典。）午后“三时到吡叻公立两等小学校”，一番热闹有所不免。不过，这里再一次的提到“开校仅两月零也”，这和前面所指陈3月24日是育才的开校日是遥相呼应。

于是，我们方对1907年8月22日，《檳城新报》所指“前两月总领事孙公到吧罗时诸商公讌之，孙公於席间提论此事，并捐廉助款以为提倡，诸商踵起继共捐有万余元。”的公讌情况，有了更清晰、更深入的理解。即1907年5月27日下午五时，由胡君竹园等于新改良商局设下公讌，广邀埠中士商赴席，出席者约为四十人，其中梁碧如、郑大平昆仲、余东旋、姚德胜、黄务美等霹雳诸巨商不知是有请或未请，却未能如期赴席。

在清廷驻新总领事孙士鼎所谓“为国家计，为子孙计，必力助此校乃可”大义，“借地开办可暂不可常，则他对建筑校舍暨常年经费等事，需款浩繁，是宜亟筹的款，庶免中止之虞，方为正办”，以及“此校既名吡叻公立，且属创始，是即系异日之蒿矢”的晓谕与号召下，孙氏复以捐廉助款（“捐年终大考奖赏银二百元”）以为提倡的举措下，在座的数十诸绅商当然不会袖手，纷起捐资，在一个场合，数十人即能筹得万余元（加上胡子春先前已捐者），这笔数目在当时可说是一笔相当庞大的

金额。如果要对这笔金额有具体的概念，就以同一天，即1907年5月27日当天的物价来作个比较，这一天檳城新报的“目下各货行情”栏内，标明“椰子每千粒叻坡总价三十元七角”，换算起来，每粒椰子只值不到四占。

第二件事是：“诸学董之意，以此校既名吡叻公立，且为全埠办学之起点，宜合吡叻士商以维持之，是日到者仅数十人，应另日派委员往境内各埠募捐，冀集钜款以成宏大久远之规模。迨后，以事繁未暇及此。”

在这次公議里，也因为孙士鼎的点出：“盖此校既名吡叻公立，且属创始，是即系异日之蒿矢，不可不组织一完（强）之规模”，诸士商方意识到，已开办的育才两等小学，冠上“吡叻公立，且为全埠办学之起点”，已不是少数学董个人的事情，更应将此事提升为大怡保地区的华旅应办的文教大事业，全埠士商理应共同负此发扬文教，兴教育才的重大使命与任务。基于这样的理由，乃提出“宜合吡叻士商以维持之”，“派委员往境内各埠募捐，冀集钜款以成宏大久远之规模”。

只是此事知易行难，所谓“迨后，以事繁未暇及此”者，余意以为，事繁未暇固是矣，然其中乃因欠缺一位好公义、仗疏财，一如孙士鼎率先捐廉，足以身率士卒、望重诸绅商之领军人物，此方为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此领军人物，则舍离檳返回中国近9个月，至直1907年7月15日方返抵檳城的胡子春不能了。

第三件事：“故当日所已认捐之项尚未开收，而校中经费仅藉姚君峻修借用校舍四间、胡君子春捐银五千元办理而已”

因为没有这样有魄力的领军人物，莫说派委员往境内各埠募捐之事未能兑现，甚至连两个月前当着总领事面认捐之万余元捐款，迨无派人开收。

这里再次的且明确地指出由始至终，育才两等小学的创办，迟至育才学校由3月24日开校，至当年的8月，其经费却仅有由胡子春所捐银五千元而已。

第四件事：“闻日前胡君子春晤姚君俊修时提论经费事。乃姚君慨然愿将彼现在新建坝罗河旁之屋内拨出十二间，畀该校收租充作常经费云云。果尔则诚可为该校贺，而姚君牺牲钜款以办公益，盖不让叶澄衷专美于前也。”

因为胡子春这位领军人物的回返主持，且主动约见姚德胜（字峻修）商讨办学经费事。不管是姚氏出于自觉抑或为胡子春说动，终于，育才两等小学的常经费才有了重大的进展，姚氏“慨然愿将彼现在新建坝罗河旁之屋内拨出十二间，畀该校收租充作常经费”。如此这般，育才学校才总算稳住了发展的步履。



无巧不成书，恰恰在1907年8月22日同一天，《檳城新报》刊载这则“富商热心学务”报导外，又刊载另一则可与此事相参照的新闻，新闻标题为“屋宇租值大涨”：

坝罗埠商场屋宇近年来颇不敷用，故凡有屋地者皆争先建造，而屋租早已腾贵异常，如稍可为集合地点之屋，大约宽广二千丁方英尺一层楼者，须租银百五十元左右，彼商场中人已觉难堪。诂近两月来，更为飞涨，其中以英业主之屋宇为首，而吧罗埠我华人之置有不动产者，亦以彼为第一，即彼几占全埠四五份之一，故如昨为五十元租者，今日遽起至八十元，而各商以无铺可迁，故惟有隐忍受之耳。

由此可概见姚氏所拨十二间店铺，其租金当不菲也。而这里说的叶澄衷(1840-1899)，乃清末资本家，字成忠，原籍浙江慈溪，生于镇海。少因家贫辍学，到油坊当学徒。後至上海当店员，旋于黄浦江面操舢板，以为外轮所需物品供输，由此获利独厚。遂於虹口设老顺记商号，经销五金零件，不数年，移总号于百老汇，并在长江中下游各商埠遍设分号，遂成巨富。继投资金融业，在上海、杭州、镇海、芜湖、湖州等地开设票号、钱庄，鼎盛时竟达108家。又相继开办上海燮昌火柴厂、纶华缫丝厂。1896年盛宣怀筹办成立中国通商银行，被指派担任总董。叶氏虽为巨富，却热心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在家乡和上海设立慈善救济机构，多次出资赈济浙、鲁、豫直等省灾区，受清廷嘉奖，并捐得候选道员加二品顶戴。1899年病重中念及少时失学之痛，决定捐道契25亩、现银10万两兴建中国第一所私立新式学校(1901年建成，取名澄衷学堂)，是年11月卒于上海。明乎此，方乃理解为何记者发出“姚君牺牲钜款以办公益，盖不让叶澄衷专美于前也”之论。

(三) 开办初期的教学活动与其他措施

1. 添办夜学

《育才百年卷二·百年长征》特刊〈育才的足迹(1908---2008)〉一文页89中，有如下的描述：

育才初创 , 属公立, 只办高小, 取名‘育才学堂’, ‘专为收容由中国南来, 已有初小程度之学生, 其实初小新生也是招收的对象。

这段话，由编者的注释得知，是引自蔡任平校长在1948年校刊中所撰校史者。“公立”嗣无异议，“只办高小”的说法，是值得斟酌。尤其是“专为收容由中国南来，已有初小程度之学生，其实初小新生也是招收的对象”更令人存疑。

清廷自1902年和1903年相继公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使改革旧式私塾，建立新式学堂起了指导作用。而马来半岛于1904年在檳城建立孔圣会中华学校首开先河，翌年清廷委派大臣张弼士赐给中华学校光绪御匾《声教南暨》，其办学模式即根据《奏定学堂章程》更宜行事，胡子春是该校的监督（民国后这职称就改为校长也），又出任育才学校总理。因此，虽然在开办初期，师资人员或许薄弱，但是公然冠于“两等小学”，在开办时理应包括初等，方为合理。

要弄清这问题，或许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证明，不过，从1907年7月12日，《檳城新报》有一则“学堂试验表”的报导：

坝罗埠吡叻公立育才两等小学校开校已一学期，因循例于日昨放暑假，前两月为第一学年第一期试验之期，连日分科考试，学科分：修身、经学、国文、国语、算学、习字、图画、体操、音乐九门，其前列十名及积分表列如左：

这则新闻中罗列的学科九门，都是两等（初等与高等）必修之科，反而高等小学所应有的专科（农业、商业）却没有。从某种角度而言，当时育才学校开办时，已相当完备。或许蔡任平校长是有所依据，才有“只办高小，取名‘育才学堂’，‘专为收容由中国南来，已有初小程度之学生，其实初小新生也是招收的对象’”的说法，只是所据理据为何，并没交待。下文还将引用1908年7月31日的材料，对此项问题再予辩论。

下面还要再引1907年5月18日，《檳城新报》有一则“巴罗通信”的报导，一来可丰富育才学校开办初期的校史，二者，则对上述的“只办高小”说法的一种回应：

吡叻公立两等小学办理渐（臻）完善，顷闻该校以从前中学未立，人多就学于西，今欲其转入中校未免顾此失彼，断不乐从。且我国往日未讲求教育，彼年长者亦多未识字，及出而谋生，又日无暇晷。虽有志於学，亦苦无由，因拟就该校内添办夜学，现已拟就简章，当于日内发刊矣。

兹抄列于左

吡叻公立两等小学校中文夜学招生简章

- 一、宗旨：本学以培养国民之性质，扩充国民之知识，俾华旅子弟咸通祖国文字，以滋其国家思想；
- 二、学科：现定摘要之科目凡五，一、国文（解释字义，教阅报纸及普通信札），二、国语，三、算术、笔算，四、地理大势，五、历史大略；



- 三、时间：每晚教授二小时，自七点至九点，逢星期晚停课；
- 四、资格：以体魄强健、勤奋向学，并无洋烟嗜好者为合格；
- 五、学齡：有志来学者，不拘年龄；
- 六、学額：本学之设，原为教育普及起见，学額无限，以宏造就；
- 七、程度：本校现时暂分甲、乙两级，俟考验後，择其粗通文义者为甲班，其余皆入乙班；
- 八、学费：每人月收两元，杂费在内，按月上期清繳。所有书纸笔墨，俱由各生自备，其重要讲义，则由本校印给，毋用纳费；
- 九、挂号：凡有志来学者，请即开具姓名、年岁、籍贯三代，亲到本校注册，其报名限至四月底截止。开学期准拟五月初一，各学生宜届时预备。

育才学校“添办夜学”，这“添办”两字告知我们，是在原有的高、小两等之外添加者。这和1904年檳城孔圣中华学堂开办初期，假平章会馆先开办夜学是有所区别。这则新闻报导是在1907年5月18日，还是使用“吡叻公立两等小学校”，这再次从侧面来印证1907年5月28日那则报导，确为目前所仅见最早记录育才校名的报导。因此，育才学校开办初期“只办高小”的说法，是不足采信者。

2. 师资与学生

再回过头来看1907年3月12日，《檳城新报》的报导中有：“其教员一区姓、一邹姓，皆由省城聘来者。区教员岁底已到埠，邹君亦于昨日抵步，大约开学之期当在来月初旬矣！”由此确知育才学校开校前，即已从广州即羊城聘得区、邹二教员。至於两教员名字、籍贯、年龄与学历为何？将负责教授什么科目？则没有谈到。

不过，从1907年5月18日，育才学校开设中文夜学，以及1907年7月12日“学堂试验表”的两项报导中，或可据此稍作推论，即学校在3月24日开校后，或可能再添师资，无论如何，从夜学所开设之于项科目（国文、国语、算术、笔算、地理大势、历史大略）以及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所考之修身、经学、国文、国语、算学、习字、图画、体操、音乐九门中，我们约略可知当时师资的专长。而且，又可进一步推论，为何从省城聘请，不在本地。因除国语一科外（需懂北京官话），余者本地虽难找，但尚不至于没有，因此，应是一若檳城中华学校，须具备完整师范背景者。当时新马只有檳城在1906年刚开办师范传习所，虽第一期学生在该年底即毕业，惟只是师范速成班，难以胜任也。

区、邹两教员究是谁聘请，如何由省城聘请而来，虽然缺少直接资料佐证，但是，我以为，这和胡子春正好在1906年底在广州面见两广总督岑春煊，由此，胡子

春、两广学务处，在聘任区、邹两教员的事件上，应该有关连，只是目前还没有更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只能在此存此意见。

有关育才学校的师资问题，在1907年4月6日，《檳城新报》有一则“吡叻访函”的报导，也提供了一则侧面的参考：

音乐一门，古时兴于六艺之中，盖以其能感发心志，涵养性情也。故外国中小学堂列为专科，意亦本此。乃吾国久乏讲究，尽失古雅之传，以致世风日下，良可慨也。吡叻公立两等小学教员邹、区二君及胡君竹园、余君彦臣等有见乎此，特约合同志者十余人组织一音乐研究社，以星期日为聚会之期，于日昨邀集社友合摄一影以留纪念，斯亦社会改良一现象也。

至于学生方面，1907年7月12日，《檳城新报》“学堂试验表”的报导里，已将第一学年第一期的部份学生罗例，我们由此也可大略知道当时已分成甲、乙两班，两班在九门课里总成绩各列前十名学生：

甲班		乙班	
黎兆聪	九四	林(尚)	八八
郭宝荣	九三	蔡寿南	八五
曾昭清	九〇	刘应龙	八二
蔡文病	八六	巫九	八二
黄玉荣	八四	吴汉祥	七四
蔡学健	八四	黄卓繁	七一
黄玉灿	八三	殷择培	七〇
杨德祥	八三	方清泉	七〇
胡传茂	八三	林国充	七〇
梁兆柱	八二	姚恩麟	六九

这表明，育才两等小学校从1907年3月24日开校后，即分有甲、乙两班学生，其人数每班皆逾十人。只可惜在这7月12日的这项报导里，没有清楚地列明这两班是属于什么等级的学生。不过，由甲、乙分班来看，应是同属同一等级。

而在1908年7月31日《檳城新报》另一则报导“育才学堂学期考试”：

坝罗育才学堂已届第二年第一学期，爰于六月廿五、廿六日两日，由校长、教员分科试验，连日邀全各学董监试。各学董以学生成绩颇优，特由胡、区、郑、李诸君共概捐五十八元，以奖赏前列诸生而勉励后进云。兹将学科暨各班、并列各姓名表列如左：



第一班	姓名	总积分
	黎兆聰	九四
	蔡文炳	九二
	许文生	八九
	胡传茂	八八
	陈均(全)	八(三)
	郭宝荣	八二
	李锦(淌)	八(一)
	杨德祥	八(一)
	巫九	八〇
	蔡寿南	七四

第二班	姓名	总积分
	江光秀	七五
	姚恩麟	七四
	郑景泰	七四
	刘应龙	七〇
	彭玉珊	七〇
	邱禄麟	六八
	李渠	六六
	马康	六六
	熊四源	六五

第三班	姓名	总积分
	方留	七〇
	候盛勋	六九
	潘容輝	六九
	郑刊芬	六七
	刘润	六五
	陶锡荣	六四
	李东	六〇
	曾昭腾	五〇
	姚茂(贞)	四六
	张海浪	四五

学科

第一班、第二班

修身、经学、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习字、国语、唱歌、体操。

第三班

修身、国文、算学、习字、国语、唱歌、体操

这则新闻带来数项讯息：

(1) “已届第二年”的说法，再一次明确告知育才学校已在1907年开办了。而与1907年7月12日《檳城新报》“学堂试验表”的报导中相较，1907年第一学年的试验是在该年的5月份左右（“前两月为第一学年第一期试验之期”），第二学年的试验期则是1908年6月25日及26日（按这里肯定是公元，若是指农历则换算成公历是8月3日及4日，报纸不可能超前报导）；

(2) 已聘有“校长”及诸教员，只是没有将姓名写出，殊为可惜；

(3) 考试是如此慎重，是“由校长、教员分科试验，连日邀全各学董监试”；

(4) “学生成绩颇优”，这证明了从开办以来办学效果良好；

(5) 因为第(4)项，故学董中的“胡、区、郑、李诸君共概捐五十八元，以奖赏前列诸生而勉励后进云”。这里的“胡”、“区”、“郑”、“李”，因没有写出，不能肯定是何人，如，“胡”者，可能是胡子春、胡竹园或胡子和都可能；“区”者，可能是区君慕颐或区刚，那“郑”、“李”就更难说定了；

(6) 1907年7月12日《檳城新报》“学堂试验表”里是以甲、乙来分班，共有两班。1908年则是以第几班的方式分班，则共分三班。可惜不管是1907年或1908年的分班中，我们依然无法看出是不同年级，还是同一年级。只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这两年的分班，依丝是以能力来分班，这可从得分数不同班级的得分逐渐低下，可证也；或也可从1908年第三班的学科考七科，第一及第二班需考十二科看出。当然，这也可能是三班是不同年级，故其考科数目自然不同，这有待进一步的佐证方可；

(7) 有关学生方面，1907年报导的学生（甲、乙两班名列前十名），有些不在1908年的报导里（没有说是名列前茅或全部的学生），如甲班：黄玉荣、曾昭清、蔡学健、黄玉灿、梁兆柱；乙班：林（尚）、黄卓繁、殷择培、方清泉、林国充。如是1908年的报导是指全体学生，则这些学生表示已退学；若是1908年的报导是指名列的学生，则这些学生或成绩为其他学生取代；

(8) 从1908年考试列出的科目，第一、二班的十二门（修身、经学、国文、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习字、国语、唱歌、体操）、第三班的七门（修身、国文、算学、习字、国语、唱歌、体操），和1907年列出的九门（修身、经学、国文、国语、算学、习字、图画、体操、音乐）相比，除唱歌改为音乐外，多了历史、



地理、格致三门。不过，正如前述所说，都是两等（初等与高等）必修之科，反而高等小学所应有的专科（农业、商业）却没有。这里再次的印证，育才创办时冠上“两等小学校”，且从一般的原则来看，理应先由初等小学先办起，逐步办高等方符合事物的发展原理。

五、结语

本文的撰写，重点是试图厘清与确立母校霹雳育才华文独立中学的创办日期。虽然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尚不能说十分充裕，不过，通过现有的资料来审视，1907年3月24日，作为育才学校开校日，应是无可争议。只是对于开办初期的课程、师资、教材、学生有许多空白之处尚待填补，这端视是否发现更进一步的材料，方得给予补充。

其实，在本文开始之时，已指出育才学校，作为首间全埠共同推动成立的公立华文学校，1907年3月24日的开校，标示了霹雳怡保的华族文教发展史也，将从这一天立下重要的里程碑，并非泛泛之言。因为，正如《东方杂志》二卷四期94页报导：“南洋各岛华商多迷信，而大北叻埠（即今之霹雳大怡保地区）尤甚，每岁耗费不下万元，胡子春慨然悯之，乃爰集同志演说，谓媚神无补时艰，不如将此钜款兴学育才。稠人广座，大声疾呼，一时欧君慕姬、余君彦臣、茂君静斋及同志数十人，俱鼓掌称善，遂议定移款设立学堂，以教育旅居之青年子弟云。”育才学校的开办之前，是经历了一场破迷信、育英才的“思想斗争”与“兴学育才”的动员运动，资料显示，胡子春曾为此遭到拥护神权及既得利益者的大肆攻击，其具体的情况，若有时间，将另文撰之。

最后，必须要强调，育才学校的创办，由始至终，其头等功臣应为胡子春，其余诸人，如姚德胜、胡竹园、孙士鼎等固有力焉，然由首倡、出钜资、主持、劝导、引荐之功，乃出众人之上也，这一点必须要加以肯定。

*锺伟前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现为董总资讯局行政主任。

参考文献：

陈育崧，《椰阴馆文存》卷二，新加坡：南洋学会，1983年。

麦翔编，《百年育才》卷二，怡保：霹雳育才中学（独立）董事部，2008年。

报章：《叻报》

《槟城新报》

《中兴日报》

Times of Malaya



《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

王国璋*



书名：《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

作者：黄庭康 译者：李宗义

出版社：台北群学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

页数：324頁

本书源出黄庭康博士1999年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育政策研究所完成的论文，2002年已先由纽约的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为英文专著（*Hegemonies Compared — State Formation and Chinese School Politics in Postwar Singapore and Hong Kong*），同年则再凭此书，摘下台湾中央研究院年轻学者研究著作奖的殊荣，可见其份量。

《比较霸权》一书基本上采用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所谓“霸权”（hegemony）及“国家权力形构”（state formation）的概念，来比较战后二十年（即1945至1965年）星、港两地政府处理华文学校的策略。其理论架构并试图结合教育社会学者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教学机制”（pedagogic device）观点，以对葛兰西的国家霸权论述作出修正。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其它比较教育学方面的论著，作者除藉由历史个案作理论剖析外，也涉猎并引用了不少一手史料来论证其对个案的分析观点，诚属难得。所以若说《比较霸权》是一本兼顾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佳作，并不为过。

黄氏的基本论点，应可大致概括如下：二次大战前，星、港两地的华校都是依循中国的教育制度与内涵办学，两地的华校生，自然也就受着同样一套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熏陶，且不乏民族主义激情和反帝国主义思想。这种现象，对战前的两地殖民统治者而言，问题还不算大；惟二战落幕后，政治情势丕变，华校的独特性遂不仅有碍两地的政治稳定，更是国家权力形构的绊脚石，自然不见容于当道，而亟思改革或转化华校。不过新加坡和香港因为在国家权力形构方面有不同的需要，也面对着不同的结构制约（主要是指社会内外的族群因素），两地政府处理华校的手法，遂出现重大差异。

新加坡是在二次大战后，即迈向自治与独立的进程。黄氏认为，为配合建国需要，统治者需要打造一套以新加坡为本的身份认同，并融合这多元社会里的华人与其它族群。此外，新加坡既为一马来世界环伺下的小岛，执政者亦须极力避免被岛内的马来人和岛外的马来邻邦视为偏袒华人。新加坡殖民政府乃试图先以“去华化”（de-Sinicization）的策略处理华校，希望最终能以英校取而代之。但这策略激起当地主流华社的强烈反弹，认为政府是在阴谋消灭中华文化，该政策遂不了了之。而19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大部份新加坡住民获得选举权，统治菁英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仰赖于华人群众的支持（华人人口历来皆占新加坡总人口的七成五上下），政府于是改弦易辙，将华校纳入为国家教育体系一环，承认它们与其它源流学校的平等地位。不过黄氏认为，这种怀柔策略，固然有助于执政者巩固权力、分化本土华教运动并削弱马共的群众基础，但另一方面，还是无法解决国家权力形构的其它重大挑战：不同源流学校共存，即意味着社会区隔现象的延续，当然也无助于形塑一民间共享的新加坡中心意识。执政者于是又诉诸于两类手法，来试图解决问题。首先，当局试图强化英校的华语教学，以拉近华校与英校之间的语言、文化鸿沟；其次，它又企图透过针对华校的课程改革，来扭转华校历来以中国而非本土为中心的意识。惟黄氏的实证研究指出，基于种种原因，两者的成效最终都不彰显。

相较于我们熟悉得多的新加坡案例，我想黄氏对香港案例的讨论，应更能挑动本地读者的兴味。香港在二次大战后续为英殖民地，一直到1997年才终于回归中国主权。此外，香港基本上是个单族群社会（其战后的华裔人口，曾一度高达九成八），殖民者亦无需面对如新加坡般严峻的族群政治压力。话虽如此，战后中国政治的巨变，仍迫使港英政府不得不有所调整、回应。1949年大陆赤化，国民党政权则退守台湾一隅。而为了一方面防堵共产主义渗透，另一方面压制台北当局在香港过激的反共活动，港英政府乃不得不设法引导港人的政治认同，以维系其殖民统治的稳定与正当性。黄氏指出，相较于新加坡，港英政府乃采取了去国族化（de-nationalization）的策略因应华校¹。这意味着它既不吝于将中华文化吸纳入香港的公教体系，也未意图模糊华校的身份认同，其目的仅在透过诸如官方课程及会考等制约手段，将政治认同自文化认同中巧妙剔除，而使学子既不倾向共产中国，也能不惑于台北的民族主义召唤²。

¹ 在香港，华校指的是以粤语而非华语（普通话）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学校。这类学校，在当地称作“中文学校”。

² 诚如黄氏所言，官方课程会试图抹去与中国相关主题的情感色彩，而把“中国”——一个国民党及共产党都希望年轻人热爱并效忠的祖国——转化成某个外在的、纯知识性的对象。（页182）关于这点，香港的知识分子近年来也多有反思。譬如梁文道，就曾在某篇悼念六四事件廿周年的文章里提到：“……我这一代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生在香港长在香港，经历过香港所谓的‘黄金时代’，看过‘阿灿’和‘表姐’的可笑形象，曾经自豪于港人身分不同，歧视内地的落后贫穷。我们虽然也学中文和中国历史；但和其它国家把国文国史当成国民教育核心的教学法不同，殖民地式的文史教育是一套非国族化的技术教育，不鼓励我们在国家文学和历史里面获取深厚的国民认同，只把它们当成纯粹的资讯与知识。我在两蒋治下的台湾度过童年，对中国怀有热情也许还不奇怪；但我那些同学，我的同代人，他们与香港意识一起茁壮，受的是非国族化的基础教育，他们怎么会爱国呢？他们的中国情怀是怎么来的呢？也许六四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我们守护记忆，直到最后一人〉<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angwendao/archives/298555.aspx>。此文原载于香港《明报》，2009年6月4日及5日。

而另一方面，为培育双语菁英以助香港发挥其沟通东、西方的功能，殖民政权也早就在香港英校教授中文³。如此一来，港英政府遂在无意之中，拉近了华校与英校间的文化距离，而使其得以免除许多国家权力形构过程中的棘手难题。简言之，基于种种因素，黄氏显然认为，港英政府在战后二十年处理华校的策略上，是较新加坡政府来得成功的。这尤其具体而微的反映在高等教育上，“当香港政府透过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并将中大发展成亚洲有名的学府巩固统治权力时，新加坡的执政者却极力阻挠‘南洋大学’与‘义安学院’——一所由潮州方言团体成立的华文高等教育院校——的发展。”（页198）

作为读者，本书的最大遗憾，无疑是作者的研究范围仅及于1965年。但这当然说不上是作者的错，研究者难免都有其时间与精力上的局限。诚如黄氏所言，1965年，新加坡正惨遭逐出马来西亚联邦，而香港也正身处风暴前夕⁴，两地同样面对着新的国家权力形构挑战。而既是新的历史阶段，那留待下回再作处理，想必较佳（页15）。只是两地的好戏，远未落幕：新加坡执政者自1980年代以降，虽已大致成功地“收拾”华校，往后却因华校殒落所衍生的诸般语言、文化问题而多所反思，如今已又逐渐往局部恢复华校（尤其是小学阶段）的方向回摆。香港特区政府则是自九七回归后，大力推动母语教育，却反而不断遭致民间反弹，乃不得不在晚近“微调”政策，藉授权各校弹性实施英语教学之举，来模糊中文中学与英文中学的分际。黄氏若能再接再厉，顺此历史脉络持续追踪、比较两地国家机关与学校体系的互动，当甚有意思。

其次，就理论框架而言，黄氏强调其贡献在于：一、把族群因素引入霸权理论。引用葛兰西理论的学者，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因过去多把焦点摆在阶级问题上，而相对忽略了族群因素的影响。本书则是透过新、港两案例的比较，明确揭示了族群因素如何影响国家权力运作。二、跳脱“西方中心化”的研究偏差。过往相关研究多关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成形之际（即十八至十九世纪）对教育体系的影响，而甚少碰触到其它非西方案例。本书则是透过检视廿世纪中期的两个亚洲案例，并藉由结合伯恩斯坦“教学机制”的理论洞见，点出了教育体系的相对自主性，论证它不仅仅是受政治影响的依变项（dependent variable）。某教育体系一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巩固，其内部根深柢固的规则、实践、既得利益和社会关系等，都足以影响国家权力形构的结果。所以说两者的关系，实为互动，而并非如一般所认知的由国

³ 香港的英校（Anglo-Chinese schools）既要求学生修读“中国语文”，大多也都设有“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学”科。又，香港的小学自二次大战后，已几乎全调整为母语（粤语）教学的华校，直到中学阶段，才有明显的“中中”与“英中”之别。而与新加坡社会相较，香港社会整体华人特质之浓烈，显然也非前者可比。所以换句话说，即便是同处殖民时代，早年香港英校生的文化内涵，仍与新加坡的典型英校生有别。

⁴ 1966年，香港即因往来港岛与九龙之间的天星小轮加价一事，触发“九龙暴动”。紧接着翌年，又因为大陆文革风潮之影响，爆发了“六七暴动”。这两场骚乱都让港英政府措手不及、疲于应付，也开始警觉到它与香港本土华社之间，毕竟仍存在着严重的沟通问题。

家单向主导、形塑。然而我们若跳开比较教育学或教育社会学的范畴，改以政治学的角度切入（如本书副标题所言——华文学校政治），则这两点理论上的洞见，恐怕都说不上新颖有力。不少政治学者或族群研究学者早已指出，族群因素，绝对是战后不少亚洲与非洲独立新政体建国过程（nation-building）中的棘手难题。学者们运用的理论容或有异，但在政治研究者眼中，权力影响本就贵乎互动；而阶级以外的社群分化（族群、宗教、性别、地域...）亦为常态，彼此间如何利益交错互为颀颀，其实也不乏相关的学术讨论。

就作者对两案例的实证分析而言，愚见以为，黄氏显然对香港个案掌握得较为透澈，惟对于新加坡个案，则似乎仍缺了点切身体悟下的历史洞见⁵。当然，所谓“历史洞见”，见仁见智，绝对是有商榷余地的。首先，我认为黄氏为了将新加坡个案纳入其理论框架内讨论，而往往将“国家”（或谓“国家机关”，the state）当成一超然于民间社会之外的独立个体，忽略了“国家”说到底仍是由一小撮执政菁英所主导的人为建制的现实。尤其自1950年代中期以降，这些执政菁英已非外来的英殖民者⁶，他们脑中盘旋的意识形态，或说这批菁英作决策之际的所思所想，恐怕都与当时本土社会的思潮脉动紧密相关。黄氏在这方面，似乎就没强烈意识到当时在新加坡华社内部，英文教育背景与中文教育背景出身者在世界观与文化意识上的巨大差异。而另一方面，相较于“国家”，黄氏在个案讨论中，也往往倾向于将新加坡华社对华校政策的反应，视为一整体意见。然而当地华社的这类族群内部分歧向来分明，且英文教育背景者的势力毫不逊色，遑论还占据着国家政经方面的有利位置。李光耀政府的内阁要员，举例来说，就几乎全是后者。

此外，即便是中文教育背景出身者，华团领导人和市井小民对英文价值的认知与对自身语言、文化的坚持程度，往往也不尽相同。譬如中学阶段，是否仍该大力捍卫母语/华语教育，两者间就可能存在认知差距。黄氏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所大量阅览的战后二十年间《星洲日报》、《南侨日报》与《新报》等一手史料，虽已涵盖了当地左派及立场较保守的中文报章，但却未必能因此窥得中文教育背景者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全貌。此因华团领导人、报人及左派活跃份子的文化观点，往往在舆论上“代表”了群众，然而群众的观点，一般来说却是相对务实。总而言之，我的观察是：新加坡执政者固然在针对华校的政策作为上，受到岛内外族群因素的掣肘（岛内马来人的强烈反弹、岛外马来世界的政治猜疑），惟华人社群内的歧异，其实同样重要，或甚至影响更巨。而这样的观察，或许才能部份解释了为什么1980年代后，华裔执政菁英终得以技巧地凭此“消灭”华校，并代之以一统的英校体制。

⁵ 黄庭康博士显然与香港渊源较深。值得一提的是，黄氏的大学本科与硕士教育，也都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系、所完成。

⁶ 新加坡自1955年始，已正式开启了自治的进程。1955年4月普选过后，新加坡的民选议员，就已占了当地议会的大多数。英殖民官僚逐渐淡出，而由本土菁英主导的自治政府，则开始成形。

黄氏在谈到战后初期新加坡某咨询委员会对教育计划的讨论时，表达了困惑，而我认为那恰恰是本议题的关键之一。黄氏提到，委员会中多数委员当时仍怀抱着“英语还是本国最重要语言”的想法，认为纳税人有权将孩子送到英校就读，并且“相信英校能发挥族群整合的功能”。（页107）对此他在注释中写道：“笔者对于委员会一面倒向英文教育的立场感到困惑，因为该会由22名非官方成员（其中15名为华人）及9名官派成员组成。非官方成员中有三人代表中国国民党、一人代表马来亚共产党、一人来自‘三民主义青年团’，还有多名劳工界活跃份子与华籍商人……”（第五章注10，页249）以香港人的眼光来看，这种“一面倒”确实有些诡异，然而新、马一带华人对英文价值的过度迷信，以及对英语作为当地所谓“中性”（neutral）语言最适合维系为跨族群共通语的信仰，却是或明或暗人同此心，多年来一以贯之。所以若说本书对马来西亚当前华教有什么现实意义的话，我会觉得首先我们该理解到，教育体系与国家权力形构之间固然可互为影响，不过马来西亚的华教体系虽多年来屹立不倒，今日情势，却已绝难和战后二十年间相比。当前许多结构面的因素，包括族群，皆已严重制约着华教体系对国家机关发挥影响。然而衡诸书中的两项案例，华教体系若还希望有朝一日，能以平等之姿为国家教育体制所吸纳，则建构自身强有力的论述，实为当务之急。只是这样的一套论述，不仅要能说服马来主流社会，吾人更须诚实地面对族群内部种种语言、文化上的歧异观点，而非一味由董教总或华团菁英出面当舆论代表，骨子里却是逐渐陷入有将无兵的窘境。

最后附带一提的是，本书中译版虽经作者本人亲自校订，少数新加坡方面的译词，却仍难免与当地约定俗成的用法有些出入。此外，人名方面也挑得出几项错误。这类小瑕疵将来再版时若能避免，当更理想。譬如新柔/柔佛长堤之译为“柔佛大桥”（Johore Causeway）、拉萨报告书之译为“雷沙报告书”（Razak Report，页66）、泛马来亚政党之译为“泛马来政党”（pan-Malayan party，页70）、最高专员之译为“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页141）；又或rakyat误写为raykat（页51）、林有福误写为“林永福”（Lim Yew Hock，页62）、吴德耀误写为“吴耀德”（Wu Teh-yao，页142）等皆是。至于中译版触及香港的部份，则基本上并无此问题。

*王国璋 台湾大学政研所硕士、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

回应王国璋博士

黄庭康*

很高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期刊邀请王国璋博士为拙作《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撰写书评。王博士对《比较霸权》作出精简扼要的介绍，又坦承地表达了对拙作的建议与批评。他的书评极有助于引起读者对该书的兴趣。为了不辜负王博士的用心，本人就该评论的若干部分作出如下回应。笔者希望通过交流讨论刺激对华文教育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一、关于《比较霸权》研究年限的问题——王博士在书评中指出“作为读者，本书最大的遗憾无疑是作者的研究范围仅及于1965年”，然而他说“这当然说不上是作者的错，研究者难免都有其时间与精力上的局限”。本人感激王博士对本人的宽厚。然而，除了“时间与精力的局限”外，本人以1965年为讨论终点还有其它的考量。须知《比较霸权》的田野工作在1994至1996年间进行，它的其中一个主要资料来源是英国殖民地政府的解密档案。英国档案法有所谓“三十年条款”（Thirty Years Rule），政府一般只会把结案三十年的档案公开让民众参阅，因此笔者以1965年（刚好也是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及香港六六、六七暴动前夕）作为讨论的上限。这决定当然并不表示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问题就在该年告一段落，因为正如王博士所言，“两地的好戏，还未落幕”。笔者在撰写这回应的时候，其实正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进行访问研究。本人搜集了大量1966至1988年（该年新加坡的华校正式步入历史）教育变迁的资料，希望未来可以继续讲述这段还未讲完的故事。

此外，笔者十多年前不碰1965年后历史阶段的另一原因是顾虑到资料来源的问题。因为新加坡独立后媒体的自由度大幅收缩，报章消息的可信度受到许多人士质疑。另外，新加坡缺乏信息公开的政策，没有像英国的“三十年条款”，学者们难以通过官方档案掌握当权者在制订教育政策时的考量。为了避免因为资料问题而不能完成研究、无法拿到学位，笔者当时选择较安全的做法。

二、关于《比较霸权》理论贡献的问题——《比较霸权》的其中一个主要贡献是把族群因素引入关于霸权（hegemony）、国家权力形构（state formation）及教育的理论。王博士在书中指出这些观点，恐怕说不上新颖有力，因为“不少政治学者或是族群研究学者早已指出族群因素绝对是战后不少亚洲与非洲独立新政体建国过程中的棘手问题，学者们运用的理论容或有异……但其实也不乏相关的学术讨论”。笔者在此必须澄清：本人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讨论族群、国家、与教育问题的第一人；《比较霸权》的理论贡献必须从西方霸权及国家权力形构理论发展的脉络加以了解。西方大部份采用这些概念的学者都从新马克思的角度出发，他们着重探讨阶级的影响力，

忽略族群政治的作用。《比较霸权》的贡献是通过新加坡及香港——两个以华人为多数，但族群政治完全不同的社会——的历史个案把族群因素引入，发展出能够解释为甚么某些地区的掌权者可以在教育政策上对被统治族群进行让步、但另外一些却不可以的理论观点。这对西方的霸权、国家权力形构、及教育理论而言是一突破。

三、关于新加坡华人内部分歧的问题——王博士在书评中质疑笔者“似乎就没有强烈意识到当时新加坡华社内部英文教育背景出身与中文教育背景出身者在世界观与文化意识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往往倾向于将新加坡华社对华校政策的反应视为一政体意见”。关于受英文教育与接受华文教育人士的分歧，笔者绝对知道这是新加坡华人的重大鸿沟。比方说，在《比较霸权》第49至50页本人指出中国政府在十九世纪末的华侨政策维持了大量新加坡华校的政治及文化联系，并导致他们与英化华人（又称“土生华人”）的鸿沟。笔者又在226页的注28中解释土生华人的由来以及他们在文化上被英化的原因。在讨论人民行动党成立初年的部分（页63至66），笔者亦强调最早的人民行动党菁英都是受英文教育的，他们都意识到要成为具有实力的政党必须先得到华人大众支持，因此愿意与受华文教育为主的左派人士合作。另外，本人亦从来没有把新加坡华社对华校政策的立场视为一整体意见——《比较霸权》书中多处曾指出较保守的华人组织（例如“中华总商会”）与左派团体就政府华教政策的重大分歧。

然而，尽管从来没有把华社看成是单一整体，本人绝对不敢声称完全了解新加坡华人对华校政策的立场。因为笔者主要以历史档案从事研究。这种方法极度依赖文字资料，因此无法真正掌握大部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片言只字的庶民大众的想法。这无疑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除了国家及社运精英外，民众的态度及行为亦是决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要克服这限制，探讨华文教育问题的学者必须以民俗志学（ethnography）及口述历史等方法进行研究。

四、关于战后新加坡“咨询委员会”对“十年计划”的立场——“十年计划”是战后初年英殖民统治者发展英校以消灭华校的政策，是项计划在拍版定案前曾交由当时的“咨询委员会”复审并获通过。“咨询委员会”是英国人战后重新统治新加坡后成立的咨询组织，它的功能是促进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并提高政策的合法性。笔者的疑惑是“咨询委员会”22名成员中包括15名华人代表——其中有三人为国民党成员、一人代表马共、八人来自“三民主义青年团”、及多名劳工界及商界的华人代表。然而该会却好象对反华文教育的“十年计划”毫无异议。王博士认为以从新、马的角度而言，这事情不足为奇，因为“当地华人对英文价值过度迷信”，以及相信作为“中性”语言的英语是最适合促进族群整合的共同语言，这种情况“多年来一以贯之”。然而，笔者认为这回答未能使人满意。首先，当时新加坡“咨询委员会”华人代表是否因为迷信英语而支持（或默许）“十年计划”是一个历史的问题，王博士必须提出历史证据支持他的观点。其次，二次大战初年华人民族主义高涨、华族与马来人关系

迅速恶化、国民党与马共又是非常中国为中心（或至少是华人为中心）的政治势力，本人难以理解为何从历史资料中完全看不到他们对“十年计划”的异议。此外，如果过度夸大新、马华人“迷信英语”因素对教育政策的影响，我们将难以解释其后华社一连串捍卫华教、反对英化华校的抗争。

最后，本人感谢王博士提出《比较霸权》关于新加坡人名、地名、官衔等的错误。倘若将来拙作有机会再印或再版，本人定将加以一一更正。



*黄庭康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育社会学博士，现任职於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董宗

书评和回应

2008-2009年 各州华文独立中学学生总数、 初中一学生人数和教师人数

州属	学校 数量	学生总数			初中一学生人数			教师人数		
		2008 年	2009 年	增减	2008 年	2009 年	增减	2008 年	2009 年	增减
柔佛	8	17647	18163	+516	3756	3455	-301	802	844	+42
马六甲	1	2031	2083	+52	435	366	-69	100	106	+6
森美兰	2	2240	2366	+126	502	524	+22	116	127	+11
吉隆坡	4	10121	10567	+446	2389	2541	+152	589	622	+33
雪兰莪	4	4922	5316	+394	1233	1246	+13	281	300	+19
霹雳	9	4552	4892	+340	1078	1159	+81	320	332	+12
吉兰丹	1	394	367	-27	102	80	-22	35	41	+6
吉打	3	1139	1185	+46	284	282	-2	101	103	+2
檳城	5	3796	3894	+98	754	733	-21	260	281	+21
砂拉越	14	5125	5367	+242	1005	1136	+131	377	373	-4
沙巴	9	6245	6290	+45	1229	1302	+73	327	333	+6
总数	60	58212	60490	+2278	12767	12824	+57	3308	3462	+154

资料来源：董总资讯局2009年7月统计整理。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大事记

(2008年7月至12月)

董总资讯局整理

7月01日	韩江学院与英国胡佛汉顿大学签署3+0学位合作备忘录。
7月06日	马六甲董联合会举行会员大会，并初选第26届理事。
7月10日	董教总发表文告呼请教育部废除《1998年学校扩建和重建指南》，以消除“全津贴学校”和“半津贴学校”的法外立法的区分。
7月14日	教育部召开为期二天的“英语教数理政策”圆桌会议。
7月15日	董总主席叶新田蝉联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一职。 新院风波协调小组，同意成立包括杜乾煥、杨泉、陈友信和丘琼润等四人的调解小组，以化解新院风波。
7月16日	2008年度林晃昇贷学金名单揭晓。
7月18日	董教总移交马币44万义款予中国驻马大使馆，赈济中国汶川大地震灾民。
7月20日	檳威华校董事联合会于檳州华人大会堂召开“反对剥夺董事会权利”抗议大会。
7月23日	杨应俊当选马六甲董联合会主席。
7月24日	教育部长希山慕汀称，任何“半津贴学校”要转换成“全津贴学校”，学校的土地拥有权须移交给教育部。
8月4日	柔佛恢复母语教数理行动委员会向教育部提呈备忘录。
8月7日	董教总教育中心公布，委任谢瑞平等15人为高等教育咨询团成员。
8月9日	“2009年森州华教节”推介礼于芙蓉中华中学举行。
8月10日	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举行“2008年高等教育助学金”颁发礼。
8月12日	玛拉工艺大学数千名学生向雪州政府呈备忘录，抗议州务大臣卡立依布拉欣日前发表开放玛拉工艺大学10%学额给非土著和外国学生的谈话。

8月16日	新纪元学院举行“第9届秋季毕业典礼”。 “第三届全国华校网上教学”研讨会于尊孔独中举行。
8月17日	由“彭亨百乐县和直凉华社争取草场三人小组”策划“817华教和平请愿”活动，在过程中请愿民众和发展商的随意引发肢体冲突事件。 大马中兴大学校友会主办“2008年陈嘉庚全国独中统考成绩优秀奖”颁奖典礼。
8月19日	高教部长莫哈末卡立表示，“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法令2008年修正案”建议，个人不能申请开设私立大专，只有注册公司才获允许申请开设高等教育机构。
8月23日	檳威董联会今日起在威省38所华小和国民型中学发起悬挂布条运动，抗议教育部禁止学校董事会签署学校户口支票。
8月24日	“2008年华教节”序幕礼于吉隆坡陈氏书院举行。
8月27日	“2008年全国独中学生国语论坛”比赛，沙巴亚庇建国中学成功夺冠。
8月30日	怡保育才独中举行“830育才百年校庆开幕大典”。 新纪元学院首任院长洪天赐病逝。
9月3日	高教部公布檳城理工大学获选为本地顶尖大学 (APEX University)。 檳城首席部长林冠英宣布，2009年州政府预算案中，正式编列马币100万拨款给州内5所独中。
9月5日	雪隆华校董联会召开华小课题汇报会。
9月7日	吉隆坡尊孔独中董事会改选，原任董事长邹寿汉和副董事长叶新田双双落选。
9月13日	吉隆坡坤成四校联合庆祝创校100周年校庆。
9月20日	“2008年雪隆八独中行政人员暨教师培训营”，一连两天在巴生滨华独中举行。
9月24日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宣布，董事会已在9月15日决议公开征聘2009年度起的新纪元学院院长职。
9月25日	教育部发布“2006年至2010年教育发展大蓝图”检讨报告。 新纪元学院24位学术和行政主任、讲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公开呼吁董事会续聘柯嘉逊院长，而非公开招聘。

9月28日	2008年育龙教育基金颁发典礼于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举行。 林连玉基金会联同54个华教团体举办“陆遥知马力：陆庭谕老师表扬晚会”。
10月4日	董总前署理主席蔡庆文、副主席陈松生、财政黄仕寿、总务刘锡通和常委苏林邦等五位前领导层成员联合发表文告，促请现任董总主席叶新田自行引退。
10月5日	华总文化委员会主办2008年华文中小学杰出教师奖颁发典礼。 霹雳州近百位华教人士组团前往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声援因新纪元风波遭外界质疑的董总主席叶新田。
10月9日	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宣布，教育部和财政部官员联席会议后，同意收回今年5月所发出禁止学校董事会签署学校户口支票的指令。
10月12日	董总于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召开各州属会第77次联席会议。当天会议上对媒体应否列席采访，各州代表有不同的意见。
10月16日	马华公会为“全国华小校地调查报告”举行推介礼。
10月19日	隆雪华堂、董教总、大马律师公会和废除内安法令联盟联办“废除1960年内安法令签章大会”。
10月21日	新纪元学院29名全职讲师呈交连署信予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主席叶新田，呼请董事会续聘柯嘉逊院长。 教育部召开英语教数理第4次圆桌会议。
10月28日	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指出，马六甲教育局会即刻将华小美术科考卷译成华文，并在一两周内，安排该州65所华小学生重考该科。
10月29日	教育部召开为期三天的“政府资助学校的未来”圆桌会议。
10月31日	隆雪华堂会长黄汉良呼请叶新田辞去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一职。 雪隆一群华教人士宣布成立“雪隆捍卫董教总主权行动委员会”。 全国校长职工会举行第二十六届代表大会。 新纪元学院前进阵线和社会关怀团呈交备忘录给新院理事会主席叶新田，要求召开新院风波说明会。
11月1日	南方学院颁发南方学院人文精神奖“南方之鼎”给已故本地音乐家陈徽崇。 马来西亚独大有限公司针对新院风波开会决议，主张“维持现状、续聘柯嘉逊”。



11月2日	董总召开特大，以10对3的票数，反对续聘柯嘉逊为新纪元学院院长。
11月3日	以学术处主任詹缘端为首的新纪元学院五位学术及行政主管，决定和不获续聘的院长柯嘉逊共进退，集体提出辞呈。 隆雪华堂、董教总、大马律师公会和废除内安法令联盟前往布城首相署呈交404个团体联合签署的备忘录，要求政府废除内安法令。
11月4日	副首相纳吉宣布，宗教学校、教会学校、华小和淡小等四源流学校，各获政府拨款马币5千万。
11月7日	“学生捍卫新纪元学院行动委员会”成功号召近300多名学生，聚集在董总大门前和平请愿，要求董总主席及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叶新田必须在11月11日前针对学生“维持现状、续聘院长”的诉求做出回应，否则学生将在11月13日起发起和平静坐抗议活动。
11月8日	“家长捍卫新纪元学院行动委员会”召开紧急签名请愿和陈情大会，将约200多名家长联署的备忘录呈交给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叶新田。 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恫言，如果新院风波继续恶化，高教部将采取行动介入调停。
11月10日	隆雪华堂、森华堂、檳华堂、吉华堂和霹华堂发表联合文告，呼吁高教部副部长何国忠尊重校园自主，勿介入新院风波。
11月13日	“学生捍卫新纪元学院行动委员会”发起一连3天的“救救新院、静坐翻书”抗议活动。 董教总教育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公布，潘永忠为新院新任院长的人事案。 教育部公布2008年小六评估考试（UPSR）成绩。
11月15日	雪隆董联会主办“声讨新纪元学院风波幕后黑手”交流会。
11月16日	新纪元学院举行“救救新院”大会。
12月1日	尊孔独中校长吴建成证实收到董总主席叶新田的律师信，要求他为指责叶新田是“华教败家子”的言论道歉，否则将面对法律后果。
12月4日	林连玉基金宣布，雪兰莪州加影华侨学校产业受托会和前沙巴古达培正独中董事长王平忠双双获颁2008年度林连玉精神奖。
12月5日	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宣布，白小原校正式易名为白沙罗中华小学。

12月11日	国会下议院三读通过“大专法令2008年修订法案”。 62位前董总职员发表联署声明，表示对目前董总领导层失去信心。
12月12日	“2008年全国独中校长及行政人员研讨会”于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举行。
12月14日	林连玉基金举办“2008年华教节”。
12月16日	教育部召开英语教数理圆桌总结会议。
12月17日	华总召开“华教危机与发展交流会”，与各华团代表讨论新院风波。在会议上各代表达成共识，授权华总成立协调委员会，以斡旋新院风波。
12月19日	第20届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召开全体工委第四次会议。
12月20日	媒体报导，梳邦华小下午班副校长白春梅，将调任白沙罗中华小学校长。
12月21日	遭指控涉及性骚扰的教总前副主席陆庭谕向外界道歉，并辞去所有华教组织职务。 白小原校为新校名举行揭幔仪式。
12月23日	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就遭指财务令人不安的指控，决定对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会主席叶新田和财政邹寿汉采取法律行动。
12月24日	以全国大专生团结阵线为首的22个学生团体，要求新纪元学院理事会主席叶新田辞职。
12月25日	教总举办“《图说沈慕羽》新书推介礼”。
12月29日	华总正式宣布成立“新院事件协调委员会”，以调停新院风波。
12月30日	2008年初中评估考试（PMR）放榜。



编后语

近代民族国家素来视学校历史教育为培养公民意识的手段之一。与其同时，政治人物尝试左右历史书写，屡见不鲜，从刻意突显纪念特定历史事件、篡改教科书、影射史学等做法，无不是运用政治力量企图影响掌握历史诠释与发言权，为其政治利益服务。尤有甚者，近年来在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冲击，历史建构论、虚构说，大行其道，古为今用，视为当然。

在马来西亚，历史教育与政治间的盘根错节，更因为不同语文、宗教和文化身份群体，历史渊源、文化宗教传承的差异，造就各自群体在历史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历史认知的分歧、矛盾和割裂。于是近年来本地历史教育沦为各说各话，相互放话，内部喊话的工具，更奢说历史做为一门传统人文学科，历史教学自有其一贯的学术传统、专业坚持和伦理规范的意义和功能。

诚然，中学教育做为国民教育的一环，无可避免需承载着国家教育政策的任务，同时教育领域从来就是充斥权力、支配和利益的场域。因此中学历史教育实无法自外于政治的影响，去政治化。然而，政治的影响，不同赤裸裸的政治干涉，学校历史教育自有其别于权力逻辑，相对自主的运作空间。

本期“中学历史教育与教科书争议”专辑，就是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省思当前本地中学历史教育的政治、教育和历史三角纠葛关系以及所衍生的种种社会争议。专辑收录了张景云〈历史教科书：是历史研究还是社会工程？〉、张荣强〈谈国民中学历史教科书〉和何玉万〈择善而固执：谈华文独立中学初中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三篇专文以及一篇座谈会记要，相信可以为读者对目前中学历史教育的现状、定位和规划提供一个鸟瞰的视野和认识。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为学贵砥砺切磋，本期书评栏的两篇文章，一为本地学人王国璋评介台湾学者黄庭康《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一书的书评，另一篇则是该书作者黄庭康针对王的书评所撰的回应文章。透过学术书评的机制，深化学术讨论、批评和交流，这是本刊所乐见的，更希望未来可以继续充当和发挥这样的桥梁功能。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刊亦趁黄庭康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事访问研究的地理之便，于2009年10月7日，联同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邀请黄庭康到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发表学术演讲，讲题为“国家霸权与课程改革：战后新加坡及香港华文学校的比较”，探讨新、港两地的国家政权与教育政策之间的关系。

最后，趁新的一年，本刊祝贺读者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主编誌识

稿约

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是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出版的教育类学术半年刊，分别于每年1月和7月出刊。本刊出版目的在于促进学术界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力求系统地反映相关领域的最新理论和研究成果；鼓励国内外华文教育工作者和独中、华小教师对教育课题和学科教育教学问题进行研究，促成教研风气，提升学术素质；汇集上述研究成果，促进相互交流、相互提升，繁荣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二、在学术论文稿类外，本刊也欢迎立意新颖、内容充实的评论论文、研究笔记、教学报告、书评、短论等各式文稿。来稿一般以一万五千字为限，特约稿不在此限，来稿格式请参考本刊的“撰稿体例”。

三、来稿件请以打印稿方式提供，并附磁盘，亦可通过电子邮件递送。来稿请附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务、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电邮。

四、所有来稿皆会送交本刊编审委员会评审，来稿采用与否由编审委员会做最后的决定。若需要，编审委员会可以要求来稿须作修改，再予以采用。

五、来稿请自留底稿，本刊一概不退还稿件。稿件三个月没有回复，作者可另行处理。本刊将根据情况对稿件进行适当修改和加工，不愿改动者请事先说明。稿件一经发表即致赠样刊二本。

来稿请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主编收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电子邮箱：hwjy@djz.edu.my

电话：03-87362337;传真：03-87362779



撰稿体例

本刊为便利编辑作业，学术论文来稿应依照以下撰稿格式：

- 一、 来稿首页列明论文题目、作者姓名、服务机关、通讯地址和电邮。
- 二、 各章节标题，依一、（一）、1.、(1)……等顺序表示。
- 三、 中文标点符号，书名一律采用《》，篇名则用〈〉，引号采“ ”。
- 四、 年代写法一律为“1990”，“1997”。
- 五、 注释一律采同页注格式。
- 六、 注释体例，格式如下：

（一）专书

中文书籍：郭洪纪：《文化民族主义》，台北：扬智文化，1997年，页112。

外文书籍：Asmah Haji Omar,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93, pp.29-31.

（二）论文

中文论文：丘光耀：〈马来西亚的第三条路——民主行动党的意识形态研究，1966-2002〉，《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6期，2003年，页1-41。

外文论文：Patt, John T. “Some Aspect of Language Planning in Malaysia”, *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Papua New Guinea*, Vol. 9, No. 1, 1976, pp.3-15.

（三）报纸

孙和声：〈种族、文化、认同与权力的纠葛〉，《东方日报》，第13版，2006年1月27日。

（四）再次征引

1. 再次征用，可以简便方式处理，如：

注1：郭洪纪：《文化民族主义》，台北：扬智文化，1997年，页112。

注2：郭洪纪：《文化民族主义》，页112。

（五）互联网资料

陈慧思，〈跳槽换政府是民主出路〉，《独立新闻在线》（<http://www.merdeka.com/news.php?n=7369>），2008年8月7日06:20:26pm。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2010年1月

非卖品

January 2010

出版：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Publisher: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DONG ZONG)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主页／Website: www.djz.edu.my

电邮／email: ucscam@djz.edu.my

电话／Tel: 603-87362337

传真／Fax: 603-87362779

印刷： 合喜印务有限公司
Printer: PERCETAKAN HASIL SDN. BHD (132466-H)
20, JALAN KILANG MIDAH, TAMAN MIDAH, CHEAS,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